

新詩的自由與漢文化的原生力

——與洛夫先生一席談

◎ 姜耕五

「背離與回歸：『先鋒』探索的一體兩面」

這個標題是借用白楊教授在去年台灣《創世紀》詩刊80年慶典上演講的論文題目，我頗認同她對洛夫和創世紀詩人的創作歷程的哲學性概括。背離與回歸，屬於同一矛盾體。沒有背離，就無所謂回歸；沒有回歸，也就談不上發展。背離與回歸呈現為波浪式前進或階梯式上升的軌跡。而長期以來，詩壇延續著對漢語詩歌歸零的背離，非如是就視之為「保守」。實際上，歸零的背離，在本質上與返回原點的回歸一樣，都是下行與倒退。白楊說：「如果以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看待中外文化的關係，我們很容易將《創世紀》從『超現實主義』到『回歸傳統』的轉型看做是一種對抗性關係的變化，而忽略了

兩者之間相生相剋、互為促進的過程」。洛夫作為《創世紀》的代表性詩人，從20世紀80年代起，探足中國傳統文化與古典詩歌資源，新詩評論界卻有「浪子回頭」之說。

洛夫對此作了辯論：「有人說我『浪子回頭』，這是一種慣性的、不假思索的成語的濫用，毫無意義。不錯，早年我的確一度沉溺於對西方現代思維和新潮藝術形式的探索，前者主要指存在主義，後者側重於超現實主義，我的實驗創作可以《石室之死亡》為代表。這條路我踽踽獨行了20多年，當時我有踏著玄奘腳印到異國取經的艱辛和不顧一切向一個不可預知的遠方邁進的勇氣，結果取了空經，但也難免遭遇到一些風險。可似乎就在一夜之間幡然醒悟，覺得一個詩人如要長成一棵

巍然大樹，基本條件是他必須種在自己的土壤裏，攝取各種營養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深深植根於本土的文化，這不是回歸傳統，更不是浪子回頭，而是一種覺醒，一種在生命和藝術的探險途中，自覺地投身於一種企圖建構漢語詩歌新美學系統這一新傳統的追求。」

現代漢詩需要在全球化語境中攝取各種營養而使自身成熟起來，詩人對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模仿與探索是必要的，但應該是立足於漢文化之中。尤其是五四新詩，是在對幾千年漢語詩歌「歸零」的情境中誕生的，因而，如何使漂泊的新詩回到自己的土壤裏，深深植根於本土的文化，成為百年來有作為的詩人思考與探索的重要課題。

洛夫有「詩魔」之稱，「魔」是叛逆

的代名詞。他說：「年輕剛出道時，詩人無不標榜『反傳統』。法國作家伏爾泰曾說：『詩人心中都有一個魔』。何謂『魔』，初始不得其解，就在早年我一頭栽進超現實主義的迷陣中，才發現，對一個滿心充斥著創造潛力的詩人而言，『魔』即意味著一種叛逆精神，但實際上這種叛逆絕不是對我們生活中所依恃的漢文化的叛逆，而是對由慣性而惰性而日趨腐朽的詩歌藝術形式的叛逆。其次，這種叛逆傾向也緣於另一種理由，雖然膚淺，卻是文學發展中轉型期常見的現象：當一個詩人力求除舊創新之時，他最看不順眼的是一個個直立在面前高不可攀的巨大身影，一堵堵難以超越的高牆，如想超越他們，必須推倒他們。但所謂『偶像』，一旦豎立，推倒幾無可能，因此當時我的思路是：既然推不倒，不如繞道而行，另闢蹊徑，不如向傳統借火，向古典取經。」

這段話很有趣，詩魔對偶像的反叛，竟然是導致「向傳統借火，向古典取經」的理由，導致背離即回歸的戲劇性疊合。然而，如果從歷史語境考察，在大陸批判封建文化的六七十年代，「向傳統借火，向古典取經」，又何嘗不屬於反動？對於現代進行時的詩人創作而言，每一輪背離或回歸，都是在二者之間相生相剋的張力

中突進，是在已有成果的基點上的變革和攀升。洛夫最初只不過伸出一只腳，向傳統的大河探一探水的溫度和深度，並無意全心投入，後來逐漸發現水溫有點涼，便摻入一些西方的熱水，才感到調適後的水溫，正是他日後縱身詩的大河中最需要的溫度。這使我想到美國實驗主義美學家杜威說的，「經驗的每一休止處就是一次感受，在其中，前面活動的結果就被吸收和取得，並且，除非這種活動是過於怪異或過於平淡無奇，每一次活動都會帶來可吸取和保留的意義」，無疑是對背離與回歸的最有力詮釋。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抹煞了吸收和保留的意義，以「歸零」或「回到原點」代替「吸取和保留」。由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形成的極端化、簡單化的詩學理論，只能滯礙和破壞新詩發展的生態。

新詩自由的靈魂：與漢文化基因的缺失

詩歌是人的情感與精神的載體，但首先是一種語言文化形式。卡希爾稱，人的本質就是徜徉在廣闊的文化時、空之間的自由意識。從總體上看，人類文化可以描述為一個人的不斷自我解放的歷程。正出於現代人對自由解放的訴求，自由的新詩得以存在，並有了百年歷程。由於胡適領

導的白話詩運動執意與舊詩的決裂，導致漢語詩意的喪失，留下新詩建設的難題。

洛夫說：「恕我直言，胡適打倒了舊詩，卻並未誕生新詩，如說他的白話詩運動成功了，只能說在他的『我手寫我口』和『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的主張下，分行的白話文體活了起來，而詩則給他弄死了。詩沒有了意象，沒有了神韻，沒有了意境，沒有了內在的音樂性，只有直線發展的鬆鬆垮垮的文字而已。所以紀弦在臺灣搞現代詩運動，宣導詩的二次革命是對的。紀弦主張『新詩是橫的移植』，更具合理性。我不接受『新古典主義』這個似是而非的名詞，由於現代與古典的生硬的結合，二者的銜接未能達到水乳交融的境地，便會產生虛情假意的『假古典主義』，動輒小橋流水，筆下仍是悲春傷秋。當然，小橋流水之景也可以寫，悲春傷秋之情也可以抒，但這個景應是當下可見之景，這個情應是現代人之情，你學李白儒俠的氣質，浪漫的風格，只能神似，而不能貌像，這也是融古典於現代，建構漢詩新美學系統最關鍵的認知。」

如果說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等世紀初詩人都具有良好的國學修養，在他們的大白話中仍帶有文化蹤跡，那種一時去不了的漢文化基因，膚色般地點綴著直白的

漢字，那麼，當後來詩人們運用了西方現代詩的修辭方法，改變了初期白話詩的簡單蒼白，也遮蔽了漢語詩意的失落。換言之，新詩發展沒有改變對母語之根的疏離。幾千年的古典詩詞已成為漢文化古典美的積澱，是新詩美學不可繞開的重要資源。但由於新詩是在打倒舊詩中誕生的，這無疑帶來接通新舊詩之間聯繫的難度。新詩打破舊詩格律，自由的白話、口語如何成為詩，仍處於模糊與摸索之中。

新詩不管是作為生命的存在，還是靈魂的寓所，都是一種文化形式。稱詩為高雅文化也好，俗文化也好，情感精神形式也好，生命形式也好，首先是文化形式或文化符號。從藝術創造而言，一種成熟的詩意創造，首先彰顯獨特的語言魅力，發生接受與交流方面的審美效應。漢語詩意的生成離不開漢文化基因，新舊漢語詩歌之間血脈相連，正在於不可切割與拋棄的漢文化基因。不管時代與詩歌發生多大變化，泱泱詩國都因有漢文化基因而生髮新鮮的力量，以不衰的漢語之美照耀世界。

洛夫認為：「我國古典詩詞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文化形式，主要因為經過長期的普及化和大眾化，古典詩詞已深人民間，它的韻文語言已產生了社會的文化效應，諸如對聯、謎語、彈詞都由古典詩詞演變

而來。但新詩換作口語，大白話，即使能產生普及作用，卻因缺乏詩意與文雅之氣，和令人精神昇華的功效，自然難成為高雅的文化形式，因此我認為新詩語言的意象化，以及加強詩的抒情性，也許是一種構成文化形式的必要選擇。」

洛夫在批評「口語詩」「完全忽視於語言的精純，意象語的魅力」時，推崇李商隱的《錦瑟》，稱「一首詩中如語法和意象調配得宜，未嘗不能使一首詩增加它的鮮活度與流暢感」。他這樣分析《錦瑟》：「這首詩的結構非常特殊，前六句全以意象呈現，這一組組意象不僅由一些潛在的古典構成，而且還交織著諸多撲朔迷離的、個人的如夢似幻的情思，美極了，但因缺乏知性的引導，讀來難以索解，幸好最後兩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以語法形式表現，如同增加了一個通氣口，閱讀時的窒息感立即得以紓解。這兩句是一種口語式的語法，可使讀者立即從夢幻世界進入現實。這是古典詩中口語與意象作最佳配合的例證。」

這裏舉出洛夫先生贈我的一副五言對子：「花吐一溪煙，鳥轉群山飛。」兩句五言，足可以看出洛夫對漢語獨有的簡潔、空靈之美妙意象的捕捉。我無意推崇洛夫的古典詩詞工力，而是敬佩這位曾以最具

現代詩影響力的《石室之死亡》叱吒華語詩壇的詩人竟這般傾情古典，是想說他在對古典詩詞形式及意象的會心和把握中，觸及到了漢文化基因這一新詩之根，「血液中有一股強烈的隨時會噴湧而出的漢文化原生力在衝擊、在躍動」。洛夫正是催動了創造主體中漢文化的原生力，才有了開啟新一輪新詩創造的可能。洛夫「試著做另一種努力：重新尋回那失落已久的古典詩中那種意象的永恆之美。不錯，就是這個聲音一直在我心中呼叫，這是歷史的聲音，也是文化的吸引與呼喚。於是我又再次一頭栽進了古典詩，尤其是唐詩的浸潤中」。構成洛夫所說「古典詩中那種意象的永恆之美」，可以理解為漢文化基因。80年代以來，洛夫談到自己面臨一個「脫胎換骨」的蛻變，即指探尋漢文化基因的過程。漢語詩人如果背離或繞開幾千年古典詩的輝煌創造，就值得懷疑他還是不是漢語詩人？新詩人都有一個身份的確認。詩人只有接觸古典，重讀古典，在真正受到古典詩的吸引和浸潤中，才會領悟到漢語詩歌這一獨特文化形式的精妙與不可捨棄的東西。

詩人獲得今古漢詩相繼相生的血脈貫通之體驗，現代詩意創造必然隨著漢語詩性靈感而耀然生色。

新詩能否成為文化形式：洛夫對「現代禪詩」的探索

詩的語言品質，首先見諸文化形式。詩成為文化形式，是詩藝術成熟的標誌。古典詩歌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種高雅形式，是幾千年漢文化的美的積澱。

洛夫認為：「大陸詩壇漢文化意識的薪火相傳也遠不如臺灣來得深厚，且部分大陸詩人對中國古典美學元素採取抗拒態度，一心追求民間路線的口語化，反對隱喻和象徵在抒情詩中的功能，導致有些詩的語言品質大多仍停留在五四時期白話詩的粗糙階段。而臺灣詩歌的語言講究雅俗共賞，生活語言(提煉過的口語)與書面語言的搭配使用，經營出一種文雅而又鮮活的、充滿現代漢語意識的詩性意象系統。所以我認為在現代詩中更多地融入漢文化元素，尤其是古典詩美學元素，是兩岸詩壇強化詩的形式，深化詩的內涵，進而提升詩的意境的正確取向。詩營造的是一個晶瑩剔透、沒有雜質的意象世界；詩的語言是一種抒情結構，所以才有詩的『意象思維』一說；胡適認為作詩必須要像作文一樣，這是一個誤導。

(與西方詩歌)相比較之下，中國詩更重視內在的韻律和節奏與外在的形象結構，內外有機性的結合，便產生了一意在言外」

的象徵含意和語言背後的豐盈意境，於是漢語詩具有兩個極端的特徵：一個是顯性的形象語言，一個是隱性的沉默語言，這種語言最適於禪詩的寫作。」

我認為新詩尚未成為文化形式，除了新詩語言形式自身的原因，還在於缺乏強勁的中國現代文化的支撐。而獨特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則彰顯優勢與新異感，尤其是老莊禪宗文化，道以對人格本體與自然的親近、禪以玄妙的直覺方式或意象思維，不僅給詩提供了獨特的漢文化意味，而且以漢文化的原生力，給予漢詩創造新的可能性。洛夫對超現實主義的實驗，正是在涉足古代文化資源中而燦然生色，呈現一種劃破長空的東方文化智慧之美。

洛夫開始選擇超現實主義手法，旨在「尋找一個表現新的美感經驗的新形式」，《石室之死亡》可為典型的創作實驗。後來，洛夫不滿其「自動語言」，不贊同馬拉美的惟語言論，而當他回降傳統文化，重讀唐代大師們的作品，赫然發現他們的詩中居然也有超現實的審美傾向，併發現一種「無理而妙」的特有詩性的藝術原則，遠比超現實主義非理性的特質，更能使詩達至玄妙的境界。於是，他有了建構切入漢語特性的超現實主義的企圖。古典詩歌的「無理而妙」與西方超現實主義的「自

動語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洛夫述說了這一變化與探索過程：「早年我一度沉溺於西方的超現實主義，它那陌生反常的語法，我在《石室之死亡》一詩中發揮到淋漓盡致，日後論者給予一個『晦澀之美』的脫詞，但我卻引發出一個新的自覺，產生了建構一個修正的、接近漢語特性的超現實主義的念頭。我在一篇詩集的自序《鏡中之象的背後》中談到這個問題：第一步要做的是從中國古典詩中去尋找參照系，從古人詩中去探索超現實的元素，結果我驚訝地發現，李白、李商隱、孟浩然，甚至杜甫等人的作品中，都含有一種與超現實主義同質的因數，那就是『非理性』。中國古典詩中有一種了不起的、玄妙之極的、繞過邏輯思維，直探生命與藝術本質的東西，那就是前面提到的『無理而妙』。『無理』是超現實詩與中國古典詩二者極為巧合的內在質素。但僅僅是『無理』，恐怕很難使一首詩在藝術上獲得它的有機性與整體美，而中國詩的高明之處，恰恰就在這個說不清、道不盡的『妙』境。換句話說，詩絕不止於『無理』，最終必須獲致絕妙的藝術效果，這就是漢詩語言的特性，也是我日後創作時秉持的信念。」

「無理而妙」的哲學源頭，當追溯到

禪宗，更遠在莊子易經。慧能禪宗傳教「不立文字」，而採用「拈花微笑」之大悟，是以「大音希聲」、「無中生有」的形而上的詩意方式，返依體驗本體之極致。這種古老的東方智慧孕育了一批中國古代詩畫大家，比如稱為禪宗畫派的王維，其詩其畫所達致「空」之美的形而上的體驗境界，都得力於禪意。「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嚴羽）。洛夫涉足並迷戀中國古老的文化源頭，借力於禪，使禪宗這一東方智慧的神秘經驗在與西方超現實主義的碰撞融通中，獲得了將西方現代詩的超現實主義融入東方美學與漢語詩美創造的自覺，開始新的漢詩實驗。洛夫以禪意，修正超現實主義的非邏輯性之不足，賦予「自動語言」以意義。禪意使複雜語義的陌生世界變得親近起來，不再艱澀難懂。雖仍然難解，卻有經驗美學的神秘魅力，是形而上的東方詩意。寫於20年代的《金羅禪寺》，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與王維的《鳥鳴澗》相比較，一個寫「雪」與「灰蟬」：「如果此處降雪而只見一只驚起的灰蟬／把山中的燈火一盞盞地點燃」；一個寫「月」與「鳥」：「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雪」、「月」是富有禪意的原型意象。「圓滿光華不磨瑩，掛在青天是我心。」（寒山子）古代道禪大

師及王維等詩畫大家，往往以「雪」、「月」明心見性，進入悟的最高體驗境界。如果說王維詩中以「驚山鳥」烘托了「月出」，那麼，洛夫詩則以「一只驚起的灰蟬」襯托「降雪」，二者都是禪意注入互不相干的事物，使之有了內在邏輯。王維借「月」進入「靜」而「空」的境界，洛夫借「降雪」撫慰大地上的燈火，「灰蟬」是一種現代生命文化的存在。兩首詩分別體現了古典文化形式與現代文化形式。洛夫對於「現代禪詩」的創作實驗，標舉漢文化對新詩形式的滲透，試圖賦予新詩語言形式以漢文化特質，在打通現代與古典、詩悟與禪悟、禪意與漢語詩意等方面取得了成效。

西方詩歌進入語言哲學，使語言形式豐盈。西方詩歌語言講究精確，而漢語言的形意性，其「顯性的形象語言」與「隱性的沉默語言」的特徵，使中國新詩語言形式具有豐盈的可能。漢詩的形式品質，離不開東方哲學智慧的哺育。洛夫現代禪詩提升了新詩形式，不僅僅是文化特質，同時也是現代人對人生與生命的體驗的哲學境界，是詩的純粹性和形而上的美的追求。

洛夫對現代禪詩做了這樣的概述：「據我個人的體驗，現代禪詩是一種偶發

性、隨機性、無主題意識的寫作，對一位現代詩人來說，禪悟並不是從念經打坐中修持而得，它可能只是一種感應，一種某一瞬間的心理體驗，一種對宇宙萬物和人生經驗的妙悟，它的審美效應遠遠大過宗教性能。我的禪詩創作主要受到一項實驗的啟發，亦即企圖使禪詩這一東方智慧與西方的超現實主義相互碰撞交融，然後轉化為一種具有中國哲學內涵，也有西方現代美學屬性的現代禪詩。在創作這類禪詩時，我領悟到禪詩有一種潛在功能：它可以喚醒我們的生命意識，看透了色空，悟出了生死，求得生命的自覺，過濾掉潛意識中各種欲念，使它昇華為超凡的智慧，並從虛浮的庸俗的現實中捕捉到一種純粹的美。」

「天涯美學」：漢文化生長的可能

漢文化的原生力，僅僅標示漢文化在歷史長河中相續相生、生生不息。作為漢文化的生命因數，世代相傳，在作品中浮水印月色般的存在。而作為活躍於詩人創造主體中的漢文化意識，是生長了的漢文化意識，它是在與西方現代哲學思潮、文化思潮的撞擊中展示自身的特質與亮色。中西文化觀念互異，卻構成一種張力，漢文化資源需要現代文化思想去點燃、去發

掘，漢文化在被啟動中保持原質的生命狀態。

幾乎沒有文類比詩更具個性化與自我滿足，每位詩人都有自己的「一個經驗」。偉大的哲人總是以天才的先知先覺，引領一個時代的精神和靈魂。詩人需要以哲人的姿態立足詩歌前沿，在接受與順應世界進步的思想文化潮流中立穩腳跟，更重要的是，要以自身獨特的體驗和詩歌價值創造，廓開新鮮而充滿生氣活力的現代人的詩意天空。所謂「漢文化原生力」，即擁有堅實的漢文化之根而生髮出的一種現代進行時的美學力量。

洛夫近20年的「二度流放」生涯，激發了他創作的潛能和靈感。他說：「寄居海外的華文詩人與作家都會面對一個深沉的困惑：在當地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融會與衝突中，如何確立自我的定位和中西文化的平衡點，語言媒介只是華文文學的外在形式，文化才是它潛在而深刻的精神內核。身處異國，我經常有文化身份的焦慮，但好處是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掌控一個自由的心靈空間，而充實著心靈空間的，正是那在我血管裏流轉不息的祖國文化。其實對一位漂泊海外的詩人來說，初期的異域生活對他的創作絕對有益，新的人生經驗，新的生活刺激，新的苦悶與挑戰，都可使

他的作品更加豐富多彩，表現出多層次的生命內涵。還有一種更特殊的體驗：他可以毫無疑慮地採取一種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不致於仄化自己的胸襟，僵化自己的思想，他再也不必跟著某個主旋律放歌，他可以發展更獨立更自由更廣闊更多元的創作路向和風格，而把個人感情，世界眼光和宇宙胸懷，凝聚為一股新的創作力量，使作品的實質內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對我個人而言，這個新的高度就是『天涯美學』，也就是《漂木》這首長詩的精神與思想的內核。」

「天涯美學」，屬於詩人現代詩性體驗的審美經驗，是生長了的漢文化。「天涯美學」，大致包含三要素：一是詩人漂泊遠方，獲得一個自由的心靈空間；二是詩人在廣闊多元的文化衝突與融會中，找到自我的定位和中西文化的平衡點；三是詩人具有天馬行空的獨立性與思想情感力量的凝聚力。「天涯美學」使漢詩呈現出純淨而獨特的光澤，進入世界文化前沿。

漢文化的生長性，寓於詩人創造之中。文化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包括精神與物質兩個方面，在人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乃至言談舉止之中，都體現一定的文化質素。因此，漢詩的文化含義，既表現在對傳統文化的吸取與轉化，也表現在對新的

文化的發現。卞之琳的《斷章》，可以說，沒有潛在的思想精神內涵，是以一種人生哲理與戲劇化場景、優雅的閑逸情調，而成為經典的漢文化形式。而今新詩的題材日漸擴大為城市詩、生態詩、科技詩等，這些事物太過知性、太冷，缺乏情感的滋潤，給詩的形式結構的漢文化特質帶來難度。洛夫的《蒼蠅》則是一首別開生面的生態詩。詩中沒有精美的意象，不帶激情，只有客觀而冷靜的敘述，運用哲學思辨的方式和戲劇效果，在提升作品內涵的過程中縈繞著現代文化之魂。

詩人總是以自由靈魂與活的詩意形式的創造，不斷彰顯漢文化的新的美學力量。

（作者：教授、博士生導師）



平凡而無聲的詩意

——讀阮克強的詩歌

◎ 孫紹振

說起來，我和阮克強的交往還有一段故事。他本來不是中文系的，但在八十年代那種朦朧詩、後朦朧詩的熱潮中，似乎不想當詩人或者美學理論家，就不愧為大學生似的。這種青春的衝動，不僅僅在中文系，而普及於文科其他系，甚至理工科，醫學院系。我就曾經為福州大學的學生的詩集寫過序。當然，經過九十年代的實用思潮的滌蕩，多數只是衝動了一番，留下了美好的記憶而已。然而，其中一些成了終生的癡迷，甚至有像施雨這樣的，已經在美國當了十一年的醫生，最後還是放棄了待遇優厚的職業轉而把生命投入文學，還在我這裏拿了個文學博士學位。阮克強應該和施雨一樣屬於癡迷者一類。他本在別的系，成績相當優秀，但是，他卻決意

轉到中文系來。我當然十分欣賞，大力支持，自信以三寸不爛之舌，遊說中文系領導是小事一段。但卻碰了一鼻子灰。當局第一藉口是，想轉系的，大都是成績不好的，我乃把他的成績單擺在他面前，當局者拒絕得更乾脆，不管理理由多麼充分，一律不准。過了一些年，有個詩友，去了日本，來信說，可以幫助他去東瀛。我去找他，卻被告知人已經去了美國，音信杳然。差不多十多年後，他和已經頗有影響的詩友哈雷突然出現，似乎是從美國回來，好像在尋找什麼經營專案。我們歡談甚洽，幾乎忘記了談詩。第二天，他就不見了。對於這種驀然而來，飄然而去的學生，我已經習慣了他們的瀟灑。又好幾年，音信仍然一如既往地杳如黃鶴，前些天，突然

在郵箱裏收到他的詩稿，請為之序。對於這種半命令式的請求，我體驗到的是信任和懷舊。但是，是否值得命筆，也有幾分猶豫。今日有暇，讀之甚有可異之處，頗為欣慰，乃略談一二。

近年國內詩壇新秀追求西方前衛，可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不乏成就的詩作不少，然亦可疑之處，我曾設想，把作者的名字掩蓋，換上英美姓氏，讀者疑慮者幾鮮。其極端者，似乎有意與詩為敵，其追求可以用「反詩」來概括。應該承認，有不少我曾經尊敬、欣賞的詩人的新作，讀起來，十分困惑。不知是自己智商衰退，還是詩人的探索出了偏差。我想，身在美州的克強，如果也屬於此類，將如何置評，我的智商是不是充分呢？我對自己，並不太自

信。

但是，看了幾首，我的自信逐漸增強，原來，他並沒有陷入語言遊戲的時髦潮流之中。第一首的主導意象「風鈴」，就讓我的智商經受住了考驗。不管在多麼「美妙」的大自然中，發出多麼「歡愛」的聲音，其性質卻都是「用碰撞骨骼」發出來的。從這裏我領悟到，即使對「歡愛」，他也是冷峻的，相當嚴酷的思緒可能來自於「三只」，而不是兩只。這在《救命稻草》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寫的是生存的矛盾：野外動物的行動自由和靈魂是統一的，而在「我」（人）的日常生活中，卻只能抓住自由，作為「救命稻草」，其不如動物者乃是因為靈魂沒有外衣。應該說，這是現代人生存的困惑，但是，從詩藝來說似乎直白了一些。幸而，這樣的直白並不多。更吸引我的是像《飛起來》那樣的智性與感性比較平衡的。把黑雀的感性寫得很充分，黑得精緻，最後的議論轉化為「飛得很低的女性」，「讓她飛起來」，既卒章顯志，又很含蓄。顯得不突兀，而且有點警策。

受到西方詩歌影響的詩人，特別是身居美國的詩人，幾乎不約而同地逃離抒情，

這是必然的，在美國大學生中，浪漫蒂克，已經帶上了反諷的意味。而詩歌放逐了抒情以後，別無選擇，就是向智性深化。讀者似乎已經接受了、習慣了那種向比較冷酷，甚至比較陋惡的深潛。但就我個人的愛好來說，還是比較喜歡，向比較溫暖，比較美好的方面探索的詩歌。克強的詩，每每在這方面給我以驚喜。如，「我說如果花裏還藏有森林草場以及緩慢流動的河流我們就可以組建一個全新的祖國」，這裏的「祖國」可能並不是政治性質的，而是自然性質的。但是，畢竟他是嚮往美的。當然，作為詩，這還有一點單薄。我更喜歡那些，感性和智性交融，而感性比較平衡的作品，最好是感性比較充沛，智性又比較潛隱的。在這方面，《生活在紐約長島》給我一種滿足感。在一些生活的碎片中，他的感受是那樣豐富，思緒是那樣活躍。作者像科學家截取細胞的切片那樣截取了「美東時間3月16日下午的情景」，是很暫短的一瞬間，但是，他的心靈卻自由地翱翔：「這當兒世上有多少事情發生多少風箏拉線，斷了再接」等等。更動人的是，他的思想：「如果松鼠斑鳩橡樹都是此地的主人我們就心甘情願充當

配角吧。」美國新批評分析浪漫主義者華滋華斯的詩，說他總是在平凡中發現不平凡，感情往往就走向於強烈（powerful feelings），他當然不浪漫，但是，也不完全放逐浪漫，我把他這種情懷，叫做亞浪漫。這種亞浪漫的特點，乃是發現平凡中的平凡。以一種寧靜的心態，而不是強烈的興奮，體驗、玩味平淡中的美好。他特別偏愛和大自然中最平凡的生命，從小草、蘚苔、綠葉中感到了「仙氣」，他又並不以大自然的崇拜者的姿態出現，只是將之作珍惜生命的載體。作為詩來說，獨特之處在於，不管是多麼珍惜，都是無聲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沉默的「沉默是另一種堅韌的流質它聚合成我們內心的纖維。」對於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葉一花，他總是傾聽，總是在默察，總是在冥想，最多也就是猜想中，有時似乎是在獨語，但拒絕發出聲音來。如果不能說是絕對沒有聲音，他也有所言的話，也是不須要聽眾的自言自語，其性質是一種內審。

他的詩並僅僅限於對大自然的冥想，有時，也透露出社會內涵。讀者想來會奇怪，身居美國令人眼花繚亂的紐約，他的詩似乎超越了這座城市的喧囂，那麼多以

內審取勝詩作，好像不食人間煙火，也許這些是早期在國內的作品吧，可即使在國內，他也身居八九十年代福建師大校園，在那個思潮鼎沸的，悲辛交集的時代，我至今仍然記得他身處弄潮的前衛的身影。在《清明》中，我看出端倪：

雨落在青石板上
 濺起的水花
 有嘴的模樣，就是
 喊不出疼

這可能並不實指對亡靈的悼念，而是自我內心的回味，好在是「有嘴的模樣」，但是，連水花都是無聲的。真正的「疼」是喊不出來的。這一切也許並不完全是我的猜想，他詩中不時流露出的「受難的骨架」等等可作為注解。更為隱蔽的是《幻覺》：即使嚮往著「仙子突然降臨」然而，想觸碰她們之時，卻發現「地上的白色蘑菇已被攔腰折斷」。青春的、童稚的幻想夭折了，但是，沒有形容、渲染悲痛，只有接近說明的句式，使他的詩內涵和外延富有張力。他是如此執著於無聲的寧靜，以至在他聽到深夜蛙入水之聲之時，也發出想「製造一些入水的聲音」但

就是苦於，身邊沒有
 月光一樣寬闊的
 池塘

這樣平靜地守著寂寞，以大自然的平凡草木為心靈的載體，滿足於自言自語，陶醉於深思冥想，潛心營造著一種默默的心境，無聲的詩境，

從心情的寧靜到語言的凝練，成了他自覺的追求。這就構成了他寧靜的藝術意境的營造，也許這樣的解讀是太狹隘了，也許還可從另一個角度看出，他的語言樸素，沒有古典色彩，但是，從題材和意韻，卻似乎與中國古典的「此時無聲勝有聲」有著不著一字的血脈相通。這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他的思緒保持著一種單純的統一和微妙的起伏，但是，有時，也不免略嫌單調如《週末》。

我的序文，已經顯得饒舌，就此打住吧。

（作者：著名文學評論家、教授、博士生導師）



吹開鳳姐的女權迷霧

——女性主義身份的判定尺度

◎宋居師

女權主義（Feminism）又被稱作女性主義。伴隨著婦女解放運動而出現。1920年，Z沃爾斯通克拉夫特發表《擁護女權主義宣言》，成為西方婦女運動的號角。隨著自由平等思想的傳播，西方相繼迎來了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權運動高潮。在中國，婦女解放意識最早出現在五四時期，一批知識份子引進國外女性主義思想為女性解放代言，共產黨執政後將男女平等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固定下來，兩性平等作為主流意識被支持肯定，女性爭取權利的發展過程較為緩和。

表現在文學研究領域，則出現了用西方女性主義學說對文學進行闡發的女性主義批評，也出現了將文學同社會學進行交叉的跨學科領域研究。在傳統的關照視角中，王熙鳳的人物研究常常從人物性格命

運和成因以及王熙鳳和斯嘉麗等西方女性形象比較研究入手，近年來也出現了從女性主義視角下研究王熙鳳形象的著文。然而，研究者題意雖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卻得出王熙鳳具有「出色的管理才能、聰明伶俐的表達能力、圓滑的處世態度、命運的悲劇色彩」這類拋卻女性主義視角的結論；亦有對王熙鳳現代女性意識覺醒的探究，總結其「對傳統觀念的挑戰，對夫權的僭越，以及非凡的自信與才幹」，同時更有文章定義王熙鳳為「女性主義的拓荒者」，然而，這些研究均未把王熙鳳的形象探究納入到系統的女性主義理論範疇，因此大多在停留在人物的女性意識之總結歸納上，未能就王熙鳳是否具有女權主義者身份進行系統的正面論述。本文將結合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和王熙鳳典型人物行為案

例，吹開籠罩在王熙鳳身上的女權迷霧，回答王熙鳳是不是女權主義者這一問題。

一、龜縮在男權鐵籠中的好才幹

自由派女性主義是最早出現的女性主義流派，該派別起源於對自由主義的認同。認為人權不是男性的專利，女性同樣享有人權，應該開放自由市場強調男女機會均等。1983年B弗裏丹所著，被譽為新女性主義宣言的《女性奧秘》宣導女性學習專業技術，追求自我實現，不要囿於專做妻子和母親的狹隘圈子中。Z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女權的辯護》裏則提出了「羽毛族」這一說法，認為已婚婦女就像籠中之鳥，被訓練成終生裝扮羽飾，鶯聲燕語只為取悅主人——他們的丈夫，而且還錯誤的相信自己是被幸福的保護著的。自由派強調

的機會均等，自我價值實現，不陷於家庭的狹小圈子，而這些宣導在王熙鳳身上有著類似的對應。作為「脂粉堆裏的英雄，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頂不過的」王熙鳳擁有「至少有一萬個心眼子」，「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好才幹。在《紅樓夢》中，展現王熙鳳才幹的章回比比皆是，王熙鳳協管寧國府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在此我便不再贅述。可以說，王熙鳳不僅不是陷入妻子和孩子的狹小圈子裏的女人，更不是驚聲燕語討好丈夫的「羽毛族」，手握重權的王熙鳳不僅讓下人心裏忌憚，就是她的丈夫賈璉也怕他三分。

面對寧國府難以操持的喪事，王熙鳳膽大心細，作風潑辣，將整件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條，展現了自己的才幹，不能否認這是其自我價值實現的一個部分。從家庭的狹小圈子裏走出來，王熙鳳獨當一面的能力和自我實現的意識，可以說在表面上與自由派女性主義的宣導隔空呼應。然而，如果只因其擁有出類拔萃的才幹，就認定王熙鳳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未免顯得草率。

在 20 年代頗為流行的《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不幸姻緣》中，學者哈特曼從男性控制女性的勞動這一觀點出發來解釋男性家長制對女性的壓迫。反觀王熙鳳

幹練的作風，老辣的處事手段，卻是在為男權中心服務。她所操持的喪禮，經手的內務，均是家務的範疇，只是從平常人家走向鐘鳴鼎食之家，這類家務顯得更加的繁瑣盛大，但是其勞動受操控於男性家長制的實質則與普通人家的婦女無異。從這個角度來說，王熙鳳沒有拒絕男性家長制對她勞動的控制，反而積極地回應這樣的勞動召喚。在這樣的控制中展現自己的才幹，始終沒有對男性家長制和男權中心的服务拒絕或反抗，任憑她再叱吒風雲，其格局也始終未跳脫出順從的婦女意識。從這個角度來說，當上了大內總管的太監儘管擁有好手腕，好計謀，管理若干宮女下人井井有條，若無跳脫奴才的人格意識，反抗統治階級的獨立意識，仍舊無法被判定成為一個人權鬥士，頂多只是一個將奴隸價值最大化實現了的奴隸。一個自覺甚至積極接受男性家長制勞動控制的女人，若無對男性中心話語展開反抗，做到最好也就是成為一個讓男人讚歎的勞動模範罷了。

一、手握大權的蛇蠍婦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學者艾莉森嘉格爾認為，自覺接受男性壓迫地位，順應男權

中心秩序的女性，就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相互競爭工資的工人一樣，女人會為了獲得男人的青睞而相互競爭對立。這在王熙鳳借刀殺人尤二姐章回中有典型體現，照興兒告訴尤二姐的話說：「我們家的規矩，凡爺們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兩個人服侍的。二爺原有兩個，誰知他來了沒半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在尤二姐之前，王熙鳳就因自己生辰當天賈璉和鮑二家的偷情打破醋壇子大鬧過一場。有學者認為，這是王熙鳳「追求婚姻平等的強烈意識」的體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性愛按其本性來說就是排他的——雖然這種排他性今日只是在婦女身上無例外地得到實現。那麼，鳳姐的排他，究竟是出於性愛的本能還是男女平等的婚姻意識呢？

筆者認為，王熙鳳不許賈璉納妾，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女人的嫉妒心阻攔賈璉的納妾之路，而另一方面，王熙鳳膝下無子，僅育有一女巧姐兒，雖是正室卻未完成延續香火的重要任務。鳳姐之所以把平兒許給賈璉，是因為對平兒對鳳姐赤膽忠誠。鳳姐沒有理由不擔心育有子嗣的二房三房對自己構成威脅。在王熙鳳和賈璉的夫妻關係中，憑藉鳳姐娘家的門第和

自身的才幹，她大可不必依附於賈璉，但是卻不得不依附於賈家，失寵於賈璉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關乎宗祠的大事竟有她人完成，將導致失寵於賈家這個災難後果。綜合王熙鳳嫉妒的本能和在賈家的處境，借刀殺尤二姐，驅秋桐，都是王熙鳳為自己在賈家的局勢和地位所作的打算，將之納入到「婚姻平等」的意識範疇之中未免太過牽強。

激進女權主義學者 C 邦奇認為，婦女的解放必須針對男性的統治，因此要棄絕同男人的性關係，因為正是這種異性關係把女人們隔離開來，使他們落入壓迫者之手。在「毒設相思局」中，王熙鳳戲耍色膽包天得賈瑞深夜受凍，一病不起，可謂是棄絕性關係，沒有落入壓迫者之手的表率。有學者認為，「毒設相思局」是王熙鳳維護女性尊嚴的典範。王熙鳳沒有任由賈瑞調戲，確實維護了她的尊嚴。然而，無權無勢的賈瑞並不能代表男權中心話語，王熙鳳大管家的權力地位本身就已經超越在很多男性之上，如王熙鳳所言：幾時要他死在我的手裏，才知道我的手段。對大管家美色的覬覦和僭越，均是鳳姐心中的禮法所不容的，與其說毒設相思局是對女性尊嚴的維護，不如說是對封建綱常的維

護，對大管家地位和體面的維護。當然，以棄絕性關係作為解放女性的法寶，激進女權主義的這一說法本身就欠考量。

無論是《列女傳》中受男人侵犯而自伐手臂的烈女還是把想吃天鵝肉的癩蛤蟆置之死地的鳳姐，都單純的把性物化了，前者自覺地把自己視作夫家的財產，不容外人侵犯；後者則把性視作倫理綱常不可僭越的秩序，而這秩序，並非夫妻的合法性關係，而是權力等級相對應的秩序。有紅學家考證賈珍和秦可卿的亂倫，如果成立，位高權重的賈珍和媳婦兒之間的性愛，只是可以做不可以說的家醜，膽敢張揚，便如焦大那般吞鴆堵嘴；而下等權力覬覦上等權力，則想都不能想。和西方上流社會裏的那些風流貴族一樣，紅樓夢貴族大家也有這樣微妙的規則。因而，從拒絕性愛上判定王熙鳳的女權意識，言之鑿鑿！

三、人道的判定和嚴格的尺度

女權主義學說發展至今，有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等多種流派，各個流派觀點不一，各有側重。在判定人物女權意識上，不能唯某家觀點馬首是瞻，例如激進派就有部分

人認為只有女同性戀才有資格被稱作女權主義者為女性解放爭取權力，這樣的觀點顯然有失偏頗。女權主義學說處在一個動態發展，不斷更新和淘汰的過程中，即便是同一流派，內部都各有爭執，並未形成成熟的學說體系，因此綜合各家觀點才能把握女性主義學說的共通精髓，在人物批評上才能客觀全面。

簡單來說：自由派認為男性剝奪了女性的各方面機會，講求教育啟蒙和機會均等；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則從階級觀念闡述女性受壓迫的原因，並將生產方式的轉變作為解放婦女的法寶；激進主義內部，有人認為生物因素是造成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主張用技術征服天然生理，有人認為異性性交是女性被男人俘獲的原因，主張棄絕性愛，還有人認為應該消除男人女人的分類，只留下「人」這個概念。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可以實現婦女解放，卻無法解釋在資產階級內部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然而，任由各家主張發展、交叉、對立，對於女性受壓迫的原因和解決方案各執一詞，女性解放最終都指向男女平等，個性獨立這一偉大目標，讓女性在充分實現作為獨立個體的自我價值的道路上掃除由性別帶來的障礙。筆者

認為，一切企圖以女性代替男性，消除男女差異的手段都是極端的，不科學的，而提倡一種溫和的女性解放的手段，旨在就男女權利差異的部分展開深層次原因和解決方案的探討；宣導一種嚴格的個體意識，女性亦或是男性都不依附於任何一方存在。這樣的女性解放是人類共同的解放。而在判定文學人物時，不能將女性主義視作鐵板一塊，亦不可強加當代人物意識，應結合人物的具體處境綜合分析。

綜上，結合各派主張中抽象出的女權主義的判定尺度和王熙鳳人物形象的特徵和案例，筆者認為，王熙鳳獨特的人物形象有別於《紅樓夢》中的其他女性特徵，甚至在中國文學人物形象中都是獨樹一幟的，然而，儘管其雷厲風行，在各項大事小情中展現了自己的實力，獲取了自己的價值，卻始終沒能超越大管家的職能，從女性的立場上試圖撼動男權中心制，反而盡最大的熱忱為其服務。有別於普通民間女子，王熙鳳是男權中心制的受益人，不在於她的女性身份，而在於她的雷霆手段，使她在熟知的男性權力話語中游刃有餘，利用這樣的制度捍衛自己的權力地位，忽視了男性中心話語對女性發展的障礙，而將其他人作為發洩的通道。當然，用現代

人的眼光要求王熙鳳跳脫封建女人的意識，捍衛女性權利顯然是苛刻的，同時也失去了古典人物評析的客觀性，但無可否認的是王熙鳳是男權中心制度的捍衛者，她憑藉自身的智慧和能力以一個女人的身份成為了一個享有男性權利的既得利益者，在女性主義視角的關照下不失為一個外在形象高大的女強人，卻也是女權意識淡漠的小女子。

注釋：

〔一〕刘媛媛，《从女性视角解读王熙凤》，文学研究，2015年第10期

〔二〕卢珊，《从王熙凤和郝思嘉看东西方女性意识觉醒的相似性》，岱宗学刊，2006年3月，第十卷第一期

〔三〕王玉玲，《女性主义的拓荒者——论王熙凤的形象特点及审美价值》，科教文汇，2010年二月中旬刊

〔四〕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岳麓书社出版社，1980年版，第524页。

〔五〕袁勇乐，《小议王熙凤现代女性特征》，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6月第25卷

〔六〕恩格斯，《旷世名典——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社会出版社，第9

页

〔二〕陈一筠，《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派别》，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三〕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岳麓书社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參考文獻：

〔一〕曹雪芹、高鹗，《紅樓夢》，湖南，嶽麓書社出版社，1980年10月第6次版。

〔二〕余亞平主編，《中外女性文化比較》，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9月版

〔三〕李銀河，《我的社會觀察》，北京，中國工商聯和出版社，2014年3月版

〔四〕李銀河，《婦女：最漫長的革命》，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7年8月版

〔五〕恩格斯，《曠世經典：家庭、國家、私有制的起源》，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7月版。

（作者：澳門大學碩士生）



電影《黃金時代》的多元敘事

◎ 秋 塵

《黃金時代》這部電影講述的是民國時期的四大才女之一的蕭紅的一生。蕭紅短暫卻充滿了故事的一生，對很多人而言，恐怕並不陌生。一來，她四大才女的名頭著實很大；二來她的作品也很扎實，尤其是《呼蘭河傳》被港臺列入上世紀的百部作品之一；三來她與蕭軍和端木蕻良的情感歷史，也一直是文藝界常經久不衰的話題；最後，她也算是魯迅先生的學生，和魯迅、許廣平夫婦有著很好的關係和交往歷史，她曾經也寫過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可以說，對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熟悉的人，就一定知道蕭紅，要麼是她的作品，要麼是她的傳奇人生。

我是在看完了電影之後，才意識到這部電影竟然長達三個小時。但看起來並不

覺得冗長，其原因之一我想應該是因為影片中故事的敘事方式。

整體上看，電影是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敘事的。從蕭紅的出生開始，在家鄉的成長、背叛、出走，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直到她在香港的去世，基本上沒有倒敘，唯獨在電影的結尾，場景回到她的童年時代，以她的代表之作《呼蘭河傳》中的文字作為畫外音做結。這樣的安排，也許是暗示，家鄉的記憶塑造了蕭紅的性格，影響了她的一生，也成就了短短三十一年黃金般生命歷程。但影片在敘述這三十一年故事時，對她每一段重要的人生歷程和關鍵的歷史事件，都採用了對相關人物進行採訪、回憶，以及使用相關的歷史資料和同時代的人文發表的文字來增加蕭紅人

生的豐富性。這些相關的人物和資料，間接地成為了電影中的蕭紅的生命軌跡的構建者。

影片是以蕭紅的特寫鏡頭開始，湯唯飾演的蕭紅，內心倔強、外觀淒美，讓人一見猶憐。然後，我們聽見蕭紅的獨白：「我叫蕭紅，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我死於哪年去，享年三十一歲。」這一段敘述，驚心觸目，讓觀眾忽然之間拉進了與角色的距離。一下子，觀眾就對她親切了起來，尤其聽到她自報死於哪一年，享年多少歲時，一種莫名的同情和傷痛之感油然而生——一個多麼年輕的生命，而又多麼輝煌的生命啊。

然後螢幕拉開去，開始用場景繼續展現出她幼年時一幅幅生活的場景。在蕭紅

人生的不同時期，走到銀幕上來給我們講述她的故事的，有她的親弟弟，有她當年寫作時的朋友，比如白朗、羅峰、胡風、聶紺弩、蔣錫金、駱賓基等。除了開始提到的那段，蕭紅再沒有走到前臺來，直接與觀眾對話。

看了這部電影之後，我才從網上知道，關於蕭紅的電影，其實不只這一部，關於蕭紅的傳記，也不止駱賓基一個人寫過。據說，蕭紅的傳記，直接的或者間接的，竟達20多種之多。這個數字，的確龐大了，只是正像電影裏的蕭紅的一段獨白那樣，人們關心她的，並不是她的文學作品，而是她慘澹的情感人生。

假如我是蕭紅，我會怎麼看這部電影呢？我曾經問自己這個問題。除了開始的部分，蕭紅的朋友們，也許有些只能算是相識者都被請來講述她的故事，更不用說，那些曾經的當事人、參與者留下的關於她的歷史文字。但是，關於她的歷史的真相，也許連她自己都並不能盡知全貌的吧？也許這正是許鞍華導演選用了那麼多人物視角來進行故事敘事的原因——一個人的所謂的歷史其實是他人的建構。

我還注意到，在這些「他人」之中，

有三對夫妻的出現格外地意味深長，一對是白朗和羅峰，一對是胡風和梅志，還有一對是魯迅和許廣平。不知是不是我的敏感，每一次羅峰和白朗的出現，都讓我倍感蕭紅孑然一身的孤寂。而胡風夫婦的出現，則會提醒我蕭紅曾經失去的那兩個孩子。即便在與魯迅和許廣平交往的那一段裏，突出的依舊是她情感上的「孤寂」。

我曾經以為，多視角的使用，形式上可以對人物和事件進行更加客觀的、立體的敘事。但是顯然未必一定是這樣。尤其是在這部影片中，當蕭紅與蕭軍分手之後，她有一句臺詞說，她的朋友都是蕭軍的朋友。歷史也許真的是這樣的。那麼蕭紅又怎能有鹹魚翻身的機會呢？即便我們雄心勃勃的女許導演，又真的理解她，真的能更準確地再現或詮釋詮釋她的真實歷史嗎？好在，好在蕭紅有她的作品，有《生死場》，有《呼蘭河傳》……

一句題外話，電影的畫面感非常的藝術，每每給人一種遙遠的美感，比如哈爾濱的那一次洪水的鏡頭。我還注意到電影中喜歡用兩種顏色，一種是黃色系，另一種是藍色系的。黃色系也許是為了迎合黃金時代這個名字，藍色系也許是為了印合

蕭紅孤寂蕭索的生命。導演把這兩張顏色調和得常常像油畫一般，凝重得令人嚮往。

另一句題外話，電影在幾個關鍵的事件上，並沒有把故事講得明晰，當然想到這樣是不容易的，畢竟，對於蕭紅當年情路的是是非非，如果歷史還沒有一個定論的話，恐怕未來也不會有更清晰的真相了。那麼，蕭紅，就讓他們去說吧，盡情地說。因為你該說的，都已經在你的作品之中了。

筆走至此，感慨不已，特作七絕一首，紀念這位天才般的文學前輩：

生死場中尋故命，
呼蘭河裡覓精靈。
身前情斷天涯路，

一世春秋任爾吟。

（作者：旅美華文作家）



向抗戰先烈、先輩致敬！

——《抗戰題材的微型小說選》（代序）

◎凌鼎年

三月中旬，我應邀去北京參加《小說選刊》主辦的「首屆全國微小說高峰論壇」，下午又參加了《小說選刊》「茅臺杯」獎的頒獎活動。在活動現場遇上了新任的《雨花》主編李風宇。他知道我與海外的華文作家比較熟悉，對我說能否約一些海外作家寫的抗日戰爭題材的作品，最好是抗日老兵的口述史。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的日子，當年上過抗日戰場的即便是娃娃兵、學生兵，如今也都是耄耋老人了，最年輕的也近 80 歲了。就算長壽，估計所剩也寥寥無幾。如果能收集到抗戰老兵的回憶錄、口述史，自然彌足珍貴。這個出版選題有價值有意義，我的心為之一動。

由此也啟發了我。所謂在文言文，吃

什麼飯，當什麼心。我是從事微型小說創作、研究、傳播的。我何不主編一本《抗戰題材的微型小說選》呢。這樣的主題，這樣的題材，這樣的文學樣式，以前肯定沒有出版過，無疑是填補出版空白的。而且，在紀念抗日戰爭 70 周年的日子裏出版這樣一本集子，不僅對微型小說的文體是一次極好的亮相機會、宣傳機會，也是我們後輩借此對抗日先輩的一次致敬，一個很好的紀念。

在我的閱讀視野裏，反映抗日戰爭的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很多，反映抗日戰爭的微型小說有多少呢，我沒有做過專門的瞭解與統計，心中沒有底。常言道「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這集子能否編成，我打了個問號。

我印象中，我是寫過幾篇抗日戰爭題材的微型小說作品的，我在我的電子版作品中尋找了一遍，竟然找到了十多篇。我想我的文友應該也有，我頓時有了信心。

我就把我的設想寫了個簡單的策劃書，發給了我熟悉的出版社編輯，想聽聽他們的意見，回饋資訊很快，出版社的編輯從專業的角度看，也認為是個不錯的選題，願意先報選題。

我是個做事喜歡爽快的人，說幹就幹，在選題還沒有通過的情況下，我就給我的文友發了徵集稿件的郵件，大約發出 100 多封信，沒有想到反響十分熱烈，當天就收到了 20 多萬字的作品，第二天又收到 20 多萬字作品，累計超過 50 萬字來稿，這大大超過了我的預想，也大大增加了我

的看稿量。但我很欣慰，因為來稿多，我就可以好中選好，優中選優，集子的品質就有保證，雖然我辛苦些。

我聯繫的這些作家，大部分都是微型小說界的中堅力量，實力派作家，有的已出版過二二十本微型小說集子了，但照樣有作家回復說，從來沒有寫過抗戰題材的作品，有的僅有一篇兩篇。當然，也有的一下給我發來了10篇20篇，任我挑選。讓我為難的是，有幾位文友發來的作品論品質一流，但僅僅帶到一兩句抗日戰爭的背景，整個故事發生在當代，只是與日本人或日資企業有關而已，這不符合我整本集子選稿的宗旨，只能忍痛割愛。還有的篇幅超過了2500字，有的甚至三四千字，作品再好，也只能刪去，因為已不屬微型小說的範疇。

對於50後、60後、70後，關於抗日戰爭資訊、畫面，多數是從《地雷戰》《地道戰》《小兵張嘎》《雞毛信》等電影中獲知的；現在的80後、90後、00後，抗戰的歷史似乎是個近乎遙遠的故事，他們對抗戰的瞭解，基本上都是從近年的抗戰電視劇中瞭解的，這些抗戰神劇的編劇有著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好看是好看，但

戲說的成分大了，與歷史的真實就相去遠了，或多或少會誤導下一代。

微型小說雖然是小說，與紀實文學、口述歷史難以相提並論，但我在徵稿中明確：胡編亂造、憑空戲說的不要，最好用小說的形式，較為客觀、真實地反映抗日戰爭期間方方面面的人與事。讓如今的讀者，在閱讀我們的作品時，既有文學的欣賞，也能多多少少瞭解一些七八十年前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家庭、風俗，瞭解戰爭的殘酷，人性的溫暖，種種、種種。我注意到，參與創作的既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老作家，也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中年作家，但沒有看到80後、90後作家的名字，或許因歷史的關係，當年驚天地泣鬼神的重大歷史一頁，與他們已有些隔膜了，所以，重溫歷史，珍視歷史是多麼重要。這本集子中的作品，寫到了抗日的正面戰場，寫到了敵後的隱秘戰線，寫到了國軍，也寫到了八路軍、新四軍，也寫到了民間的抗日武裝，寫到了重慶陪都，也寫到了延安，寫到了潛伏，寫到了鋤奸，寫到了日本的俘虜，也寫到了日本的反戰同盟，寫到了民族的骨氣、良知，也寫到了民族的屈辱、恥辱，值得我們記

取，值得我們反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牢記歷史，有助今天。戰爭的殘酷，戰後的傷痛，甚至要幾代人才才能撫平、消泯。和平，永遠是全世界各國各族老百姓期盼的。

作為一本文學性的小說集子，寫得再好再精彩，與當年在抗日戰場上浴血拼搏將士的捨死忘生、慷慨悲歌來說，在敵後戰場上的出生入死、機智勇敢來說，肯定是相對單薄的、蒼白的、平面的，微不足道的。但借微型小說的形式來為20年前用血肉築新的長城的先輩、先烈立此存照，刻畫形象，留諸後人，永志紀念，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能為此做一點點力所能及的事，是令人欣慰的。

當然，我們後人，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讓我們以十二分的虔誠、敬意，向千千萬萬為抗戰勝利奉獻青春、奉獻生命的將士與無名者致敬！

（作者：小說家、文學活動家）



泰戈爾在我心中

——我的大學與繆斯之旅

◎ 孫鳳玲

在我的書櫃裡，有著近百種全世界各地不同詩人的各種詩歌選集全集，但有一本詩集，卻將我青春淚漬斑駁的印痕，一點點烙在那紅白相間的封皮上。這本白色背景圖四周輔以紅色邊框封面的詩集，我珍藏了十多年，封面上斑駁磨損的漬痕，一如我十幾年坎坷多磨的青春求學與繆斯之旅。十幾年來，多少感動，多少辛酸，似乎都可以從這本厚厚的《泰戈爾詩選》中略窺端倪。在季羨林先生的序言下方，十幾年前我寫下的幾行小字，依稀如初：

身在囹圄，志當凌雲

——八木若雲 2002年4月15日

生如驕陽般炙烈 死如夜之靜美

時間，象一只沙漏，無情地流逝了年華，流逝了青春十幾年種種的記憶，但心

靈深處刻骨的回憶，卻依然歷歷在目。我在倍感韶華易逝時，也深深感恩那無處不在的「我的上帝、我的主、我的朋友、我的情人」，他以攝人心魄的自由之歌、光明之海，梵我合一的心靈力量，伴我走過了苦澀、坎坷多磨的青春，使我此刻驕傲而幸福地靜靜坐在桂子山下，寫下這篇埋藏在心底、釀制了十幾年的青春手記：泰戈爾在我心中——我的大學與繆斯之旅。

鏡頭，緩緩回溯，滑回到十六年前的那個九月。那一年，我16歲，雨季花一樣燦爛多夢的年齡，我卻徘徊在人生的歧途——出生於世代為農的家庭，文盲出身的父母無論如何不願意送我去學校讀高中。席卷大江南北的打工之潮，使父母迫切地希望我能象姐姐們一樣，到城市打工，每

月能將那充滿血汗與屈辱的微薄工資按時交給他們。在經歷了暑假2個月父母愚昧的暴力鞭笞與斥罵之後，在持續的饑餓感與絕望中，那年9月30日的下午，我最終含著淚水，一個人悄悄捆紮好行李，從剛剛入讀了二十幾天的流芳高中悄然離去……

此後的人生，一如父母所願，我加入到龐大的打工隊伍中，來到武漢這座當時還不算繁華的城市，開始四處漂泊的打工生涯。一次次，從城市的一個角落漂向另一個角落，忍受著老闆隨時的斥罵，忍受著所謂城裏人的冷眼譏罵——尊嚴、自由、隱私、青蔥的校園、朗朗書聲……這些遙遠而陌生的詞，只存活在小學初中的教科書中，當我踏上這條艱辛的打工之路時，

一切都被埋葬。

充滿屈辱、單調、閉塞的打工生涯，就這樣，在老闆的斥罵聲中，在油膩的託盤，令人作嘔的酒精嘔吐物中，一點點艱難地捱過。打工的生活雖然艱辛、屈辱，但內心深處，總有一個躁動不安的因數，一次次在夜深人寂時，在蒙著被子哽酸湧泄的淚眼中，或遠或近地呼喚，呼喚著我內心深處尚未窒息的心念——我要讀書！我要讀書！通過讀書改變這種蒙昧無知沒有尊嚴沒有自由的生活，讓青春不再空空地虛耗。一次次，夜寂時，我遙望著城市的燈火，略帶哽酸地回憶年少時手挽著放牛繩，在空曠的田野裏高聲朗誦著各種詩歌時的那種愜意、幸福。一次次，我追問自己，年少時在心底已經孽芽的文學之夢，繆斯之夢將何處重尋？何處重覓蹤跡？

在幾分迷茫幾分蒙昧幾分酸楚中，我頻頻一個人偷偷逛書店，逛地攤，用少得可憐的零花錢，買回一本本或嶄新或泛黃的書，來告慰那略顯早熟卻又躁動不安的青春。

已經記不清楚那天買書的具體情景了。只依稀記得是一個上午，自己一個人偷偷從菜市場溜出去，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

來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後門的一片小書店。帶著幾分膽怯幾分寒酸，站在一排排書架前，輕輕撫摸著一本本裝幀漂亮整潔的書。我無法回憶起當初目光是如何落在那本紅白相間的《泰戈爾詩選》上的。泰戈爾？何許人？我從沒聽過。只是清楚地記得，當初挑選這本書的理由僅僅只因封面上寫著「教育部《中學語文教學大綱》指定書目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一切，僅因這是教育部指定的中學生必讀書目，22.80元的單價，對於當時的我，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那時的我，每天跟隨父親一起在塗家溝高架棚臨時搭建起來的一個菜市場賣菜。父親每天早上四點左右就出門去蔬菜批發市場，晚上九點左右才拖著疲憊不堪臃腫的腳步回家；而我則每天早上六點左右出門去塗家溝菜市場，晚上七點左右將沒有賣完的各種菜全部用自行車拖回來。我不記得當時內心經歷了怎樣的掙扎，才最終買下了這本書。也許，是長期單調沉悶的生活，使我迫切地希望能通過一本好書的閱讀，來釋放青春種種的不快、辛酸、孤寂與蒙昧。

此後的日子，生活依然單調沉悶，我依然每天早上6點左右騎自行車去菜市場，

唯一不同的是，每天下午一點多到四點多，菜市場沒有人時，我會拿出《泰戈爾詩選》，高聲入迷地朗讀背誦其中的各種詩篇。

五河環繞著的英雄之國

辮子盤在頭上的錫克

回應古魯的號召站起來了——

「阿拉克尼朗董」——

一聲歡呼拉斷了

奴隸腳下的鐵鎖、繩韁

——《被俘的英雄》

地上躺著一位貧窮的婦女，
身上裹著一件襤褸的破衣，
她走來跪在比丘蓮花足前
雙手接足頂禮。

婦人躲進樹林，從身上
脫掉那件唯一的破布衣，
伸出手來，毫不顧惜地
把它拋出林際。

——《無上佈施》

《故事詩》中，《被俘的英雄》那盪氣迴腸悲壯激昂的民族讚歌，《報答》如蓮一樣纖塵不染守望真愛的純潔女郎，《無上佈

施》為了心中至高的信仰，毫無保留貢獻
僅有襤褸破衣的婦人，讓我枯塞寂寥的青
春，第一次深深頓悟，什麼是真、善、美，
什麼是虔敬、信仰、忠貞與愛！

這是你的腳凳，你在最貧最賤最失所
的人群中歇足。

燈火，燈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
之火把它點上罷！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稱你為我的一
切；

只要我一誠不減，我就感覺到你在
我的四圍……

在那裡，心是無畏的，頭也抬得高昂；
在那裡，知識是自由的；

賜給我力量使我的愛在服務中得到果
實。

賜給我力量使我永不拋棄窮人也永不
向淫威屈膝。

光明，我的光明，充滿世界的光明，
吻著耳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

——《吉檀迦利》節選

《吉檀迦利》中，那時而舒緩柔麗時
而急遽遒勁的語言，那鏗鏘激昂的光明之
歌、自由之歌，梵我合一的愛之歌，一次
次讓我深深感動，讓我心潮澎湃，使我苦
澀枯煩的青春充盈著希望與愛，我心中沉
睡多年的對知識、自由、光明與愛的渴慕
之情慢慢蘇醒，並喚醒了我心中沉睡已久
的繆斯女神。

那年初夏，在蕭寂困窘的菜市場朗誦
泰戈爾的詩，成為我青春記憶裏最美的華
章。頻頻的朗讀與背誦，我也一次次因情
而動，在詩頁的邊角用生澀的語言寫上幾
行小詩，或是有關人生善惡美醜的小感悟。
那曾經黯然孤寂的青春，因為泰戈爾的詩
而變得鮮活起來，豐盈起來。

贊詩

為著一份久違的激情

我雙手捧著你

我用心聆聽著

你的低吟淺唱

我願把那朵晚開的白蓮

獻在你蓮花似的腳邊

只因

我在心底頂膜著你

哦！《吉檀迦利》

心中的獻詩

永恆的愛

人類精神的無量佛陀

哦！泰戈爾

我心中的阿波羅

你以犀利的耳目

力透紙背的筆刃

引導我前進

在通往聖地的途中

我不畏荊棘危崖

只因

我沐浴著你的光環

2002年4月24日於塗家溝

我渴慕著

你的擁抱

梵我一如的愜意

我忍受著世人的冷落

只等待著你的擁抱

哦，我的吉檀迦利

2002年夏

此後十幾年時間，泰戈爾和他明麗充盈著哲思與愛的詩篇一直陪伴著我，陪伴我依然青澀、多磨的青春，他那流淌著溫暖與愛的詩句，是我單調沉悶打工生活中一劑不可多得的藥方，一次次療治我頻頻受傷的身心。

為了追隨《吉檀迦利》中那無所不在的自由之神、光明之海、愛神灑脫不羈的腳步，我選擇了倍感辛酸與感動、曲折而又多難的自學之路。在艱辛流離失所的打工之餘，我報名參加全國成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從零開始自學新概念英語全四冊，數次報名參加全國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在考研頻頻失敗的挫痛中，一次次嘶心裂肺痛哭流涕之中，我一次次用嘶啞哽咽的聲調高聲朗誦《吉檀迦利》中充滿希望、光明與愛的頌歌，以此來療愈青春求學途中頻頻受挫、創痕累累的身心。

在多年艱辛漂泊的打工自學之餘，在流連於大街小巷各種書店地攤之餘，在廣泛閱讀世界各國偉大詩人不朽詩篇之餘，我嘗試著用詩寫下自己漂離的打工生活，略顯痛感的生命與青春。十幾年的自學之

路，詩歌創作之路，使我的詩最終從青澀的模仿，到今天逐漸成熟，漸成自己的語言意境風格，並得到國內一些知名學者、詩人的讚賞。我深深地知道，這一切的成長、成熟，都得益於十二年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後門那片不起眼的小書店，那一場與泰戈爾和他的詩意外的邂逅！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憐，但你永遠用堅決的拒絕來拯救我；

「我以為我的財富與權利勝過世界上一切的人……一覺醒來，我發現我在自己的寶庫裏做了囚人。」

你穿著破敝的衣服，在最貧最賤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驕傲永遠不能走近這個地方。

——《吉檀迦利》節選

泰戈爾充滿人生智慧與哲思的詩篇，成為我此後十幾年人生的砥礪與座標，激勵我不斷向上向善，拋除心中狹隘的小我，學會愛，愛自己，愛他人，愛每一個生命，無論尊卑貴賤。

此刻，一個人坐在華中師範大學桂子山上，靜靜地回憶著與泰戈爾和他的詩意外邂逅的種種，以及此後十幾年艱辛漂泊

的打工生涯中，他和他的詩曾給予我的感動、希望、愛與心靈力量，喉管裏時時哽咽酸澀，眼角的淚花時時會不自覺地湧動！

桂子山的金秋，每個廣場、教學樓、每條林蔭小道上，都瀰漫著桂花淡淡的清香。回想十幾年坎坷多磨的青春，艱難的自學之路，那讓人心潮起伏的繆斯之旅，內心不禁感慨萬千：當年若不是有幸在財大那片小書店意外邂逅泰戈爾和他不朽的詩篇，我心中沉睡多年的求學之夢、繆斯之夢是否會蘇醒？或者，是否會永遠在那單調湧動著酸臭、愚昧與暴力的菜市場沉睡？虛空地耗空我蒙昧渾噩的青春，然後，寂寂地老死……

（作者：碩士研究生）



德國社會如何面對伊斯蘭文化？

◎ 彭小明

2015 年夏季開始，大批穆斯林難民進入德國。整個歐洲都發生了震動。默克爾總理在報告中告訴人民：「接納難民還將改變德國！」今年一年，估計將有 80 萬難民入境，很可能多達一百萬。以後還將繼續到來。五年到十年以內，德國就會像美國那樣，大批穆斯林取得合法身份，走出難民住所，跟我們比鄰而居，他們的孩子長大成人，跟我們的孩子一起，共同建設德國。到處出現比今天更加多彩的多民族群居現象。阿拉伯語成為重要的外語，大中小學校穆斯林青少年將占很高的比例。根據世界報報導的數字，三十五年以後，2050 年，歐洲的穆斯林人數將達到 10.2%，（目前為 5.9%。但這是難民潮之前的統計）這個時期中，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極端恐怖主義犯罪會不會在德國和歐洲氾濫成災？這樣的念頭不可能不出現在許

多公民的心頭。然而，德國知識界已經開始從容面對。敏斯特大學的伊斯蘭神學中心就是一個穆斯林師範教育機構。最著名的典範當屬該中心的柯希德教授。他出生於巴勒斯坦，取得了奧地利和德國的學位，同時又在黎巴嫩修完了伊斯蘭神學院的課程。他告訴人們，伊斯蘭經典《古蘭經》裏面並沒有「殺死改變信仰的人」這樣的教條。從 2012 年開始，敏斯特大學就開始招收穆斯林大學生，為德國和歐洲國家的各級學校培養新一代伊斯蘭神學教師，給那裏的穆斯林青少年授課。

我們知道，青少年教育是給人打下思想基礎的教育。是人民意識的底色。我們從小接受的黨化教育就是從幼兒時代開始的。雷鋒王傑劉胡蘭黃繼光……是學習的榜樣，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反對美帝國主義，懷疑「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觀念

也是從小就開始灌輸入腦。直到離開中國大陸，接觸了西方的普世價值和真實歷史，我們的反洗腦自我覺醒才逐漸復蘇。「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分離主義意識，也是從民進黨修改教科書的時期全面鋪開的。阿拉伯世界的青少年教育也充滿了仇恨猶太人，仇恨西方，捍衛伊斯蘭原教旨的內容。改變這種現狀的手段不是暴力，也不是放任，而是從青少年教育抓起，釜底抽薪。培養學識精湛的學者，編撰學術嚴謹的教科書，開設詞章精彩的伊斯蘭文史課程，（想一想，《一千零一夜》是多麼具有想像力的傳說故事！）培養出符合阿拉伯民族傳統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知識份子和現代公民，極端恐怖主義將不再得售其奸，至少很難在德國和周邊地區找到滋生的溫床。

另一方面，世界上已經出現了不少曾

經的穆斯林，今天的叛教者。最為著名的當屬生於索馬里的阿楊荷西阿裏女士。她叛離伊斯蘭教以後，曾在荷蘭生活，跟她一起拍攝批判恐怖主義電影的荷蘭公民梵高先生慘遭恐怖分子殺害。阿裏收到死亡威脅後移民去了美國。她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控訴仍然沒有停止。在德國也有這樣的人。科隆前穆斯林中心委員會Nebeha El-Mullei就是一個脫離伊斯蘭教的自由人社團。這些曾經是穆斯林的男女女，完全認同自由的生活，尤其是女性，一律不戴穆斯林婦女必戴的頭巾。他們經常在德國各地舉辦活動，講述他們的經歷，反對歧視婦女的現象，反對伊斯蘭法律（石刑、砍手、割陰）。當然他們的行動都得到德國警方的嚴密保護，也得到德國人民的贊許。他們的住址絕對保密。在瑞士和奧地利，也有他們的兄弟組織。他們甚至認為穆斯林的經典本身就是極端主義教條。即使「殺死叛教者」的律令在《古蘭經》裏不能直接找到，畢竟那些「聖戰」之類的叫囂仍然俯拾皆是。對於這個問題，應該怎樣看待？其實任何歷經千年的宗教教條或者經典文獻，總不免會有精無互見的現象。基督教經常教誨人們，要愛你的仇敵。馬太福音甚至說，如果他

打你的右臉，你把左臉也伸去挨打。如此謙卑退讓，似應是非暴力的典範。但是《聖經》的其他章節裏，不論是舊約還是新約，都包含一些充滿暴力的言詞。誅殺異教徒的言行，包括「不留一切活口」的命令，聽來完全是反人類的罪行。十字軍的殘暴、對伽利略的宗教裁判、對布魯諾的火刑，早已駭人聽聞。其實平心而論，中國的儒家經典《論語》提倡仁者愛人，天下歸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是也有孔子入仕刑部，立刻誅殺少正卯的內容。再說得近一點。史達林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和《毛澤東選集》五卷都是毛澤東時代知識份子必讀的政治教材。其中也有「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這樣聽起來還可以的好話。毛澤東的好話就更多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的恐怖主義律令也非常多。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之下，除了地主、富農、牧師和企業主，大量的社會主義革命家也都被追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口號更是一句不折不扣的暴力口號。共產主義殺戮的生命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朝代，也遠遠超過納粹希特勒。人間萬幸的是共產主義不是什麼千年經典，僅

僅一百來年，勢當速朽。

伊斯蘭教也已是傳承千年的宗教，信眾十幾億人，遍及五大洲，作為一種已有傳統的意識形態，不容小覷。我們只能期待伊斯蘭教自身發展變遷。中國的儒家也曾發生過纏足束胸、包辦婚姻、不准再譙的封建陋俗，堪與伊斯蘭教的割陰、頭巾、蒙面、族內婚習俗相比。所幸有五四青年起而反抗，更有胡適魯迅們為之吶喊，終於贏得了中國風俗的現代化。伊斯蘭教地域分佈遼闊，政令不出一門，世俗化的進程步調遠不一致。但是畢竟已經有許多曾經的穆斯林站出來追求自由和解放，也有深諳伊斯蘭教義的學者從理論上開始「整理國故」，重新闡述。德國敏斯特大學伊斯蘭神學中心的努力成果將舉世矚目，柯希德教授也將桃李滿天下。政教分離和擺脫極端心理的世俗化前景終將逐步向伊斯蘭世界深入推進。

中國的伊斯蘭知識份子也應該指派年輕的學者到敏斯特大學來留學，將這樣的學術和教學方式移植到中國去，形成全新的伊斯蘭神學及其教學體系，造福於中國的各族人民。

點贊文科學習

◎ 沈寧

現在中國，到處一樣，理科生得意洋洋，文科生垂頭喪氣，因為理科生容易找到高薪工作，文科生祇能擺攤賣白菜。從小學開始分文科班理科班，學校家長全社會，把文科班看做落後生班，認為文科生什麼都不學，全部放羊，祇有理科生學習壓力重，整天要做題。可是九九表背得滾瓜爛熟，就是有學問了嗎？

自古以來，人上學讀書，都要有動力。在西方，有不少人讀書的動力是追求真理，造福人類，比如居里夫人。可是在中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讀書，為的是喫飽飯，住豪宅，玩女人。中國古話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盅粟，就是這意思。中國古代，完全沒有理科的概念，所以大家一股腦都去讀文史，讀了文史能考秀才舉人進士，入朝做官，天天喫飽飯，有大房子住，還可以隨便玩女人。到一百年前，中國人終於知

道世界上還有理科這一說，而且造槍炮印鈔票都得靠懂理科的人幹才行，之乎者也沒多大用，所以理科開始喫香了，中國人集體轉向，一股腦的奔著理科去了，讀了理科才能做技術員工程師，甚至部長總理書記，賺高工資，天天喫飽飯，夜夜玩女人。這都很自然，很正常，很常態，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不過，即便理科生容易找到好點的工作，也完全不必自以為多麼了不起，用不著那麼蔑視文科學習，張口閉口地嘲笑侮辱文科生，把文科生看得一錢不值。再早的不說了，就算從一百年前中國人知道有理科這一說開始，中國文科生裏做成大事業，千古留名的，恐怕還是比理科生多，至少不會少於理科生吧。要細說起來，還真讓中國理科生們無地自容，咱們中國這一百年，有過什麼科技成果，能在世界上說得出口的？怎麼著中國還算得了一個諾貝

爾文學獎，文科的，咱們得過一個科技諾貝爾嗎？記著，楊振寧李政道是美國人。中國理科生，也就在中國人自己的圈子裏，敢對著被人欺負慣了的文科生吹鬍子瞪眼，是驢子是馬，拉到國際上去溜溜，全薦了。

在美國加州硅谷走一圈，到處都是中國理科生，清華的，北大的，都在美國高科技公司裡打工。幹什麼活？編程。中國人頭腦靈活，能想清楚程序，也能幹，人家公司願意用。可是往公司領導層那兒一瞧，全沒中國人的影兒。我這也是遵循中國人的思維程式說事，其實編程是挺好的工作，工資挺高，喫喝不愁，玩女人大概不能很多，但小打小鬧還行。可是照著中國的人的標準，小康生活算不了成功，必須能當領導，能當官，那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怎麼著還得說，中國理科生也就是祇能對中國文科生擺譜耍橫，到了硅谷還是不靈，差了一截子。

這不，美國谷歌公司新成立一個母公司，叫做字母表（Alphabet），任命印度裔達爾·皮猜為 CEO，沒咱們中國人什麼事。這下子，包括蘋果在內的全球三大移動互聯網公司，兩個被印度人管控，微軟的薩迪亞·納德拉，谷歌的達爾·皮猜，印度人完勝。美國標準普爾評為 500 強的企業，美國人任 CEO 的當然最多，其次就是印度人，做一家大公司 CEO，連標準普爾自己的 CEO 也是印度人。根據財富雜誌調查，世界 500 強公司的 CEO 裡，祇有兩位大陸中國人，兩位北美華裔後代。雖說不算全軍覆沒，也差不多，咱中國有 14 億猴精猴精的人，滿神州的理科生，被稱做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呢。

我不是理科生，沒資格評論科技方面的事情，但想來想去，怎麼著中國理科生的技術也不會比印度人差太多吧。我想中國理科生自小讀理科班，清華北大畢業，一輩子在中國是人之驕子，也絕不肯自認技術不如印度人。那麼為什麼中國理科生在硅谷都祇是低端編程，頂多幹到初級經理，能做中級經理已算鳳毛麟角，更別指望擔任高級領導職位了。

有美國專業人士總結，第一中國理科生不如印度人那麼能夠適應美國企業的文化 and 制度。第二中國理科生在語言交流上

不如印度人，往往不會表達自己的意見。第三中國理科生在美國企業裏常常不是相互幫助而是互相拆臺，所以同歸於盡。（這第三條是咱們中國人的老毛病，老傳統，超出本文題目，暫不討論。）這就體現出最根本的原因了：中國理科生接受的文科教育太差。

要升職，要適應美國企業文化和制度，要做企業領導，必須具備的條件和才能是什麼？是具備足夠的情商，是有領導他人的能力，這不是光憑熟記方程式能算題就完成得了的，這得有長期的認真學習和實踐訓練才行。領導他人是什麼概念？首先必須懂得人怎麼思維，怎麼行為，怎麼喜怒哀樂，怎麼衣食住行，然後才能對症下藥，做出決策，引領他人前進。而瞭解人，熟悉人，就是文科的功課，因為文科就是以研究人為專業基礎的。不管是歷史科，哲學科，法科，心理科，政治學科，宗教科，經濟科等等，都必須研究人和由人構成的社會和文化。那語言文學科，當然更是直接研究人的習性，情感，行為。

很少例外，中國學校出來的理科生，最缺少的就是這些文科學習和訓練，從小一天到晚算題解方程，根本不知道人會怎麼思想和行為。很多理科生還拿不懂女生的細膩情感而自豪，網上有很多這樣的段

子，津津樂道。連跟女生談戀愛都不會，還能領導一個企業嗎？這些中國理科生，頂多祇配成天才在電腦前面編程。

至於語言交流，敢說那不是文科的事？別說英文了，就算母語中文，很多中國理科生也運用不了。光會說話，不算本事，全中國人誰不會說中國話，可是很多人確實就不大會說中國話。

現在有網絡，阿貓阿狗都敢把自己的文字貼上網去，太多的貼子簡直無法閱讀，語句不通順，錯別字連篇，這也敢拿出來讓人看，我都替那些作者們臉紅。而不知羞恥二字，也就是缺乏文科學習的結果。如果這些狗屁文字是文科生所為，那他們根本不及格，就別自稱文科生。如果是理科生的作品，那就真得趕緊補課，起碼把字能寫對。連中國話都不會正確地說，還要說英文，還要交流？交流交流，不是你一個人囉嗦，一天到晚關在自己小廚房裏，自說自話，你得能讓人家聽，聽得懂。而一涉及到別人的參與，就又是前面說的需要文科訓練了吧。

事實上，就是因為缺乏足夠的文科學習和訓練，所以中國理科生們永遠祇能做幹活的工具，而無法進入管控層次，至少在美國的企業裏，做領導的更多需要思想能力，而不單單是技術水平。

中國理科生最愛在文科生面前誇耀的，就是他們學過邏輯推理，說文科生們沒那種訓練。因為從小學就被罵做落後生，學習不好，很多文科生也就認了倒黴，自以為缺乏邏輯推理訓練。真是那樣嗎？退一萬步說，就算理科生真的學了邏輯，受到推理訓練，也別光練辭字罵人，寫一篇有理有據語言通順字正腔圓的文章出來，讓大家看看。再說了，文科生們雖然沒有從數理方面着手，可也不少學邏輯推理，祇是有時候他們自己都沒有覺察到而已。那麼多膾炙人口的推理小說，大概不都是理科生創作的吧？我很想知道英國的克利斯蒂和日本的松本清張，上過多少數學物理化學課，寫福爾摩斯的柯南道爾是清華畢業的嗎？

要分析研究歷史事件，要探索宇宙的存在和認知，要寫出動人心弦的小說，要做好法庭辯論，要看透人的思想和心理，要研究管理社會政治和經濟，真正努力的文科生，不光必須系統地學習掌握邏輯和推理，還要學習認識人，分析人，熟悉人，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行為，遠比理科生需要學習更多的專業，受到更多的訓練。文科生完全沒有任何理由，自認比理科生差，事實上，文科生很可能在情商方面遠超理科生，更有資格擔任領導。

不是嗎？查查看，美國總統裏，有多少是文科生，有多少是理科生？英國和歐洲各國的國君，王子，總統，首相，總理，有多少是學文科的，有多少是學理科的？大概祇有中國的國家領導人裏，比較多理科出身，原因在本文開篇說過了，出於就業利益驅使。

若論理工科，在中國排名第一的，可算清華。但衆所周知，清華大學創辦的時候，以文科見長，當時清華最有名的教授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都是文科大師。祇是一九五二年盲目學習蘇俄，硬分文理，才把清華辦成理工專業大學。現在醒悟到過去的錯誤，又想恢復文科諸項，但積重難返，尚需時日。

百年之前，中國第一代理科學生，莫過於庚子賠款留學生。那個時期，中國人還不知道理科是怎麼回事，學校教師都是文史出身的秀才舉人，考試也無非經書子集之乎者也。考取庚子賠款第一期的學生曾昭權和梅貽琦，第二期的趙元任和竺可楨，第三期的葉企孫，乃至後來的錢三強，李四光，曾昭掄，錢學森，鄧家先，周培源等等，都出身書香門第，自幼苦讀經史，鄧先是文科生，到了美國才改學理科，可是成就等身，開創中國自然科學的先河。現在中國哪位理科生，斗膽敢跟這些人的

學問相比，哪個理科生敢說自己每天讀書500頁，逢三一文，逢五一詩；哪個敢說「誰背中國古經傳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這樣的話。

從這些大師們的經驗總結，文科底子好，改學理科也基礎雄厚，能夠做得出色。相反，祇有理科底子，文科全然不通者，改學文科，是否有成功的實例，我孤陋寡聞，哪位有明證，不妨指教一二。而且這樣的理科學生，即使終身從事理科工作，能否做成功，也未可知，恐怕頂多如前所述，做個編程，養家糊口而已，哪裏比得了上面所說的那些開山大師們。

總而言之，不管您是文科生，還是理科生，文科學習還是非常重要的。文科生們完全不必自慚形穢，抬不起頭，覺得低理科生一等。理科生們也不要太過驕傲，自以為是，蔑視文科學習，嘲笑文科生。要想事業成功，最要緊的不是技術，不是會解方程，而是對人能瞭解和掌握，熟知人的思想和情感，最起碼得會說話，會寫信，有本事找個理想的女朋友，給大家看看。

（作者：旅美華文作家）

循著先輩的足跡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

◎王黎冰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萬眾一心、共禦外侮的大局意識；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必勝信念；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抗戰精神

從失敗走向勝利，這中間有多少的故事和傳奇，這中間有多少力挽狂瀾的英雄人物，又有多少悲憤的血淚、苦難和艱辛……

從失敗走向勝利，這中間經歷了抱怨、痛苦、憤怒、折磨、沮喪、抗爭，直至歡欣、激越、歡歌、笑語和振興……

勝利，是中國人民的一枚碩大的果實。

抗戰的勝利，屬於陽光、土地、風霜、雨雪和耕耘。

抗戰的勝利，應讓每一個華夏兒女分

享，也讓子孫後代們分享。

今天，我們隆重慶祝抗日戰爭七十周年勝利的光榮歲月，「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是崇敬？是擁戴？是慶倖？是反思？還是銘恨？

隆重慶祝勝利，我們當然要銘恨。

銘記「9.18」這個悲慘的日子，銘恨日軍的獸性、暴行，銘恨日寇的飛機、大炮、「731部隊」和毒氣彈，銘恨日本帝國主義的狂妄、殘忍和累累罪行，銘恨當今的日本反華勢力繼續為非作歹，不可一世……

南京慘案30萬冤魂，迄今死不瞑目，那累累屍骨至今面對蒼天抱恨。

日寇侵佔山西大同期間，慘無人道地實行「以人換煤」的政策，不到八年的時

間就有六萬多名中國礦工被摧殘致死。

七十年前，我國受到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蹂躪，全國人民在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下，死傷人數達3500萬，其中，被屠殺和作戰犧牲的軍民逾2000多萬人。

七十年前，中國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踐踏，在無情的戰亂中，餓殍遍野，白骨滿灘，人民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真是慘不忍睹。

歷史寫下了日寇的滔天罪行——

抗日戰爭時期，日寇為了實現其摧毀中國抗戰的大後方基地、動搖大後方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隆重慶祝國民政府屈膝投降的邪惡目的。

侵華日軍集中其陸軍和海軍的主要航空兵力，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及其周邊地

區進行了長時間非人道的戰略轟炸，給中國人民特別是重慶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

這些，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犯下彌天大罪的鐵證。

中華民族，自古就是英雄輩出的偉大民族。

歷史上，無數英雄兒女為了祖國統一富強，為了民族興旺發達，拋頭顱，灑熱血，毀家紓難，不怕犧牲，展示出我們民族的堅強品性和高尚人格。

毛澤東曾自豪地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

一語概括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視死如歸的崇高氣節。

在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與武裝到牙齒的日本法西斯進行了一次次驚心動魄的殊死較量。

這種氣貫長虹的英雄氣概，在抗日戰爭的每一個階段，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都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場景和生動表現。

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日人民武裝以及抗日民眾，浴血奮戰14年，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

——平型關大捷徹底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百團大戰振奮了全國軍民戰勝日寇的士氣。

——八路軍戰士馬寶玉等5人為掩護主力安全轉移，將日軍吸引到狼牙山，子彈、手榴彈全部用光了，就用石頭砸，最後英勇跳崖。

——東北抗聯的8名女戰士，在掩護主力撤退後被敵人包圍，她們不甘被俘，手挽著手沉入烏斯渾河。

——東北抗聯領導人楊靖宇在戰鬥犧牲後，敵人剖開他的腹部，發現胃中只有草、棉絮和樹皮。殘暴的日寇也不得不驚歎，中國竟有如此英勇不屈的人。

……

試問，有誰敢妄言能最後征服這樣無畏的戰士，有誰能最終侵佔這片孕育了如此英勇無畏戰士的土地？！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侵略鬥爭史上以弱勝強的光輝範例。

貧窮、落後的中國戰勝了貌似強大的日本法西斯，取得近代以來第一次反侵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

時至今日，侵略擴張、欺軟怕硬、色厲內荏的日本亡我之心不死——

2010年9月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廳的三艘艦船在自古就屬於中國的釣魚島附近海域，圍堵一艘中國漁船，並採取了用船體相撞的方式強行攔截這艘中國漁船，非法逮捕漁船船長，導致中日關係日漸緊張……

2012年4月，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國訪問時，突然宣佈要從所謂的日本民間所有者手裏買下釣魚島，並鼓勵日本民眾捐錢購買釣魚島。

2012年9月10日上午，日本政府舉行內閣會議，正式決定用2.0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88億元）的價格，從所謂「土地權所有者」手中將釣魚島、北小島、南小島一起購入，將其「國有化」，計畫於2012年9月11日與釣魚島所謂的「地權者」正式簽訂「買賣合約」。

2012年9月10日，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

2012年9月11日，中國海監46、中國海監50船已抵達釣魚島周邊海域。

日本一直磨刀霍霍，企圖挑起事端，安倍晉三政府從2015年起將為釣魚島「警備」增員，嚴防中方登島。

2015年1月，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在北京與日本貿易訪華團見面時，針對中日關係發出告誡說：「中日兩國應該努力適當處理對方的核心問題、重要問題，不能變成無法控制的局面」。

……

歷史的煙雲雖然已經散盡，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日本軍國主義又在復活，日本的自衛隊早已突破二戰規定的限制，他們厲兵秣馬，磨刀霍霍，對周邊國家和地區虎視眈眈！

所以，我們必須記住，落後就要挨打，和諧與發展的大環境也需要一支「首戰用我，用我必勝」的人民軍隊！

隆重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我們自然把目光投向連亙起伏的萬里長城。當外敵入侵，戰火升騰，鐵甲利艦沖進國門，狂獸惡魔殘害生命的時候，人們寄希望於英雄，寄希望於人民的子弟兵！

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士兵——元帥——將軍，他們是那個時代的中流砥柱，血肉築起的萬里長城。

我們知道，是他們凝聚了民族的意志，是他們握住了民族命運的纜繩，是他們沖向了血與火組成的前線，是他們再現了中華民族的雄魂！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前進！倒下的是民族英雄的軀體，站立的是不屈的民族精神！」

八年啊，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使東方沉睡的雄獅，在一夜猛醒！

毛澤東曾豪邁地說：民族團結，軍民團結乃勝利之本！

七十年後，我們隆重慶祝抗日戰爭的勝利，我們從那場戰爭裏留下的一些故事，繼續追思和緬懷——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70年前，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2015年9月，中俄雙方共同舉辦慶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活動，中國還將首次在抗戰勝利紀念日舉行閱兵。

……

白髮蒼蒼的老戰士，給我們講述著昨天的英勇猛與悲壯；

太行山的老羊倌，給我們講述著老百姓與八路軍的魚水深情；

冀中平原、膠東地區的老民兵，給我們講述著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遊擊戰的智慧和英勇；

中華民族一代代的老百姓，給我們講述著國歌、國旗、國徽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那些屬於戰後的一代又一代子孫，從老前輩的抗日歌聲的激情中和崇敬目光中，我們看到，他們內心滋生出的激情一浪高過一浪。

七十年前的硝煙散盡，七十年前的精神永存。

我們雖然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裏去抗日去殺鬼子，去奪取抗戰的勝利，但是，我們能從大量的文獻、故事、傳奇、史詩、影視資料和抗日戰歌中獲取心靈世界需要的精神養分，我們能從今天觸目驚心的「釣魚島事件」中，重新燃起反對侵略、反對戰爭的熊熊烈火！

隆重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年，我們更加熱愛祖國！建設中華！

隆重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年，我們更加珍惜和平！呼喚和平！

從操縱論看胡適的文學翻譯 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李可奕 朱湘暉

摘要：操縱總是出于某種特殊目的而進行的一種有別于常規乃至傳統規範的改動。所有翻譯都意味著在特定意圖下對原文學進行某種程度的操縱。胡適的文學翻譯是為其倡導白話文、建設新文學的文學創作服務的。文學翻譯是文學創作的基礎，更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操縱論的視角，從意識形態、詩學觀和贊助方等方面分析和探討了胡適文學翻譯的目的、手段以及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操縱、文學翻譯、文學創作、胡適

引言

新文化運動百年，《環球人物》將胡適

作為封面人物以紀念他在「五四時期」文學革命中的傑出貢獻。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胡適就被美國當時比肩《時代》周刊的《展望》雜誌推舉為當時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偉人之一，稱「He has invented 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以肯定他在白話文運動中的巨大作用。的確，是他創作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嘗試集》，開始了一個白話自由體新詩時代；是他創作出了中國第一個白話散文劇本《終身大事》，開創了中國現代話劇的新形式；是他出版了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譯本，率先用白話翻譯西方文學作品。曆數胡適的文學成就，皆少不了他在文學翻譯方面的汗馬功勞。他認為創造新文學形式必須結合、借鑒西方完備的文學體系，

對其進行翻譯及學習。胡適的文學翻譯是其文學創作的基礎，更是其進行文學改良、白話文創作的重要手段。本文將以操縱論的視角，從意識形態、詩學觀和贊助方等方面分析和探討胡適的文學翻譯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一、翻譯操縱

文學翻譯操縱理論于上世紀80年代末在歐洲萌芽，然而「操縱」的概念卻是20世紀後期才被正式確認。赫爾曼(Her Hermans)在其文學翻譯集《文學操縱：文學翻譯研究》指出，「所有翻譯都意味著在特定意圖下對原文學進行某種程度的操縱」（1985:11）。之後，安德烈·勒菲弗爾進一步發展了翻譯操縱理論。他在《翻譯、

重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操縱》中提出「翻譯就是對原文改寫」，而「改寫即操縱」（2004:1）。他指出：「翻譯並非在兩種語言的真空中進行，而是在兩種文學傳統的語境下進行的。譯者作用于特定時間的特定文化之中。他們對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響他們翻譯方法的諸多因素之一。」（郭建中，2000:15）這裏所提到的諸多因素包括三大類，即由譯者身處社會大環境及其自身性格塑造後所形成的意識形態（ideology）、詩學觀（poetics）及贊助方（patronage）等因素。他認為，這些因素對譯者所采用的翻譯形式及翻譯方式會產生巨大影響，而「忠實不過是譯者在特定意識形態和詩學觀念等影響下，所使用的一種翻譯策略而已」（2004:51）。

操縱理論下的翻譯行為不再是一種語言之間的簡單轉換，而是一種與社會制度、政治意識、大眾心理等諸多因素密不可分的文學體現。譯者在譯本中使用新的表達手法，融合其自身對原文本的理解，套用不同的文學體裁，以此推動著文學的發展和交流。而這些從不同民族借鑒得來的新的語言表現形式會被譯者逐漸吸收而同化在其翻譯作品中並最終遷移和影響到他的

文學創作。

三從意識形態看胡適的翻譯對其創作的影響

意識形態是與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直接相聯系的觀點和概念的總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勒菲弗爾在《翻譯、改寫及對文學名聲的控制》中指出：「意識形態是左右我們行為的形式，成規與信仰。」（2004:16）翻譯作為一種改寫行為，無論目的為何，都反映了社會某一特定群體的意識形態，從而也表現了意識形態對文學及文學翻譯的操縱。（2004:6）

胡適在美留學七年，先後學習過農學、經濟、文學和哲學。這七年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徹底改變了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胡適自己就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唐德剛，1993:4-5）杜威的思想，即他的實用

主義哲學，強調觀念必須在實驗中鍛煉，只有經過實驗證明，在實踐上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觀念，才是「有用的」。這種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直接影響到胡適後期的文學翻譯和文學創作，並最終促使了他的新文學革命。

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首先表現在他所追求的「求真」和「善譯」翻譯思想上。「求真」是追求譯作的真實性和忠實性，力求還原原作的形式和內容。「善譯」則是翻譯過程中的理想境界，既還原原文形式又保證譯文在目標語下的可接受性。他翻譯拜倫的《哀希臘》，其中「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譯成「嗟汝希臘之群島兮，亦羲和素娥之故裏。」這裏他將希臘的月亮神(Delos)和太陽神(Phoebus)改成了中國古代神話對應的「素娥」的「羲和」，使得翻譯讀來既富有詩情，又易與明了。對比蘇曼殊所譯的「征伐和親策，陵夷不自保」以及馬君武的「德婁飛布兩英雄，淵源皆是希臘族」，就晦澀難懂得多。「君武失之訛，而曼殊失之晦。訛則失真，晦則不達，均非善譯者也。」（胡適，1999:50-51）

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還表現在其翻譯的策略上，具體說來就是表現在其對待「直譯」和「意譯」的態度上。從實用主義觀點來看，翻譯作為不同語言之間進行交流的手段，就是要做到通順易懂。因此擺脫原文形式的約束，注重傳達內容的意譯成了胡適文學翻譯的首選。他的早、中期譯文多以意譯為主。例如，胡適翻譯《一件美術品》中這段介紹契科夫的文字，就完全打亂了原文的結構，使譯文自然流暢，合乎漢語行文的習慣。

Chekhov, who has been called the Russian De Maupassant, was born of humble parents in the suburbs of Moscow in 1860, and died of consumption in 1904. Though he received the degree of M.D., he never practiced medicine.

「Anton Chekhov 生于一八六〇年，死于一九〇四年。他是一個窮人家的兒子，曾學醫學，但不曾挂牌行醫。……人稱他做『俄羅斯的穆白桑』。」

到了後期，胡適將目光更多地轉向原語言，更多關注原語的表現形式和文化特征。當時白話文發展剛剛起步，破舊的同時更需要立新。而創造新的語言形式的最好辦法就是魯迅的「拿來主義」，通過翻譯

直接從外國語言中借鑒新的表達形式，以此豐富和發展民族語言。正是出于翻譯的這種功效，胡適也贊成直譯。他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曾對魯迅的直譯方式表示過認同，說「歐洲文學的提倡，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盡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歐陽哲生，1998:257）他說：「歐化的白話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語言的細密的結構，使我們的文字能夠傳達複雜的思想，曲折的理論。」（1935:24）胡適不僅僅只是停留在翻譯思想上，他更是將其付諸于翻譯實踐中。他在《短篇小說第二集》的自序中說道：「這六篇小說的翻譯，已稍稍受了時代的影響，比第一集的小說嚴謹多了，有些地方竟是嚴格的直譯。」（歐陽哲生，2000:348）以下是胡適翻譯《決鬥》中介紹泰來夏甫的一段：

Teleshov was born in 1867 and studied at the Moscow Academy of Applied Sciences. He started on his literary career in 1884 and met with almost immediate recognition. In his choice of subjects, as well as in the strong objective way in which he treats them, Teleshov is a disciple of Anton Chekhov, and his affinity

with that great artist has been pointed out by the foremost Russian critics.

泰來夏甫 (Nikolai Dmitrievitch Teleshov)，生于一八六七年，曾肄業于莫斯科工業學校。至一八八四年，氏時僅十七歲耳，即以文學見稱。其所著作，大抵師事俄國當代文豪契河夫 (Chekhov)，今其年未滿五十，而名滿東歐，為新文豪之一雲。

可以看出，胡適的譯文在內容和順序上都與原文基本一致，僅有少許偏差。事實上，不管是明白流暢便于交流的意譯，還是可以豐富民族語言的直譯，只要實用，能達目的，胡適都不會排斥。「胡適從事翻譯活動，有著多重目的，相應地，他也採取了多種翻譯策略與手段，包括間接翻譯，直意譯結合、譯文前後添加介紹評注等，凡此種種，無不體現了他的良苦用心。」（王新濤，2014:7）

胡適「求真」、「善譯」的翻譯思想直接影響到他的文學創作。他「求真」，其作品以追求真理為要旨。他尤其反對「言之無物」「無病呻吟」的文字，有甚麼話，說甚麼話。他強調語言文字要直指事物的真相，這樣才是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真文學」「活文字」。「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于

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十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十年前的文言。」（胡適，1918: 26.4）

他「善譯」，既關注語言的表達又關注文字的通暢，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針對語言形式，胡適為創造中國的新文學所獻的計策——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我們要創造新文學，須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同上）秉承實用主義思想，胡適相信語言和行為都要具有效用性。他認為實踐是促進思想轉化和發展的唯一途徑，而語言是實踐的工具。所以，改革和轉變文學思想的最好辦法就是改革語言文字本身。當時的中國社會，說的是白話，寫的卻是文言，讀寫分家。胡適提倡兩位一體，讀寫合一；話怎麼說，就怎麼寫，以此擺脫文言的束縛。用白話文創作文學，通過白話文將文學與普通讀者拉得更近，極大地提升了當時中國人的總體文化水平。這樣，胡適從「白話文」運動開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促成了中國文學由古典轉向現代。對於方法，胡適以為：「中

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的多，高明得多」。所以，「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同上）胡適相信，通過推進使用白話文的語言工具，通過借鑒西洋文學的先進方法，我們就能夠創造中國的新文學。

三、從詩學觀看胡適的文學翻譯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在勒菲弗爾的翻譯操縱理論中，詩學是關於文學的研究，是對文學在整個社會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探究。作者為了使得自己的文字以及思想傳播出去，必須在文學主題、類型、體裁、特征等一系列的選擇上下功夫，且迎合特定時期特定人群的詩學觀念。根據勒菲弗爾所言，翻譯傳遞了源本的思想，翻譯在改寫的層面下，其目的是文化、文學的交流與融合，當原作所在地文化與目標語所在地文化發生衝突時，譯者不得不在譯文中做出一定調整，譯者必須在翻譯過程中滿足目標與文化中的詩學觀念，以至於其譯文被目標語所在地的讀者廣泛認可，確保其譯本最大程度

上被閱讀和傳播。

詩學對胡適文學翻譯的影響表現在多個方面。首先，是在翻譯的目的上。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正經歷著社會文化轉型和文學擅變的曆史時期，學習和介紹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借此圖謀中華民族的發展與富強，成為那個時代中國文人的曆史使命。科學要發展，首先是思想要進步。而改變思想的最好辦法就是改造新文字、新文學，因為文字是思想的工具，文學是思想的家園。所以，胡適的翻譯並不是簡單地為翻譯而翻譯，他的文學翻譯主旨是要創造民族的新文學。正如他自己所說：「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下手，使吾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新文學可言。」（姚鵬，1992: 270）他翻譯易蔔生的作品，目的其實是為了向國人介紹易蔔生的個人主義思想，「我的宗旨在于借戲劇輸入這些戲劇裏的思想。足下試看我們那本《易蔔生號》，便知道我們注意的不是藝術家的易蔔生，乃是社會改革家的易蔔生」。「在文學方面，我們譯戲劇的宗旨在于輸入，範本。」（胡適，1919: 26.3）

其次，是在譯本的選擇上。五四運動

前後，大批西方文學著作湧入中國，給國人的傳統思想觀念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當時所選的翻譯材料五花八門，質量參差不齊，有些翻譯作品非但沒有介紹先進的觀念，還給原有的思想帶來了混亂。那麼，究竟須要翻譯什麼樣的作品？胡適認為文學譯者只能翻譯知名作家的文學作品。他建議，「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胡適，1988：26. 4）因為，只有名著才具有典範性，才有廣泛的認知度以及較高的藝術價值。也只有翻譯名著才能改變國人的傳統觀念與文學審美，才能最終盡到文學翻譯的社會責任。胡適的翻譯作品絕大多數都是名家名作，且不限于英美，他有志于向當時的人們普及各國的經典作品，讓人們認知更多地寫作手法及文學表達方式。

最後，是在翻譯的形式上。胡適極力主張使用白話文進行翻譯。「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胡適，1988：26. 4）在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提倡白話文學，是白話翻譯和白話創作的旗手和先鋒。在其文學翻譯實踐中，他所選用的翻譯語言大多都是「白話文」。當時的白話文起步不久，方興未艾，迫切

需要創造新的表達形式來豐富和完善。而翻譯無疑是最直接的手段。通過翻譯，不僅可以介紹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意識，更可以輸入不同的文學型式和語言表達。他坦言，「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同上）翻譯成了胡適推動白話文、創造新文學的試驗田，正是從白話文的翻譯開始，胡適將其收獲的語言表達經驗逐步轉嫁到了他的文學創作中來，最終成就了他在白話新文學運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胡適在文學翻譯中所形成的詩學觀直接傳導到了他的文學創作之中。他的新文學觀與其長期受西方思想文化熏陶有關，也與他在兩種文字間不斷的語言實踐有關。胡適曾說：「那時影響我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曆史的文學進化觀念，這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的基本理論」（胡適，1988：26.5）他受赫胥黎進化思想的影響，認為文學是發展的，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文學，絕不能抱成守舊。「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1917：26.5）只有擺脫文學中的古典主義正統觀念的束縛，才能

創造出符合新時代的新的文學體裁和文學風格。這種新文學觀極大地影響了胡適的文學創作，其中尤為突出的是他的白話詩創新。

早在1917年，胡適就率先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發表了8首白話新詩，而後又出版了新詩集《嘗試集》。胡適的白話詩在語言形式、主題等方面都較舊體詩歌有了很大的突破。但當時白話詩歌剛剛興起，鮮有可以參照的樣本，要想突破傳統舊詩的藩籬並不容易。對於這部新詩集，胡適自己都覺得不滿意。他說：「這些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毛病，不能不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遷就五七言的句法。」（胡適，1984：148-149）于是他從詩歌語言入手，著重于詩體的改變。「詩體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铐，一切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歐陽哲生，1988：33）胡適新詩體的創造得益于他的英文詩歌白話自由體的翻譯的體悟。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20年他節譯的美國女詩人

莎拉替斯代爾 (Sara Teasdale, 1884-1933) 的一首抒情詩《關不住了》(Over the Roofs)。

I said, 「I have shut my heart,

我說, 「我把心收起,

As one shuts an open door,

像人家把門關了,

That Love may starve therein

叫愛情生生的餓死,

And trouble me no more.」

也許不再和我為難了。

But over the roofs there came

但是五月的濕風,

The wet new wind of May,

時時從屋頂上吹來,

And a tune blew up from the curb

還有那街心的琴調,

Where the street-piano play,

一陣陣的飛來。

My room was white with the sun

一屋裏都是大陽光,

And Love cried out in me,

這時候愛情有點癢了,

「I am strong, I will break your heart

他說: 「我是關不住的,

Unless you set me free」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胡適打破了舊文學體系下的翻譯模式，摒棄了傳統詩歌五言七絕的格律模式，用幾乎直譯的白話形式，再現了西方詩歌語言的「結構」特色。這些口語化的句子通順流暢又有節奏，讀來朗朗上口。就如詩中所說「我是管不住的」，這種新的詩歌形式從此入雨後春筍，為之後的新詩白話化和詩體自由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難怪胡適會在新詩集「再版自序」中聲稱這是他「新詩，成立的紀元」。

二、從贊助方看胡適的文學翻譯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還有一個影響譯者翻譯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贊助方。勒菲弗爾指出，贊助方是促進或幹擾文學閱讀、文學寫作和文學改寫的來自個體或機構的力量。它可以「是某一特定時期某一特定地點具有影響力的人，也可以是一些團體、機構、如宗教組織、政黨、社會階層、皇室、出版社及報紙、雜誌、電視等傳媒機構。」（勒菲弗爾，2010：15）翻譯並非譯者的個人行為，而

是一個多方位的文學實踐活動。從原作的選擇到譯本的翻譯策略，再到譯本的形成、推廣、傳播，每一過程都會受到來自贊助方的操縱與制約。

贊助方對翻譯的影響通常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意識形態，只有迎合贊助方主流意識形態的翻譯作品才可以被順利地出版發行。二是經濟需求，譯者以文字出版謀生，只有滿足贊助方經濟利益的作品才能獲得資金。三是社會地位，贊助方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譯者的社會地位，借由其作品獲得聲譽。

影響胡適翻譯和創作的贊助方主要為《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新青年》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一份具有影響力的革命雜誌，當時的發行量高達1.6萬冊，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載體之一。該雜誌旨在摒棄傳統封建意識形態和舊文學體系，傳播新思想，促進文學改革及人民思想覺醒。胡適作為該雜誌的撰稿人以及後來的合作者，他與創刊人陳獨秀在文學翻譯思想乃至文學創作觀念上都有著驚人的吻合。首先，具有相同的文學翻譯目的。陳獨秀在給胡適的回信中說到：「尊論改造新文學意見，甚佩甚佩。足下功課之暇，尚求為

《青年》多譯短篇名著若決鬥》者，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弟意此時華人之著述，宜翻譯不宜創作，文學且如此，他待何言？」（任建樹，1993：183。）由此不難看出，陳獨秀利用翻譯創立新文學，建構新文化之用心。其次，都倡導名家名著的翻譯。《新青年》堅持「世界的而非鎖國的」的原則，對於外國文學的各種流派和作家採取了開闊的態度，它先後譯介了俄國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挪威的易卜生、法國的莫泊桑、英國的王爾德、印度的泰戈爾等許多名人的經典之作。正如陳獨秀所說：「西洋所謂大文豪，所謂代表作家，非獨以其文章卓越時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陳獨秀，1915（二）：3-4）再則，合力推進白話文翻譯。陳獨秀致力於改造國民性，所以使用普通大眾的白話語言作為翻譯語言無疑是最有效的。他們利用翻譯語言從文言向白話的轉變，推進了新文學、新文化的建構，同時也影響和促使人們傳統思想方式的改變。最後，都重視忠實原文的直譯方法。《新青年》的《投稿簡章》明確要求：「來稿譯自東西文字者，請將原文一並寄下」，甚至還登載了很多有原文對照的翻譯作品。這意味著譯

者再不能像林纾「取便發揮」式的翻譯了，而必須嚴格忠實原文，在形式和內容上盡量與原文保持一致。正因為以上種種的契合，胡適與贊助方互利互惠，兩全其美。他因《新青年》博得了盛譽，《新青年》也因為有了他的加入而更加大放異彩。

談胡適受贊助方影響就不得不提北京大學。胡適回國後受邀在《新青年》擔任編輯工作，之後得陳獨秀推薦去北京大學任教。這個任職在一定程度上是胡適後期文學發展中的推動劑，不僅保障了其經濟來源，且再一次提升了其社會地位。在胡適前往北京大學之後，《新青年》在全國範圍內的知名度也一度高漲，發行量直升。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是當時中國新知識份子的主要領導者，在胡適于北京大學任教期間，給予了胡適充分的關懷及幫助，為胡適後期的學術作為奠定了基石。北大聚集了一大批新思想文人學者，當時幾乎所有的先進思想及其傳播都源于北京大學。這對胡適新文學觀的傳播和發展及其文學作品的發表與推廣起到了有力的推進作用。

結語

操縱總是出于某種特殊目的而進行的

一種有別于常規乃至傳統規範的改動。胡適的文學翻譯操縱是服務其利用翻譯引進新的語言表達、新的文學類型以及新的思想意識的個人理想。其手段是挑選名家經典之作，採用「求真」、「善譯」的翻譯方法。他的文學創作操縱則是服務其倡導白話文、建設新文學的個人抱負。其手段則正是他的文學翻譯。通過文學翻譯，將新的語言表達式和新的文學類型移植到民族語言中；再通過文學創作，最終將它們固化在民族語言中，使其成為民族語言發展的新鮮血液。

參考文獻：

- [1]Hermans, Theo (ed.).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 Croom Helm.1985
- [2]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3]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A Source Book [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4]郭建中.《當代美國翻譯理論》，湖北教

育出版社，2000

[5]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M]·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6]歐陽哲生.《解析胡適》[C]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348

[7]王新禧.《胡適譯文集》導言，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8]胡適.《嘗試集》[Z]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9]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M]，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

[10]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M]，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

[11]胡適.《文學改良刍議》，載 1917 年《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

[12]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載 1918 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

[13]胡適.《論譯書寄陳獨秀》，姚鵬、範橋編《胡適散文》第 3 卷，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14]胡適.《論譯戲劇》，載《新青年》1919 年第 6 卷第 3 號。

[15]胡適.《我為什麼要做白話詩？》，《嘗試集》自序[C]，新青年，1919 第六卷第五號

[16]胡適.嘗試集自序[A]，胡適嘗試集[C]，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17]歐陽哲生·《胡適文集》[C]，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8]任建樹等.陳獨秀著作選(第 1 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9]陳獨秀.現代歐洲文藝史譚[C]，青年雜誌，1915(1)·3-4.

本文為 2015 年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譯者的翻譯語言對其創作語言的影響」(編號:GD15CWW09)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李可奕，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學系在讀；朱湘軍，博士，副教授)



《閑情偶寄》翻譯的功能性思考

◎李國慶 周佩虹 來偉霞

1. 引言

該論文是我們《閑情偶寄》系列研究論文的首篇論文。該論文主要就該系列研究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及解決的方法做了簡要的描述。本研究以 Hanks 系統功能語法為理論框架，將《閑情偶寄》的翻譯實踐和研究上升到體裁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和探討，而不是放在一個局部，獨立，封閉的語言單位層面，以便能夠為中國古代文學典籍的翻譯理論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從而建立一個適合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這種特殊語篇體裁的翻譯理論框架，這有利于翻譯工作者在今後的中國古文翻譯中，根據相關的語篇體裁找到適合的翻譯策略和技巧。

2. 李漁的《閑情偶寄》及研究現狀

李漁位列「中國名士八大奇著」之首，是清代文學家、戲曲家及美學家李漁的名著。李漁世稱「李十郎」，曾家設戲班，至

各地演出，從而積累了豐富的戲曲創作、演出經驗，提出了較為完善的戲劇理論體系，被後世譽為「中國戲劇理論始祖」、「世界喜劇大師」、「東方莎士比亞」，是休閒文化的倡導者、文化產業的先行者，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李漁的部分作品先後被西方學者翻譯出版，如《十二樓》(Li Yu's Twelve Towers)，《玉搔頭》(The Dreamy Life)，《無聲戲》(Silent Operas)等，在西方讀者中享有盛譽。

《閑情偶寄》是李漁一生藝術創造與生活享受的智慧結晶，在戲曲制作和小說創作中突顯了其獨樹一幟的個性和特色。全書共包括詞曲、演習、聲容、居室、器玩、飲饌、種植、頤養八部，論及生活中妝飾打扮、園林建築、家具古玩、飲食烹調、養花種植、醫療養生等諸多方面，有極高的藝術造詣和生活審美情趣，堪稱中國古代生活的小百科全書，具有極強的娛樂性和實用價值。該書文字清新雋永，敘

述娓娓動人，梁實秋、林語堂等文學大師對此書均十分推崇。林語堂稱其為「中國人生活藝術的袖珍指南」，認為它不僅開創了近代生活美文之先河，而且對人們提高生活品位、營造藝術的人生氛圍仍有極大的借鑒價值。《閑情偶寄》中有不少篇章內容和形式達到完美統一，都是不可多得的優美散文，《種植部》的《芙蕖》作為散文中寫荷花的佼佼者，曾被作為古典白話範文選入高中語文課本。

現階段，國內學術界對於該書的研究多從賞析的角度，如評論其美學價值思想，生活藝術的文化取向，作者的戲曲創作理論和評判等。一些學者也在外譯該書方面做過嘗試性的研究，如該書的《聲容部》及《飲饌部》曾被譯為德文；《聲容部·衣衫篇》曾被國外學者譯為英文；也有國內學者對其《頤養部》進行英譯嘗試。在肯定這些學者們所付出的努力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該書英譯中存在的若幹問題：首

先，雖有國外學者對該書的部分章節進行英譯，但由於缺乏對古文的賞析能力或是出於文化背景原因，譯者容易對書中內容斷章取義，容易造成誤譯，無法向西方讀者忠實地傳達作者的觀點及該書的文化精髓；其次，國內譯者往往選取部分章節進行翻譯實踐，且多為個人翻譯行為，譯文準確度及可讀性有待斟酌。零散的篇章翻譯也使得西方讀者無法系統深入地欣賞該書進而了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內涵。迄今為止，國內尚未有譯者或學術團隊對該書進行全書英譯並出版譯本。這對於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以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為初衷的譯界來說，確為一憾事。

目前，國內尚未有譯者或學術團隊對《閑情偶寄》進行全書英譯並出版譯本。我們的研究準備對該書進行系統的研究、解讀、翻譯，這在國內譯界、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學典籍翻譯領域尚屬首例。此外，在進行翻譯實踐的同時也進行理論研究，探討建立古文翻譯理論框架並進行系統的論述。依托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兩條主線，希望能對《閑情偶寄》乃至其它同體裁的古文典籍翻譯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

3·《閑情偶寄》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的立體性翻譯策略及方法探討

中國典籍的英譯涉及到語內翻譯和語

際翻譯兩個過程。中國典籍具有時空跨越性特點。衆所周知，語言會在曆史的長河中經歷其生命誕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因此古代語言和今天語言在語法、詞彙和表達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古代語言構成的文言文，其文體的特點是具有豐富情感與意象、詞語高度凝練，追隨「意合」的規則，邏輯關係清晰，但無語法限制，句式靈活多樣，用字自由灑脫，可根據所要表達的意象進行各類句式或詞性轉化，因此，無主語、省略句、連動句、倒裝句、名詞連用法等在文言文表達中比比皆是。這一切都造成了文言文理解難度和翻譯難度大。筆者提出假設：就文言文的語內翻譯而言，不結合文化語境，很難深入理解文字背後所隱藏的深邃而又樸素的哲學思想。該研究試以語言學的相關理論為指導，結合易經、道教和儒家的傳統哲學思想為主導的文化語境，從文化語境層面、語篇層面和文字層面，以李漁的《閑情偶寄》及其英譯本為分析語料，對中國文言文進行宏觀和微觀的分析和研究。就語際翻譯而言，該研究認為，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能否將語言中所蘊藏的文化意蘊表達出來，在原文本和譯文本之間建立文化對等(cultural equivalence)，是翻譯是否成功的關鍵。中國典籍語篇句與句之間很少使用顯性連接手段來組建語篇，語

篇意義的構建多依靠語言內部的隱性意義連貫而成，即是說語篇的構建方式是典型的以神統形。用詞言簡意賅，包括詞語之間的邏輯關係也是如此，常以隱含式樣埋於字裏行間。因此，為了傳輸原文語篇句子的深層含義和文化意蘊，用「顯化」的策略消解雙語隔閡，在準確傳達原意的基礎上，通過添加句法成分、顯化主語、顯化時態語態、顯化隱含關係、加解釋和注解等，以此來填補直譯的文化缺失，使原語和譯語盡可能實現功能上的對等。可以說，顯化翻譯法的最終目的是要揭示語言深層的語境含義。由於古文其時空跨越性特點，為了讓目的語讀者對譯文的理解更清楚、準確，增補明示法的「顯化」翻譯策略是一個最佳的翻譯策略選擇。

翻譯實踐表明，儘管「顯化」翻譯策略是一個古文翻譯中的首選策略，但筆者認為只要譯文保留了原文最為基本的原汁原味的表達方式，即使明示了語篇內和增補了語篇外的一些文化信息，這在很大程度上仍應看是直譯。除此之外，翻譯中難免要在句型上有所轉換，包括肯定變否定、疑問句變感歎句、間接引語變直接引語等，筆者認為都是在直譯大框架下的一些微調，沒有衝破直譯的界定。翻譯實踐表明：如無文化衝突，直譯應看作是古文翻譯得最佳策略選擇，因為它有一個最大優勢，即

能夠再現原作在語言表達上的特有的風味。

就語內翻譯而言，該研究擬採用層次研究法：1) 筆者認為文本的語境意義對於確定文本的整體語篇意義或文本中某個語言片段或詞語的具體意義顯得十分重要，因此了解語篇的文化背景顯得十分重要。文化背景可從該書的寫作時代，作者的生平與該書寫作的社會目的等方面入手進行考察和論證。2) 以文為本。文本的語境意義對於確定文本的整體語篇意義或文本中某個語言片段或詞語的具體意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文本意義具有客觀性和穩定性。因此，就古文而言，以文為本更是一個硬道理。首先是整體語篇入手，然後段落、小句和詞彙自上而下的進一步展開。就語際翻譯而言，該研究主要採取的具體方法有：1) 文獻研究法，即充分利用圖書資料及網絡資源，梳理中國古代散文在英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2) 定性分析法，分析和探討如何能夠最大程度的使譯文獲得與原文最大限度的等值，如何克服文化和語言文字兩方面的障礙，同時又能通順流暢，為外國讀者所接受。

4. 《閑情偶寄》的修辭手法與翻譯策略

李漁的《閑情偶寄》通篇充滿比喻和各種修辭手法，因此，修辭手法研究及其翻譯策略探討在李漁文學的研究及翻譯研

究中都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李漁善于運用各種修辭，如明喻、暗喻、排比、對偶、擬人和對比等，並在修辭手法中滲透了其新穎的獨特性。如比喻修辭的使用，作者所設的一個根比喻是「天地」「陰陽」，「男人和女人」。通過大量的排偶、對比和誇張等修辭手法的輔助，李漁使「陰陽」「天地」「男人和女人」這個基本比喻以擴展的形式展開，淋漓酣暢、氣勢磅礴貫穿全文。與之有關聯而不相同的延伸意象，如「日月雨露、江河湖海，天之風、地之水，天候、地之草木」，構建了典型的擴展比喻語篇，使讀者能夠持續性地感知該比喻意象所包含的多層面、多角度的內涵，更全面更透徹的理解該比喻。再比如對偶比喻，如：「人但知藏日月者地也，不知生日月者亦地也；人但知泄雨露者地也，不知生雨露者亦地也。」兩個句子不僅句式相同和成分相同，而且都用了比喻，構成了對偶比喻句。人類有著相似的思維方式，包括漢英兩國民族在許多事物的認識有著相似的思維方式，由於語言是思維的表達形式，因此兩種語言之間必然也存在著很大的相似性，使漢英兩種文化和語言之間具有互通性，構成了漢英翻譯轉換的基礎，不僅構成了明喻的可譯性，而且構成了明喻直譯的可譯性。我們在實際翻譯中，對於李漁擴展比喻語篇和對偶比喻句我們都基本

運用了直譯策略，需要時在直譯的基礎上作了一定的微調，但都盡量不改變其淋漓酣暢、自然美麗、充滿哲理的擴展比喻和對偶比喻的原生態魅力，保留原比喻形象及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把原比喻表達風貌忠實地呈現給譯文讀者，以便更好地推廣中國文化，傳播和介紹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和靈魂。筆者認為，如果可能，簡單直譯是翻譯比喻修辭翻譯的第一選擇。

當然，古文中的比喻通常涉及到該民族的哲學政治和文化因素，添加某些文化因素是非常必要的。典籍中的關鍵詞語和文化負載詞也是一樣，都應加以解釋說明，我們嘗試啓用了兩種方法：一是加腳注或是加尾注。較短的解釋可以尾注的形式出現，詳盡的注釋可作為腳注出現。這樣做既可作為翻譯的依據，又可為讀者提供注家的觀點，供讀者參考；二是簡明扼要地總結每一篇章節的主題，便于讀者整體把握該章節的主要內容。筆者認為這仍然應該看成是直譯，因為原文的比喻形式沒有受到損害，關鍵詞語和文化負載詞的內容和形式均得到了保留，只是對基於兩種語言的本質差別做了一些必要的補充，以達到真正等效的結果。

5. 結語

現代中國的進步和成功很大程度上都

得利于中國古代文化及其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像《閑情偶寄》這樣的中國古代文學典籍，以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和無限的藝術魅力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讀者。這塊瑰寶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世界，它可以向西方讀者充分展示在經濟實力提升的背後，中國人民對高雅生活品味的不懈追求以及自古以來對「以人爲本、自然和諧」的生活美學思想的追求，這在一定程度上可幫助消除西方世界或因政治、經濟等因素而對中國社會及人民抱有一定的負面看法，建立中華民族積極正面的人文形象。《閑情偶寄》大量運用了《詩經》、《論語》、《孟子》、《本草》等經史百家的觀點，同時吸收詩詞、民間諺語、俗語、民謠、格言等不同風格的文學形式，是中國古代文學典籍中的傑出代表，也是對外推廣中華文學精髓的最佳載體。同時，該研究還希望能夠爲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的國內譯者們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翻譯藍本和新的研究視角，拋磚引玉，從而促使更多的優秀譯者投身于這項事業，有助於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從「積極走出去」到「有效走進去」，增強中國傳統文學作品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參考文獻：

[1]陳望道：《修辭學發凡》[M].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2.

[2]範家材：《英語修辭賞析》[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2.

[3]黃國文：《語篇分析概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4]黃國文：《語篇分析的理論與實踐——廣告語篇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5]黃果泉：《雅俗之間——李漁的文化人格與文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6]黃強：《李漁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版。

[7]李國慶：《大海般的韻律和內涵——〈老人與海〉的語篇結構與意義》，《外語教學》，2002/2.

[8]李國慶：《主位功能與語篇理解》，《外語學刊》，2003/10.

[9]李國慶：《主位推進模式與語篇體裁——〈老人與海〉分析》，《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7.

[10]李漁：《閑情偶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版。

[11]束定芳：《論隱喻的本質與語義特征》，《外國語》，1998/5.

[12]束定芳：《隱喻學研究》[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13]俞爲民：《李漁評傳》，南京大學出版

社1998年版。

[14]尚榮：《李漁評傳》，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版。

[15]張國奎：《張國奎談中醫養生》[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8:6

[16]章豔，胡衛平：《文化人類學對文化翻譯的啓示——「深度翻譯」理論模式探索》[M].當代外語研究，2011(2)

[17]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Arnold, 1994.

[18]Hoey, M. On the Surface of Discourse. [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3.

[19]Levinson, S. C.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Press, 2001.

[20]Martin, J.R. 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 Philadelphia/Amsterdam: Benjamins, 1992.

[21]Sperber, D & Wilson, B.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asil, 198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從三大元功能的角度看中國文言文翻譯策略選擇」(13YJA4002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李國慶，暨南大學；周佩虹，仲恺農業工程學院；栾偉霞，廣州商學院)

流行語活力值與生成機制研究

◎ 胡 偉

摘要：流行語的大量出現豐富了當代漢語的詞庫，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使漢語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各年度流行語活力值第一位的多為熱門網絡用語，時間越近，流行語活力值越高。流行語的生成機制包括認知心理，詞語構造規律，社會發展和文化傳播以及群體表達喜好五方面。認知心理主要反映在權力人物的親民意識和趨新求異、崇尚簡潔、模仿從眾、放鬆減壓、逆反叛眾的心理等方面。詞語構造規律主要表現在語言的系統性、經濟原則、修辭方式、韻律機制等方面。社會發展與文化傳播導致流行語的產生和傳播速度倍增。流行語與主流道德觀念也有關。不同的表達群體喜歡使用和自己生活工作相關的流行語。本文對2005～2012年度十大流行語活力值的調查研究具有開創性，流行語生成

機制的研究能豐富漢語詞彙建構理論。

關鍵詞：流行語、活力值、衰亡值、生成機制

流行語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它是在特定區域內，在一段時期裏能被廣泛接受並在交際中廣為傳播的言語形式。它具有高頻性、時代性、時尚性、時效性和地域性的特點，是當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因素的綜合產物。當代漢語流行語的爆發式產生不僅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彙，使漢語充滿了勃勃生機，同時也給漢語詞彙系統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各年度流行語活力值第一位的多為熱門網絡用語，時間越近，流行語活力值越高。流行語的生成機制包括認知心理，詞語構造規律，社會

發展和文化傳播以及群體表達喜好等方面。本文對年度十大流行語活力值的調查研究具有開創性，國內外還沒有人涉及。本文對流行語生成機制的系統總結，會為當代漢語詞彙理論的建構、語言的認知理解、語言教學和詞典編纂等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流行語活力值調查

當代大學生流行語的使用狀況反映了他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思想傾向、心理動態和生活態度。通過流行語我們能覺察到現代文明給當代大學生的生活方式帶來的變化。大學生作為新生代的代表，是一個流行語使用頻率最高的群體，大學生對流行語的使用情況影響著流行語的發展。

（一）調查對象

2013 年 11 月，採用問卷調查的形式，對中國在校大學生進行了抽樣調查。學生分布的高校有 23 個省市，包括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廣州大學等 123 個本科院校。男生占 53.6%，女生占 46.4%，學生年齡分布在 17 至 28 歲；共發出問卷 1200 份，收回 1102 份，有效問卷 1066 份。

（二）調查內容

以 2005～2012 年的年度十大流行語（以網絡流行語為主）作為調查內容。

對這些流行語有下面四個詢問選項：這些流行語中您經常使用的填為（1）；這些流行語中您偶爾使用的填為（2）；這些流行語中您理解其含義，但沒有使用的填為（3）；這些流行語中您不理解其含義，也沒有使用的填為（4）。

2005～2012 年度十大流行語主要參考了袁偉 2012 年發表在《語言文字應用》第 3 期的《論新媒體流行語在廣電媒體中的規範使用——以近年來年度新媒體十大流行語為例》和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組織編寫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5～2012）及《咬文嚼字》。綜合得出以下年度十大流行語：

2005 年：漂移；禽流感；人民幣升值；

× 很生氣，後果很嚴重；芙蓉姐姐；嗚咤啦；千手觀音；海選；神六；反對日本人常。

2006 年：相當的；手榴彈要是一塊錢六個，我先扔你一百塊錢的；餓滴神啊；素質啊，注意素質；大哥，我們不專業啊；不僅侮辱我的人格，還侮辱我的智商；人不能無恥到這個地步；一樹梨花壓海棠；我頂你個肺；你不是一個人。

2007 年：你太有才了；做人不能太 CCHV 了；這社會，真黑；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讓老百姓說話，天不會塌下來；黨啊，人民考驗你的時候到了；茶水，你發炎了；河蟹社會；死者目前情緒相當穩定；上網有風險，發（回）帖需謹慎。

2008 年：凹；躲；雷；山寨；很黃很暴力；打醬油；俯臥撐；正龍拍虎；叉腰肌；我是交通部派來的。

2009 年：不差錢；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躲貓貓；你是哪個單位的；心神不甯；寂寞黨；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被×；杯具；這事不能說太細；樓×。

2010 年：神馬都是浮雲；給力；我爸是李剛；羨慕嫉妒恨；鴨梨；非常艱難的決定；蒜你狠；圍脖（微博）；凡客體；開大套。

2011 年：坑爹；親；傷不起，有木有；

腫麼了；賣萌；hold 住；普通青年，文藝青年，8B 青年；圍觀；啥都有；五道杠。

2012 年：正能量；元芳，你怎麼看；舌尖上；躺槍；高富帥；中國式；亞曆山大；最美；贊；接地氣。

（三）調查分析

1. 活力值

筆者定義活力值為調查中全體被調查人對某詞語使用的次數除以對總體詞語使用的次數而得出的數值。以「漂移」的活力值為例，「漂移」一詞中選（1）、（2）的有 313 個，80 個流行語中選（1）、（2）兩項的一共有 35196 個， $313/35196=0.8893\%$ ，即「漂移」的活力值為 0.8893%。

經調查，「坑爹、贊、高富帥、賣萌、親」的活力值分別為 2.3895%、2.3696%、2.2503%、2.2446%、2.2190%。下面按由高到低的活力值順序排列流行語，前 50 位流行語如下：

坑爹；贊；高富帥；賣萌；親；打醬油；腫麼了；給力；hold 住；羨慕嫉妒恨；普通青年，文藝青年，8B 青年；亞曆山大；正能量；傷不起，有木有；圍觀；山寨；杯具；躺槍；你太有才了；神馬都是浮雲；雷；凹；鴨梨；相當的；你不是一個人；中國式；× 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素質啊，

注意素質；啥都有；元芳，你怎麼看；非常艱難的決定；圍脖（微博）；最美；接地氣；被X；舌尖上；很黃很暴力；海選；我頂你個肺；人不能無恥到這個地步。

總體來看，時間越近，流行語活力值越高，活力值最低的幾個詞語多來自2005、2006、2007年，最高的則是來自2012、2011年。各年度流行語活力值第一位的多為熱門網絡用語，如「坑爹、羨慕嫉妒恨」，簡短有力，打字方便，而最後一位的往往是一些由當年的時事熱點引出的詞語，如「樓XX，我是交通部派來的」等，它們具有時效性，容易失去活力。而有些年份較早但是活力值仍然較高的詞彙，一般都傳遞了正能量，它們讓我們感覺到了來自他人、社會的溫暖，有的是源于大學生對社會、生活的調侃或吐槽，如「坑爹、羨慕嫉妒恨、傷不起、有木有、高富帥」，有的是反映了大學生面對生活的積極態度或對他人的關心，顯示了價值觀導向，如「贊、親、腫麼了、賣萌、正能量、hold住」。

處于青春期的大學生充滿了想象力，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現實給他們帶來了巨大壓力：學業壓力，戀愛壓力，求職壓力等等。在渴望釋放壓力的情況下，大學生們用流行語來解壓並從同伴

中獲得心理安慰和支持。「坑爹」的高頻使用是因為青年人總是會遇到看不慣或受委屈之事，如飯菜質量、費用等一系列問題，于是用「坑爹」一詞表示憤慨。網絡時代使地球成為一個互相聯通的村落，「贊、賣萌、給力、圍觀、囧」這些是因網絡的傳播而活力值比較高，大學生習慣了他們的存在，習慣了在網絡上使用一些表情。這些流行語簡單易懂，短促有力，符合當下快節奏的社會生活，例如有人說「姜埋奶真贊」，「籃球賽真給力阿」等。「親」在淘寶上經常使用，越來越多大學生在淘寶上進行網購，逐漸「親」也成為了親切稱呼他人的叫法，在高校內經常聽到同學之間這樣互稱，顯得親切俏皮並富有感染力，能夠拉近交際距離。「高富帥」為2012年網絡流行語，形容男人在身材、相貌、財富上的完美無缺，「高富帥」的命名一般有人認為是由日本動漫「高達」演變而來，它最早風靡于百度李毅貼吧，是具有濃厚貼吧文化色彩的一個詞彙。「打醬油」是2008年的流行語，指「雖在道義上確實關注某事，對此也有明確看法，但因為明哲保身，或不屑回應，遂托辭以敷衍塞責」，其實流露出對現實的無奈，網友用「打醬油」回帖，相當于「路過」「飄過」的意思。因為「打醬油」和大學生的生活貼近，所

以現在活力值依然比較高。「腫麼了」即「怎麼了」，它是山東冀莊一帶方言（我國其他部分地區也有），《愛情公寓》中唐悠悠說了這句話，隨之它成為了流行語。「hold住」是2011年流行語，指面對各種狀況都要把持住並堅持住，要充滿自信，從容應對一切。「羨慕嫉妒恨」是2010年流行語，它不僅強化了中心詞「嫉妒」的表達效果，還包含了嫉妒的結構層次和來龍去脈，把同義詞或近義詞反覆疊加，通過緊湊複查的形式，表達鮮明強烈的情感，追求奇特誇張的效果。

2 衰亡值

筆者定義衰亡值為全體被調查人對某詞語沒有使用的次數除以對總體沒有使用的次數而得出的數值。以「漂移」的衰亡值為例，「漂移」一詞中選（3）、（4）兩項的有538+215=753個，80個流行語中選（3）、（4）兩項的一共有50070個， $753/50070=1.5039\%$ ，即「漂移」的活力值為1.5039%。衰亡值高的流行語，活力值則低。

調查可知，「我是交通部派來的，死者目前情緒相當穩定，又腰肌，一樹梨花壓海棠」的衰亡值分別為1.8933%、1.8614%、1.8614%、1.8354%。下面按衰亡

值由高到低的順序排列流行語，前10位流行語如下：

我是交通部派來的；死者目前情緒相當穩定；又腰肌；一樹梨花壓海棠；手榴彈要是一塊錢六個，我先扔你一百塊錢的；樓××；茶水，你發炎了；做人不能太CCAV了；嗚咤啦；正龍拍虎；千手觀音；讓老百姓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反對日本入常；上網有風險，發（回）帖需謹慎；黨啊，人民考驗你的時候到了；躲；躲貓貓；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鬧太套；五道杠；你是哪個單位的；芙蓉姐姐；大哥，我們不專業啊；河蟹社會；神六；凡客體；心神不甯；這社會，真黑；俯臥撐；漂移；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人民幣升值；不僅侮辱我的人格，還侮辱我的智商；蒜你狠；不差錢；這事不能說太細；寂寞黨；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我爸是李剛；餓滴神啊；禽流感。

一些源自于新聞事件的流行語，往往會隨著新聞事件的時過境遷而風光不再，成了衰亡值高的流行語，例如：「我是交通部派來的；死者目前情緒相當穩定；茶水，你發炎了；做人不能太CCAV了；手榴彈要是一塊錢六個，我先扔你一百塊錢的；又腰肌；正龍拍虎」。而「嗚咤啦」是2005年的流行語，出自于紅遍亞洲的韓劇

《大長今》主題曲，隨著《大長今》的過氣而快速衰亡。它們的語言形式一般較長，不適宜于表達個體情感。「一樹梨花壓海棠」是2006年的流行語，它出自宋代蘇東坡嘲笑好友詞人張先的調侃之作，因為其與大學生沒有太大關聯性而衰亡值比較高。有趣或形象鮮明的流行語活力值比較高，如「打醬油、躺槍」，這兩個詞形象鮮明，帶有自嘲意味，而且沒有可代替的詞彙，因此這兩個詞沒有被時間淘汰。由上文的前10位與後10位流行語的對比可知，詞彙形式適于日常表達的活力值更高，前10位流行語適用于日常表達，無論是與人交談還是自我表述，它們都可以挂在嘴邊。而後10位往往是某個事件的評議，除非談及此事，否則難以涉及。

二、流行語生成機制

（一）認知心理

1. 權力人物的親民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的新年賀詞中說：「為了做好這些工作，我們的各級幹部也是蠻拼的。當然，沒有人民支持，這些工作是難以做好的，我要為我們偉大的人民點贊。」使用了流行語「蠻拼的」和「點贊」，展示了親民意識，引發了網民的追捧，也促進了流行語的傳播。

2. 趨新求異的心理。喜新厭舊、標新立異是人類的本性，特別是在當今崇尚自我展示，追求塑造個性的社會中，加快了人們創新的激情，強化了個性化的獨特追求，表現在語言詞彙上，便是個性化的用詞。例如「小鮮肉、暖男、任性、酷斃了、帥呆了、玉米、涼粉、伊妹兒」等流行語的使用。流行語的新穎性主要體現在或者用新形式（如「閃客、驢友、負翁」），或者有新意義（如「下課、版本、搶手」），或者是新用法（如「挺、頂、八卦」），或者從局部使用走向全民通行（如「忽悠」）。它們的出現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這既是流行語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決定流行語命運的關鍵因素。趨新求異的心理使流行語的活力值總體上同距現在的時間長短有著緊密聯系，距今越近的詞語活力值往往高，距今越遠的詞語活力值會比較低。原因是追求潮流的大學生們對新流行語偏愛度較大，自然會有很高的活力值。「中國式；舌尖上；元芳，你怎麼看」這些都是近期發生的目前一直被談論提及。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流行語逐步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如「芙蓉姐姐、神六、躲貓貓」。

3. 崇尚簡潔的心理。追求簡捷是人類的共性，數字語、拼音語和縮略式新詞是這種心理特性的積澱，它們完全打破了傳

統的用詞原則，可以說是套全新的交際語。幾個數字或字母就能表達一個長句的句義，滿足了人們崇尚簡潔的心理需求，如：765(去跳舞)、740(氣死你)、083(你別生氣)、PLMM(漂亮妹妹)。大量的縮略式新詞也是這種心理的體現，如「失聯、非典、綠標、環評」等。

△模仿從眾的心理。在言語生活中，當個體發覺某人的言語對自己很有吸引力時，就會因喜歡該言語作品而趨向於接受其影響並採取與之類似的言語作品。由「超女」一詞引發了「抄女、炒女、鈔女」等仿造詞。一方面，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為了追逐新潮，創造流行詞語；另一方面，當看到或聽到另一些有獨創性和個性的其他說法時，又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理，因最初的新鮮感而模仿，繼而又在模仿的基礎上創造性的運用。例如：幾年前人們稱有錢的女士為「富姐、富婆」，稱有錢的男士為「富翁、富佬」。後來，「大款」一詞流行起來，於是，有人加以創造性的結合，將有錢的女士改稱為「款姐」，將有錢的男士改稱為「款爺」，並把有錢男士的老婆稱為「款太」，這些稱呼逐漸泛化，甚至擴大到全國各地。模仿從眾的心理使那些大多數人不再說的流行語消亡的速度加快，下面這些流行語現在幾乎沒有人再提及了，

如「茶水，你發炎了；做人不能太CCZ了；嗚咤啦」。

5 放松減壓的心理。現代人壓力大、煩惱多，為了尋求輕鬆愉快的感覺，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去尋找解脫的方式。在語言上表現為喜歡採用生動幽默的詞語。例如：我們會稱呼某位明星的追隨者為「粉絲(Fans)」、「鋼絲」，這種戲稱令人輕鬆愉快。又如「白骨精」是「白領+骨幹+精英」的縮短形式，「蛋白質」則是「笨蛋+白癡+神經質」的縮短形式。「驢友」泛指愛好旅遊，經常一起結伴出遊的人。「人參公雞」是「人身攻擊」的通假。再如被無數蚊子咬叫「新蚊連破(與新聞聯播諧音)」。在網絡世界中常常稱呼那些反映慢，容貌又不好看的女網蟲為「恐龍」或「黴女」；稱呼其貌不揚的男網蟲為「青蛙」或「菌男」。這些語言確實诙谐幽默，讓人忍俊不禁，但同時也滿足了人們嬉戲調侃的心態，因此，這些詞語很快被人接受、認同。有的流行語起不到放松減壓的心理了，逐漸消亡。如「凡客體；心神不甯；這社會，真黑；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不僅侮辱我的人格，還侮辱我的智商；蒜你狠」等。

6 逆反叛眾的心理。這一特點尤其在年輕人身上比較明顯。年輕人言語中喜歡

選用新潮、怪異、前衛的用詞，處處表現出與眾不同。如：神器、任性、郁闷、驚豔、惡搞、裸聊、帥哥、竹葉(主頁)、斑竹(版主)等等。

(二) 詞語構造規律

語言系統本身的符號性、任意性和約定性，既為流行語的產生提供了可能，又對流行語的產生提出了規約性要求。語言的符號性和任意性允許新詞語以多種方式產生和呈現；同時語言符號的約定性又會對流行語進行篩選，這就造成了一大批流行語或者失掉新穎性而被保留下來成為一般詞彙，或者被棄用而逐漸消亡。新穎生動並符合現代漢語構詞和語言規律的流行語生命力較強。

1. 詞彙系統的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語法的系統性以及漢字的表意性都是流行語產生和發展的原因。詞彙系統的組合關係直接導致了一些詞語的新用法和新形式的產生，例如「雙贏、三贏、雙輸」等；聚合關係的類推作用產生了「X嫂、X的、X霸、X族、X客、X門」等成族群的流行語。這顯示了流行語衍生成產的特點，表現為詞語孳生的族群化特征。這類流行語在構造形式上通常表現出一種較強的類化傾向，大多採用類比構詞或仿擬造詞的

衍生方式，即：以現有詞彙的某個詞語模式為基礎，進行類推，更換部分語素而成。族群地孳生流行語，能批量生產新詞語，並使其所生產的新詞語形成詞語族。例如，從最早的「黑客、博客」到後來的「紅客、播客、維客、朋客、閃客、極客、刷客」等。再如「酒吧」的「吧」，本是漢語從音譯英語「bar」而引進來的借詞，此後又用它創造了「網吧、書吧、茶吧、氧吧、說吧、話吧」等。由「的士」的「的」構成了「摩的、面的、飛的、打的」等。由「水門」的「門」構成了「拉鏈門、白水門、安然門、情報門、高麗門、奶粉門、豔照門、虎照門」等。由「國際互聯網」的「網」字構成了「網民、網蟲、網戀」等詞。由「打工族」的「族」構成了「追星族、月光族、背包族、啃老族、地鐵族、北漂族、負翁族、酷摑族、草莓族、跳蚤族、彩虹族」等。由「山寨」構成了「山寨手機、山寨電視、山寨網遊、山寨鳥巢、山寨美女」等。「X蟲、X霸、黑X、零X、綠色X、X工程」等成族群產生的流行語，常常是一個新詞語的出現便帶動產生了一個詞族、詞群或一批詞語，從而使新詞語的產生呈現批量化、類型化衍生的態勢，這體現了新詞語衍生能產的特點。此外，漢語語法的系統性以及漢字的表意性，也

導致許多音譯借詞向意譯詞變化，有的還會引起詞彙系統的再度變化。族群式流行語不易消亡，例如下面的新詞語還在使用，「X屋」：淑女屋、飾品屋、糕點屋、咖啡屋、專利屋、軟件屋。「X模」：車模、房模、書模、浴模、菜模。「X港」：科技港、信息港、知識港、中藥港、服裝港。「X巢」：愛巢、私巢、小說巢。「X城」：電腦城、美食城、裝飾城、家具城、燈飾城。「X托」：醫托、藥托、掌托。「裸X」：裸奔、裸捐、裸聊、裸售、裸證。

2. 語言的經濟原則。語言的經濟原則作用于詞彙系統，要求對其成員的形式及數量進行精簡，促使一批多音節詞縮略（或再次縮略）而成為新詞語，例如：「三個代表、三優一學、五講四美三熱愛」等。由于語言的經濟性原則，絕大部分新詞語在音節形式上都有主動向單音化、雙音化或三音化發展的趨勢，以流行語中的縮略詞語最為典型。縮略成單音節的如：「汗」（表示慚愧、無可奈何之意）、「倒」（指暈倒，表示對某帖某人或某現實很驚異）、「寒」（是對某帖、某人或某現象很驚異）。縮略成雙音節的如：「彩市」（彩票市場的簡稱）、「港姐」（香港小姐的簡稱）。另外如「失聯、特首、軟件、雙規、考研、春晚、女足、攻博、諾獎、反腐、公關、通

脹、家教、體改、商檢、影視、交警、小資、共識、醫保、環保、安保、社保、地鐵、電郵、彩超、彩顯、立交、網校、外企、郵編、特區」等。縮略成三音節的有「高大上、經適房、發改委、證監會、白骨精」等。

3. 修辭方式的作用。修辭方式也促成了類推造詞、仿擬造詞或舊詞新用。在語言交際活動中，言語方式往往會轉化為一定的言語模式，這種言語模式一旦在交際中獲得其它成員的認可並被多次模仿和引用，修辭活動的思維模式就會因此而凝聚到語言的詞彙層面之中，這樣就促使了大量仿造、舊詞新義、舊義新用詞語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漢語的詞彙系統。用比喻修辭創造的新詞如「笨鵝（比較笨但又可愛的女生）」、「大蝦（網絡高手）」等。用借代修辭造的新詞有「大牆（監獄）」、「擦皮鞋（拍馬屁）」等。用反語修辭造的新詞有「極品（濃妝豔抹看起來很恐怖的人）」等。

4. 韻律機制。語音上的諧音原理，也成為音譯借詞和仿造詞語的主要生產方式，如「伊妹兒、伊美爾、伊眉兒」等。再如2014年的流行語「萌萌哒」，本來是「萌萌的」，「萌」即可愛，重疊為「萌萌」，則是很可愛的意思。「哒」諧音「的」，顯得俏皮幽默。「萌萌哒」形容人、事、物太可

愛了。大學生是積極活躍的群體，對長篇大論比較厭煩，更願意把有趣的東西挂在嘴邊，像「亞曆山大」、「杯具」都是因為與表達的意思諧音，把本意構造成一個具體的形象，「亞曆山大」是諧音「壓力山大」，把壓力很大和名人連在一起，通俗易懂，讓人一聽就印象深刻。

（三）社會發展與文化傳播

1. 社會進程加速，新事物、新現象層出不窮，這些必然導致流行語的產生。人們知識水平在提高，不少專業術語逐漸通用化，這也是新詞語增加的社會因素。流行語本身具有的新穎性特點決定了其語義的動態性，它們時刻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之中，不停地孳生新的成員以替代新意衰減或逐漸老舊的成分，流行語只能是一個處於相對平衡中的概念系統。這一特征在媒體用語、校園流行語、網絡用語、股市用語的流行語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如「你懂的」。「你懂的」本是網絡用語，2014年3月2日，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在回答提問時說：「無論什麼人，無論職位有多高，只要觸犯黨紀國法，就要嚴厲懲處。我只能回答成這樣了，你懂的。」「你懂的」就此一夜走紅，主要用于兩種場合：一是由于許多人都知道，說話人不必多說或無需

說明；二是由于涉及敏感話題，說話人不願說、不能說或者不便說。再如「打虎拍蠅」，它是「老虎蒼蠅一起打」的簡稱。「老虎」喻指位居高層的腐敗官員，「蒼蠅」指身處基層的腐敗官員。「打虎拍蠅」反映了黨中央在懲治腐敗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和政策措施，深刻形象。當前的語言規範政策相對開放寬松，使得新詞語的產生和發展獲得了比較優越的環境。

2. 改革開放後中國國門逐漸打開，開放的社會大環境增加了與外界的接觸，新的概念、觀點、事物隨之湧進國內，這種影響使得人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于是一批流行語應運而生，大量外來詞進入中國，中外語言交融。例如，「Q」是Cute的音譯，表示「可愛」。「BUG」原意是「臭蟲」，後來把跟電腦有關的故障都稱之為「BUG」。「I服了U」即「我服了你」，來自周星馳片子裏的經典台詞。英語、日語、韓語等也被廣泛吸納進新詞語。例如，「惡搞」一詞來源于日語「Kuso」。港澳台與沿海地區的影視與商業文化發展迅速，為了迎合消費者的好奇心，他們在廣告制作、宣傳中，力求使用新奇時尚的詞語，以吸引消費者。

3. 網絡、電話和媒體等新型交流工具的熱用和迅猛發展，使得新詞語的產生與傳播加速。人們在資源共享上途徑越來越

多，信息傳遞的速度也越來越便捷。因此，新詞的出現到流行，周期逐漸縮短。文化傳播使得那些一直在主流文化使用的流行語還在使用，如「給力」。而脫離了當下文化的很快就會銷聲匿迹，如「嗚咁啦」。新聞的時效性使得那些過氣的新聞語不再流行，如「死者目前情緒相當穩定，叉腰肌，我是交通部派來的」。「海選」，雖然產生時間是95年，但由于選秀節目年年火熱，導致「海選」一詞每到海選時節便備受關注，已成為第一輪選拔的「專業術語」。一些突發的社會事件也會引起對某些詞的重複記憶，如果某段時間「禽流感」爆發的話，「禽流感」的活力值會有明顯提升。純英文類的退出語言舞台的速度很慢，而中英文混用的退出較快，如「BUG」現在還在使用，而「I服了U」很少使用了。

（四）主流道德觀念

流行語與主流道德觀念也有關，「正能量」是在奧運火炬傳遞期間，很多博主發表「點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和「點燃正能量，運氣擋不住」的博文，之後這兩句迅速被網友跟進和模仿，「正能量」也成了網絡最熱門的詞彙。「最美」反映了主流道德觀念，「最美司機」吳斌在2012年5月29日中午，駕駛大客車行駛于滬宜高

速時，被迎面飛來的制動殼殘片刺入腹部致肝臟破裂，但他仍強忍疼痛將車停穩，並提醒車內2名乘客安全疏散及報警，後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流行語「最美」反映了一些人的光輝事迹，讓人心生敬意，如「最美女交警，最美女教師，最美奶奶，最美爺爺，最美媽媽」等。再如「托舉哥」，2012年6月3日，廣州3歲女童琪琪懸挂4樓陽台，周衝徒手爬上3樓防盜窗，將女童托舉了十余分鐘，獲救後悄然離去。與此類似的還有「麻袋哥」「濃煙哥」等。這些流行語是對舍己救人或樂于助人人物的贊美，反映了人們對美好道德的歌頌。

（五）群體表達喜好

流行語不止在青年學生群體中流行，和自己生活工作相關的流行語，會被某一群體高頻使用。2013年12月27日，在暨南大學青年工作委員會文史哲分會座談會上，在座的56名青年教師中，有5名用流行語「亞曆山大」向暨南大學黨委書記彙報自己的工作現狀。暨南大學一位教授開會時經常開玩笑說：「我是來打醬油的」。

三、結語

流行語具有高頻性、時代性、時尚性、時效性和地域性的特點。各年度流行語活

力值第一位的多為熱門網絡用語，時間越近，流行語活力值越高。衰亡值高的流行語隨著新聞事件的時過境遷而風光不再，它們的語言形式一般較長，不適宜于表達個體情感。流行語的生成機制主要有認知心理，詞語構造規律，社會發展與文化傳播，主流道德觀念語群體表達喜好五方面。認知心理方面主要反映在權力人物的親民意識和趨新求異、崇尚簡潔、模仿從眾、放鬆減壓、逆反叛眾的心理等方面。漢語構造規律主要有詞彙系統性、語法系統性和漢字的表意性，語言的經濟原則，修辭方式的作用，韻律機制等方面。社會發展與文化傳播促進了流行語的發展，社會進程加速，新事物、新現象層出不窮，開放的社會大環境，網絡、電話和媒體等新型交流工具的熟用與迅猛發展，導致流行語的產生和傳播速度倍增。流行語與主流道德觀念也有關。和自己生活工作相關的流行語，會被某一表達群體高頻使用。

關於流行語的褒貶眾說紛紜，一方面，我們認為在接受新事物的時候應該具有更多的包容，新事物的出現一定有其存在的價值，一定是社會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反映，因而，不應該絕對否定，流行語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求，在交際中也體現了自身的價值，這些我們應該肯定，另一方面，我

們也要防止過度濫用，否則有礙于人們的交際。我們應該以積極的態度正確對待流行語。

參考文獻：

- [1]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2].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012.
- [2]胡偉.流行語的來源、特點及產生原因[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10，（1）.
- [3]汪磊.北京2008年奧運會語言環境建設及其社會效果探析[J].語言文字應用，2009（1）.
- [4]袁偉.論新媒體流行語在廣電媒體中的規範使用——以近年來年度新媒體十大流行語為例[J].語言文字應用，2012（3）.

（作者：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英漢禁忌語的對比研究及其新發展

◎林文苑

摘要：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全球化的發展，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交流日益頻繁。當人們在進行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應當注意中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禁忌語，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和誤解。本文通過大量的英漢禁忌語實例，比較英漢禁忌語在三大應用範疇存在的相似性和不同之處，並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指出了禁忌語新的發展趨勢，從而喚起人們對禁忌語這一語言現象的進一步關注，提升人們的交流技巧和交際能力。

關鍵詞：英漢禁忌語、對比、發展

一、引言

禁忌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現象，像一種無形的戒律約束著人們的語言和行

為，使人們在禁區內不敢越雷池一步。語言禁忌作為一種普遍的語言現象，是社會禁忌的重要組成部分，普遍存在於各個文化之中。由於語言的共性，英語和漢語中的禁忌語存在著一些相似之處，但又因為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英漢兩種語言中的禁忌語也同樣存在一些差異。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如果人們能夠意識到這些差異，就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誤解，促使交流的正常進行。因此，為了幫助人們進一步了解禁忌語，提升人們跨文化交際的能力，本文對比分析了英漢禁忌語中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並在一定語料事實的基礎上分析了禁忌語新的發展變化。

一、禁忌語的產生及定義

（一）禁忌語的產生

「語言本來是與勞動同時發生和發展的一種社會交際工具。但是在對自然現象和自然力不太理解的環境裏，語言往往被與某些自然現象聯繫起來。這樣，語言就被賦予了一種它本身所沒有的超人的感覺和超人的力量；社會成員竟以為語言本身能夠給人帶來幸福和災難，竟以為語言是禍福的根源。誰要是得罪這個根源，誰就得到倍加的懲罰；反之，誰要是討好這個根源，誰就得到庇護和保佑。這就自然而然導致了語言的禁忌」(陳原，1983)。可見，禁忌語的產生很大程度上受人們心理因素的影響，正是一些詞語的意義所產生的聯想使這些詞語成為了禁忌語。

（二）禁忌語的定義

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在其專著《圖騰與禁忌》裏對「塔布（taboo）」一詞作了如下解釋：

「塔布，就我們的理解，它代表了兩種不同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崇高的」、「神聖的」；另一方面，則是「神秘的」、「危險的」、「禁止的」、「不潔的」（2005）。

這也就是說，正是由于人們對某些人或物的崇拜或畏懼，導致人們對某些言行的自我限制。禁忌語指的就是因為這些情感因素而刻意規避的詞語。根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對禁忌語的定義得知，禁忌語指的是被某些人視為不雅的或下流的詞語。因社會風俗或傳統習慣的不同，當人們在談及某些詞語的時候會引起對方的反感和不快，這類需要避免使用的詞語即為禁忌語。

三、禁忌語的對比

（一）英漢禁忌語的相似性

盡管中國人和西方國家的人們思維方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人們所處的自然環境相似，都經歷了相似的社會進程

——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因此英漢禁忌語存在許多相似性。

1. 災禍性禁忌語

由于人們都追求健康長壽的生活，因此「死」則被視為人生中最大的不幸，所以凡是與「死亡」相關的詞語都被貼上了禁忌的標籤。

在西方國家，人們為了避免說出「death」一詞，常常用與「God」相關的詞來代替，例如「be asleep in the Arms of God」，「be with God」，「depart to God」等。同時，為了規避「death」一詞，人們常用人死之前的一些現象來生動描述「死亡」，例如「go the way of all flesh」，「breath one's last」，「pay one's debt to nature」等。此外，一些間接表達美好祝願的詞語也常用來代替「死」這個禁忌語，例如「go to a better world」，「go to heaven」，「end one's early career」，「be out of pain」，「be free」等。

在漢語中，代替「死」字的詞語通常與「天」、「世」等字相關，例如「歸天」，「升天」，「逝世」，「謝世」，「棄世」，「與世長辭」等。由于漢語中通常把「死亡」比作「永久的沈睡」，所以一些與「睡」相關的詞也用于替代「死」字，例如「長眠」，

「安息」等。以上這些短語或說法都對死者帶有褒義或者不帶感情色彩，而在英漢兩種語言中還有一些較為隨便的說法來替代「死」這一充滿禁忌色彩的字眼。例如在英語中，「kick the bucket」（翹辮子），「be done for」（完蛋）等，漢語中「一命嗚呼」，「嗚呼哀哉」，「喪命」等。無論這些委婉語是褒義還是貶義，其作用都是為了減少人們對死亡的恐懼，避免直接談及「死」這個令人不快的字眼。

2. 猥褻性禁忌語

猥褻性詞語通常是指與性器官、性行為以及分泌排泄等不潔之物相關的詞語。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在中國，這類詞語都被認為是粗俗下流、不堪入耳的。自古以來，人們都力求避俗求雅，因此在英漢文化中，人們都避免談及這些猥褻性詞語，而用一些較為委婉的詞語來代替。

在英語中，有許多形象的表達美化了「to have sex with」，例如「go to bed with」，「art of pleasure」，「make love」等。對於涉及性器官的詞語，英語中通常用「the lower parts」或者「private parts」來代替「vagina」和「penis」。英語中論及分泌排

泄物時，「waste」和「pass water」便委婉地取代了「shit」和「urinate」。此外，「menstruation」一詞通常被替換為「my aunt Flo」或者是「my period」。

漢語中類似的表達更是比比皆是。對于性行為，在古代通常稱之為「房事」，「圓房」，「夫妻之禮」，而「解大（小）便」則稱之為「出恭」，「更衣」，「如廁」等。在現代，「夫妻生活」，「同居」等委婉表達則常用來指發生性關係，而「唱歌」，「跳舞」這種形象生動的隱晦詞則替代了「解大（小）便」。女生一般不會直接說出「月經」一詞，而是用「例假」，「大姨媽」等詞來取代，或直接用指示詞「那個」來指代。由于在漢語中人們也羞于直接表達性器官，因此通常用「陰部」，「私處」，「下身」等表示身體部位的詞語來替代。

3. 褻瀆性禁忌語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國家，具有宗教色彩的詞語往往被看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除了在特別嚴肅的場合可以使用與宗教有關的詞語以外，其它場合都不能濫用，否則就是犯了大忌。因此宗教和宗教信仰也成為了禁忌語存在的一個重要領域。

基督教是西方國家普遍信仰的宗教，因此上帝的名字「Jehovah（耶和華）」便是最大的禁忌語。英語中各種帶有宗教情感的詞語都被視為禁忌語，例如「Christ」，「God」，「damn」，「hell」等，雖然這些詞語在口語中經常出現，但大多是為了表達憤怒之情或挑釁說話的另一方。在日常生活，為避免直接提及這些詞語，往往使用一些與之相近但又不具備宗教色彩的詞語來代替，例如「gosh」，「golly」，「Jimmy」，「for crying out loud」等。此外，聖經上講到撒旦是耶穌最大的敵人，無惡不作，因此人們出于對撒旦的恐懼，也對「Satan」一詞閉口不提，取而代之的是「Old Nick」，「the Evil One」等。

中國雖然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但中國人受孔子思想影響較深。「孔孟之道崇尚禮儀，要求人們在社交活動中言語適度，不可妄言或者信口開河，不著邊際」（胡文仲，1998）。在一些信奉保護神的家庭中，「買神像」一詞是絕對禁忌的，因為神像不能說「買」要說「請」，否則就是犯忌，褻瀆了神靈。另外，在中國一些地區，百姓把某些動物視為保護神，認為這些動物可以保佑他們平安如意，所以一些普通動

物的名字也被列入了禁區。比如，在東北長白山一帶，百姓把虎視為當地的保護神，所以那裏的人們是忌說「虎」字，取而代之的是「山神爺」或者「山君」。

（二）英漢禁忌語的差異性

由于英漢兩種語言隸屬於不同的語系，所以它們在讀音和拼寫上大相逕庭。正是由于這些差異，英漢詞彙所產生的聯想意義才不盡相同，所以它們在禁忌語的領域也存在著異同。另一方面，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維習慣的不同也使得人們對某些語言詞彙產生了不同的態度。

1. 稱謂禁忌語

在西方國家，「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認為人生來就應享有同等的社會地位，因此他們在稱謂上沒有任何限制。無論是長輩和晚輩之間，還是上司與下屬之間，亦或是老師與學生之間，大家都是直接以姓名相稱，雙方不僅不會感到冒犯，反而覺得是一種親昵的表現。

中國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以「仁」為核心，強調禮節。因此，人們認為應該對自己年長的人表現出特別的尊敬，其中一方面就體現在對他們的稱謂上。此外，

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有名諱制度，這種制度延續至今仍對我們的稱謂制度產生影響。晚輩對長輩，下級對上級，學生對老師都不可直呼姓名，否則就是犯忌。爲了表示尊敬，晚輩稱呼長輩按照輩分稱呼，下級稱呼上級時一般用姓加上頭銜來表示，比如「李經理」，「王院長」等。

2. 數字禁忌語

數字本沒有任何感情意義，但是由于某些數字與宗教曆史發生了關聯或者由于某些數字的發音特點，人們對這些數字便產生了不同的態度。

在英語中，「13」這個數字是絕對忌諱的，因爲據《聖經》記載，耶穌和弟子共進晚餐時，猶大正好是第十三人，而他爲了30塊銀幣將師傳出賣，使耶穌于13日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在西方人眼中，「13」是個令人恐懼不安的數字。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爲了避免談及這個禁忌詞語，都想方設法的避開「13」。航空公司沒有13號航班，樓房沒有13樓，宴請時避免13人坐一桌，運動員也沒有13這一編號等等。

在漢語中，「13」不僅沒有受到禁忌，

百姓還對其情有獨鍾。儒家的經典有《十三經》，明朝皇帝的陵墓有十三座，稱爲「十三陵」，北京同仁堂的藥店裏有「十三太保」。而數字「4」和「7」卻成了漢語中的禁忌語，因爲這兩個數字的發音接近「死」和「氣」，因此凡是與「4」和「7」有關的數字通常會被規避。公共汽車沒有四路，醫院裏絕無四樓或者四號病房，帶「4」和「7」的門牌號、車牌號、電話號碼都會遭人嫌棄。

3. 隱私禁忌語

西方國家的人崇尚個人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重要性，因此他們十分注重個人的隱私，不願意別人過問自己的私事。在英語中，諺語「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就充分反應了這一心理現象。凡是涉及個人隱私的話題，例如年齡、宗教信仰、婚姻狀況、個人收入等都被列入禁忌的話題之中。「How old are you?」，「Do you go to church?」，「Are you married?」，「What's your income?」等問題都應避免提及。

中國追求集體主義的精神，認爲個人的事就是集體的事，所以長期以來形成了

團結互助的社會風貌，因此個人的私事很難不被人知道或幹預。另一方面，千百年來，中國農村居民幾十戶、幾百戶住在一個村莊，人與人之間接觸的機會多了就會互相關心，這免不了會涉及到一些私人話題，因此在漢語中並不存在關於隱私方面的禁忌語。「您今年高壽？」，「你是單身嗎？」，「你月薪多少？」等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

四、禁忌語的新發展

（一）禁忌語領域的變化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變遷，語言也會相應地發生改變，而禁忌語作爲語言的一種表現形式，自然也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改變。禁忌語所具有的時代性，使之可以從一個時代的普通名詞跨越到另一個時代的禁忌範圍之內，或者一個時代的禁忌語到了另一個時代就變成普通名詞。

在漢語中，「小姐」一詞的變化就是禁忌語發展的典範。新中國成立以前，「小姐」通常指有錢人家的女孩，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褒義詞。文化大革命時期，「小姐」指不屬於革命階級的年輕女性，是一個中性詞。近現代時期，「小姐」泛指未婚

女性，是一種尊稱。而如今，「小姐」通常指利用青春及肉體從事色情行業的女性。因此，現在人們稱呼女性時一般避免稱呼對方為「小姐」而用「女士」來代替，由此可見「小姐」一詞在漢語中已成為禁忌用語。「同志」一詞也有類似的變化。起初，該詞指具有相同目標、共同理想信念的人，人們在街上招呼陌生人時一般會稱呼對方為「同志」。而如今，「同志」一般是指同性戀者，因此稱呼對方為「同志」便會冒犯對方，引起對方的不快，所以也應該避免使用。此外，一些罵人的詞語，例如「媽的」，「你媽」也被新出現的表達「MD」，「尼瑪」等所取代。在英語中，「nigger」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被廣泛用來稱呼黑人，而現在在日常的社會交往中該詞已成為一個禁忌詞語，因為這樣稱呼違背了美國的人權思想。

相反，「死」字在漢語中被解除了「禁忌」的禁輻，開始在口語中層出不窮。一些與「死」有關的表達不僅沒有冒犯之意，反而用來描述比較極端的程度，例如「醜死了」，「難吃死了」，「笑死啦」，「美死你」，「想死我了」等等。在英語中，「sex」原意為利用性和色相勾引或挑逗他人，含有

貶義，因此人們一般不會使用這個詞來評論他人。而如今，無論在英語中還是在漢語中，該詞已作為人體美的修飾詞而為大家所接受。

（二）英漢禁忌語的趨同性

世界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不同文化互相滲透，互相影響。在這種影響之下，差異越來越少，相同點越來越多。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必然要反應文化之間產生的影響，因此不同語言之間的相似性也會增加，這其中必然包括英漢禁忌語相似性的增加。

在中國，人們過去不注重自己的隱私，對於年齡、工資等問題毫不避諱。而如今，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使人們越來越看重自己的隱私，在公共場合談及自己的收入、工作情況、家庭背景等情況的現象越來越少。尤其對於中國女性而言，她們開始避諱談及自己的年齡和體重。因此，對於年輕女性來說，「你芳齡多少？」，「你現在多重？」這類的問題也成為了漢語中的禁用語言。

此外，數字的禁忌語也增加了一些相同點。例如，在漢語中，「13」本是一個普通的數字，人們對它不帶任何感情色彩，

因此也不會刻意回避它。但是隨著中西方交流的深入，中國一些發達城市的居民也開始對「13」產生了恐懼之感，並認為這是一個不詳的數字，因此一些商圈的建築樓層也沒有十三樓。

（三）對待英漢禁忌語中差異的態度轉變

如今，發達的信息通訊使中西方國家的人們交流日益頻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逐漸接受對方的獨特性，包容對方的差異性。另外，隨著英語在國內的普及，西方的思想和觀念也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禁忌語方面，就表現在人們對待彼此禁忌語中差異的態度轉變。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國家，人們對待彼此禁忌語中的差異都采取了一種更加包容的態度。就拿稱謂禁忌語來說，中國人起初無法理解西方國家的人們直接稱呼自己師長的姓名，認為這樣做是不僅大逆不道，還犯了大忌。因此，在當時的國人眼裏，大部分西方人都是沒有禮貌，沒有教養的。然而，隨著西方文化的滲透，中國人開始理解並接受這種差異，人們也逐漸采取了更加包容的態度來對待稱謂方

面的差別。同樣，西方人也逐步接受了中國人的稱謂習慣，不再認為這是不平等的表現。

五、結語

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都是相通的，禁忌語作為中西方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存在于各個民族之中，因此英漢文化在禁忌語方面都具有相同的一面，而不同民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差異又導致了英漢禁忌語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技的日新月異，不同文化相互影響，相互滲透，英漢禁忌語也產生了一些新的發展變化。因此，在跨文化交際中，充分了解對方的文化是極其重要的。只有衝破各自的文化束縛，以求同存異的態度去包容不同文化的特性，才能減少文化衝突，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參考文獻：

- [1]陳原.社會語言學[M].北京：學林出版社，1983.
- [2]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3]A. S.Hornby.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七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4]鄧炎昌，劉潤清.語言與文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5]胡文仲主編，杜學增著.中英文化習俗比較[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8.

[6]常敬宇.漢語詞彙文化（增訂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7]莊和誠.英語禁忌語當議[J].現代外語，1990，(2).

[8]莊和誠.禁忌語詞縱橫談[J].現代外語，19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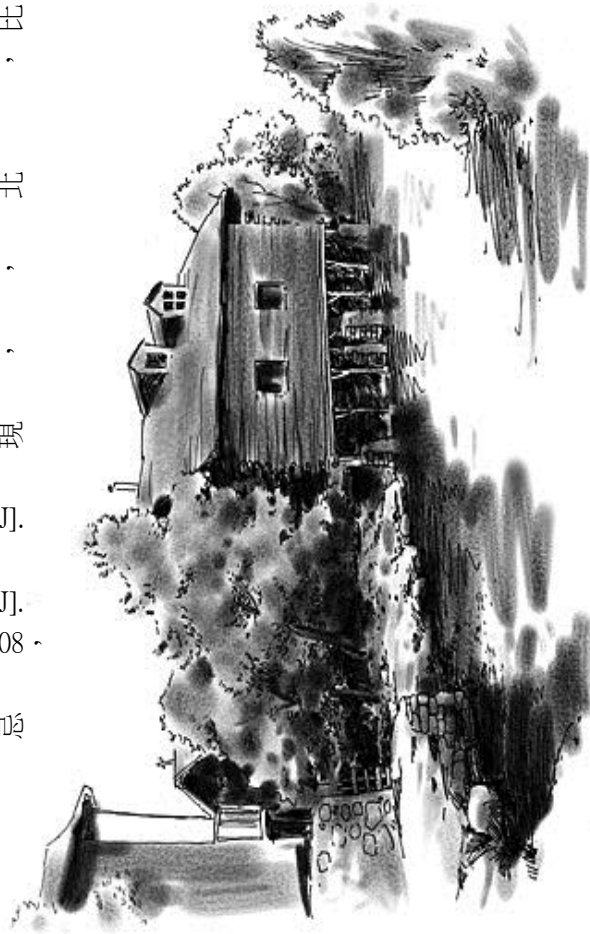
[9]葛校琴.英漢語言禁忌的深層文化映現[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1，(2).

[10]李桂媛.英漢禁忌語及委婉語探討[J].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11).

[11]宋媛媛.淺談英漢禁忌語的文化差異[J].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7).

[12]張潔茹.東西方語言與文化的差異——禁忌語[J].甯夏社會科學，2009，(2).

（作者：暨南大學）



大學形象傳播的新視角： 校友資源開發與利用

◎孫 斌

摘要：校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對於大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有效開發與利用校友資源，既可展示大學的人才培養成果，也是傳播大學形象的重要視角。本文通過分析大學校友資源的價值和特點，從傳播大學形象的視角提出校友資源開發與利用的建議。

關鍵詞：大學形象傳播、校友資源開發與利用、對策

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和大學對可利用資源的深入挖掘，“校友”和“校友資源”這類詞語越來越多地進入到公眾視野，大學針對校友資源的開發力度也越來越大，圍繞上述現象開展的相關研

究也不斷出現在各類媒介平台。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是把校友或者校友資源作為人才資源的研究對象，而且把校友對於大學發展作用的著力點局限在物質層面。本文試圖從形象資源的角度來豐富校友資源對於大學發展作用的深度和廣度，從校友資源開發與利用的視角探索大學形象傳播問題。

一、大學形象傳播的傳統路徑

在談論大學形象傳播的新視角之前，有必要對大學形象傳播的傳統路徑進行梳理。在傳播學的研究成果裏，有關大學形象傳播的研究並不突出。這既體現在研究的廣度上，也體現在研究的深度上。雖然諸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大學形象的問

題進行了研究，但概括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通過加強內涵建設，增強大學形象傳播力。

大學形象作為公眾對一所大學客觀現狀的整體印象與評價，是通過其辦學水平、辦學質量、創新能力和社會服務水平等因素折射出來的。通過加強大學內涵建設傳播大學形象，就是大學要通過發揮其本職效能的最大化實現形象內涵的最優化，努力向媒體和公眾傳播學校的正面信息和良好形象。毋庸置疑，大學內涵建設成效越顯著、特色越鮮明的大學，越有助於提升學校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對任何一所大學來說，大力提升辦學水平、辦學質量、創新能力和社會服務水

平都是其內涵建設的核心內容，而通過內涵建設所達到的辦學水平、辦學質量、創新能力、社會服務能力、文化傳承創新能力等就成為公眾和媒體認知大學形象的重要參照。上述的參照標準都屬於綜合概念，公眾和媒體在評價大學形象時，更習慣於通過大學在加強內涵建設過程中所涉及的文化氛圍、師資水平、學生質量、軟硬環境、辦學特色等信息作出判斷。于海琴（2003）通過問卷調查，證明了文化、教師、環境、學生四個因素是構成大學形象的要素，並分析了每個因素在大學形象構成中的不同作用。二戴林富（2008）提倡以創新大學文化塑造大學形象，認為加強大學文化建設，培育各具特色的大學文化，是塑造大學形象的關鍵。三何暉等人（2005）認為當前形勢下重視大學形象設計與塑造是必要的，在對大學形象現狀實態進行分析後，認為特色突破、文化傳承，環境烘托、最佳時機是現代大學形象設計與塑造的有效手段。[3]

一是通過加強形象識別，提升大學形象的顯示度。

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國外的大學就通過借鑒企業形象識別 CI (Corporate

Identity) 的理論框架，依據企業形象識別的三個成分，構建高校形象識別系統 CI (University Identity)，將大學的運營理念、精神宗旨等文化系統和辦學思想，通過全員的行為表現和整體的識別系統傳達給社會公眾，促使社會公眾對大學產生一致的理解、認同和接納，從而為學校樹立良好的形象，並支撐自身更好地發展，其最終目標是全方位的塑造學校的鮮明形象和個性。CI 的組成成分除了理念識別 UMI (University Mind Identity)、行為識別 UBI (University Behavior Identity)、視覺識別 VI (Visual Identity) 外，還具有大學區別於其他社會組織的特性，即大學人員識別 UPI (University Personnel Identity)、大學學科識別 USI (University Subject Identity)。

形象識別理論近年來被我國的研究者引入到大學形象識別的研究中。葉李娜（2007）通過闡述 CI 戰略和大學形象的基本理論及兩者的關係，從理論層面和操作層面探討了導入 CI 戰略塑造大學形象的問題。作者認為，CI 戰略與大學的曆史淵源，為基于 CI 戰略塑造大學形象的可行性提供了基礎；大學在導入 CI 的不同階段應注意不同的側重；不同大學導入 CI 進行形象塑

造應從各自的特性出發。三戚玉華認為，CI 即企業識別系統是在企業界發展比較成熟的形象塑造工具，對於塑造大學品牌形象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5]

三是從通過重視傳播生態，改善大學形象傳播效果。

新媒體的迅猛發展為大學信息的傳播提供了更多切實可行的途徑。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既是大學形象傳播的機遇，同時也要警惕機遇後面潛在的重重危機。在一個缺乏制約和秩序的網絡世界裏，某些網民的鼓動完全有可能導致狂熱的盲從現象的出現，社會矛盾在網絡世界被毫無約束地誇張和渲染，造成的矛盾越發容易激化，常常讓人猝不及防。在大學形象傳播的過程中，公共關係（這裏主要是指大學與政府、媒體和公眾的關係）的發展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大學形象傳播的效果。傳播一個好的大學形象，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還需要依賴政府、媒體與公眾的認可和支持，共建一個良好的形象傳播生態。政府對於大學的肯定和支持可以傳達出一種影響媒體和公眾的態度，媒體報道大學時對信息和視角的選擇可以影響政府和公眾的判斷，公眾對於大學的認可和選

擇反過來也可影響政府的扶擇和媒體的考量。

雖然目前的研究還很少是針對公共關係與大學形象傳播進行的，但研究者還是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媒體和公眾傳播大學形象時所關注的重點。卞冬磊、張稀穎（2005）以2004年全年有關大學的報道為文本，分析出轉型期大眾傳播媒介對大學報道多呈負面報道的現狀和成因，從而指出，在轉型期社會環境的變化和人們價值觀變遷之間的不平衡導致了媒體報道與大眾期待的大學形象之間的矛盾。^[5]金兼斌（2006）通過對2002年一月至2004年12月間紙質媒體和網絡媒體重點關注的與大學有關的5起焦點事件報道的分析，對我國高校在大眾媒體中的形象問題作了實證研究，得出了近年來大眾媒體中的大學形象呈現負面趨勢且不斷加劇的結論。^[6]

二、校友資源開發與大學形象傳播

從辦學資源的渠道看，我國公辦大學的外來資源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政府資源，二是社會資源，三是校友資源。政府資源，是各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通過資金、政策等形式給予大學發展與建設的各

類支持的總和。社會資源，是社會各界通過捐助、合作等方式給予大學的各類支持的總和。校友資源，是指校友自身作為人才資源的價值，以及校友所擁有的財力、物力、信息、文化和社會影響力等資源的總和。^[7]從辦學資源的結構看，雖然說不同的大學因其隸屬關係、辦學宗旨、辦學屬地、辦學層次和辦學水平等因素的影響，上述三類外來資源的總量和比例都不盡相同，但總的說來，一般是政府資源是主體，社會資源次之，校友資源所占比例最小。這種局面的長期存在，既有大學過於依賴政府資源從而忽視校友資源開發的主觀因素，也有校友資源本身潛在性特征的客觀影響，其結果是校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被忽視。

進入新世紀，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大學的辦學規模快速擴張，相互間的競爭日趨激烈，辦學資源的短缺成為許多大學共同面對的難題。與此同時，先期畢業的大學生們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利用自身的知識優勢，在不同行業領域裏脫穎而出，不少政府要員、商界精英應運而生，這也為他們支持母校發展提供了可能。辦學資源緊張，校友成就斐然，加之受西方

大學在校友資源開發利用方面成功經驗的啓示，很多大學開始將校友資源的開發利用作為學校工作的重點，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事實證明，校友資源對於大學的建設發展能夠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宣傳和倡導校友的精神追求有助於展示大學的精神和價值內涵。校友，是指在本校學習或工作過的人，包括在本校接受過學歷教育、非學歷教育和短期培訓等不同教育形式的學生，以及在本校工作過的所有教職員工。在校期間的學習、工作經歷，相同文化氛圍和大學精神的熏陶，在校友與母校之間形成了以知識血脈和人物情感為基礎的特殊關係，這種先天的優勢不僅是在校友之間，而且對在校師生也會產生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校友在校期間的刻苦精神、創新能力、優異成績、豐碩成果，可為後來大學生如何學習和成才樹起趕超的標杆；校友畢業以後的創業精神、成功經歷、社會認可度、矚目成就都可成為大學生競相模仿和超越的榜樣。功成名就和事業中天的校友除了在校時的優異表現外，在工作中也大都有過不平凡的創業或奮鬥經歷，傑出校友們的成就和業績會為母校帶來聲譽和榮耀，

同時他們已有的經歷和經驗也會對在校師生產生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影響，並成為師生們引以為榮的學習典範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動力。人才培養的途徑和方法有很多且不盡相同，但傑出校友的親身經歷和現身說法在學生成長過程中迸發出的精神動力絕不可小視，這種模範的力量可以引導學生樹立信心，積極進取，追求卓越。

（二）挖掘和弘揚校友的成功典範有助於提升大學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校友在很多時候相當於學校的名片，代表母校傳播母校形象，彰顯母校風采，是母校在媒體和社會公眾心目中最直觀的形象品牌。成功的校友對於公眾和青年學生選擇大學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影響，一般來講，影響公眾評價和學生擇校最主要的因素是大學的人才培養質量和學術創新能力，其次就是校友。校友的社會知名度和行業貢獻度可以影響到母校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講，知名大學培養精英人才，傑出校友彰顯大學聲譽，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共同提升。如北京師範大學的校友莫言獲得了全球矚目的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中國大陸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莫言的成功，除了填補大陸作家在這個獎項上的

空白外，也提升了母校的媒體關注度和社會影響力。一所大學的校友在各行各業的知名度和貢獻度都能名列前茅，培養這些校友的大學當然是功不可沒。

校友不僅可以通過自身的突出表現助推母校形象，而且還是母校形象的忠實的維護者和堅守者。“什麼是母校？就是那個你一天罵她八遍卻不許別人罵的地方”。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李培根先生道出了母校在學生和校友心目中不可褻瀆的崇高地位。

（三）引導和推動校友回饋母校與社會彰顯大學的社會責任和擔當。西方大學把社會支持和校友捐贈作為學校資金主要來源的籌資模式近年來已為我國許多大學所借鑒，當前校友捐贈也已逐漸成為大學從非財政渠道獲得物質支持的主要方式。當校友在事業上獲得成功以後，隨著職務的提升或者財富的增多，其社會責任感和擔當能力也會相應增強，但在選擇支持或捐贈的對象時，常常會遵循同等優先原則，即在同等情況下優先選擇培養自己成才的母校作為支持對象。一般說來，校友對於母校發展的支持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

一是單個校友或校友組織直接向母校提供智力、信息、資金、人脈等方面的支

持，為母校發展服務。如設立獎助金、獎教金、各類發展基金，定向捐款、冠名建築物等。或者是發揮行業優勢，與母校一起各取所長，整合雙方優勢資源，共同開展人才培養、科技開發、教育服務、文化傳播等項目的合作，實現互助共贏。如產學研合作、設立實習基地、開展校企合作等。

二是校友或校友組織在社會與母校之間發揮橋樑作用，為母校與第三方合作提供幫助。走出校門後，分布在各行各業的校友成為聯系學校與社會的重要媒介，他們既有行業優勢，也有資源優勢，既可為雙方提供所需的信息資源，也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學校與社會之間牽線搭橋，促成合作，為母校發展注入活力。

三、以品牌為導向開發利用校友資源，促進大學形象傳播

品牌這一概念，很多時候運用在企業管理和市場營銷領域。優質品牌的優勢在於能夠加深消費者對品牌承載的產品及其服務的認知程度和認可程度。我們在這裏要談論的品牌，主要是針對品牌創建的理念和核心價值觀，區別於一般的產品或服

務品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大學同樣需要創建自己的品牌。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大學只有不斷適應市場的變化需求，才能在競爭中保持特色和優勢，才能在公眾面臨諸多的選擇時受到青睞。因此，優質教育品牌的創建與推廣對於當今的大學來說，既是傳播大學形象的需要，也是推動大學不斷發展進步的需要。在我國現有的眾多大學排行中，一所大學擁有傑出校友的數量和校友對社會發展與進步的貢獻度往往是評價大學綜合實力和大學形象的重要參考。如果說大學培養了人才，那麼校友則鑄就了大學的品牌。校友在追求其事業和人生目標的過程中，服務社會，奉獻國家，以各種不同方式弘揚母校精神，傳播母校聲譽，擦亮母校品牌。因此，開發利用校友資源，應以品牌為導向，增強學校形象傳播力。

校友品牌，是能給母校及其師生、校友起到正面激勵、精神鼓舞和形象提升的一種無形資產。對於大學來講，校友資源不僅是智力資源、財力資源、信息資源，同時也是重要的形象資源。但是，從資源的顯示度來看，校友資源屬於一種潛在的隱性資源，只有通過理性地涵養和開發，

才能實現有效利用。要有效地開發利用校友資源，品牌建設既是導向也是手段，品牌的創建者既要考慮品牌自身的創建效果，更要關注品牌對於大學形象傳播的積極作用。

（一）開發利用校友資源要體現公益性。體現公益性，不以贏利為目的，這是校友校友資源開發利用的基本原則，也是校友品牌區分一般產品或服務品牌的重要特征。校友品牌創建的目標首先是要考慮的是社會效益而不是經濟效益。校友活躍在社會的各個行業、各個領域，其言行廣受關注且常常與母校關聯。因此，一些蘊含著積極向上、樂善好施、富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等發展理念的品牌信息能向母校師生和社會公眾傳遞正能量，不僅可以贏得正面好評，還會影響社會風氣，鞏固輿論和公眾對大學的認可度和信任度，強化母校師生和廣大校友的榮譽感和忠誠度。優質的校友品牌可以為母校贏得尊重和擁戴。

以扶貧助困、幫弱救急、互助合作、守法傳道、節儉環保等以關注民衆生活、倡導守法誠信、推動社會進步、擔當社會責任為核心價值觀的校友品牌，既符合高等教育培養高層次人才的最終目標，也契

合轉型期社會對傳播正能量的廣泛需求，容易在社會上產生示範和共鳴，並得到輿論和公眾的認同。這樣的校友品牌傳播的不僅是社會傳導的核心價值觀，也是大學在文化傳承和人才培養方面的成效。

（二）開發利用校友資源要注重長效性。任何品牌從創建到推廣，都是經過長期發展、不斷完善，才能逐步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優勢，並在此過程中慢慢深入人心，贏得公眾認可，校友品牌也不例外。品牌形成的長期性特征決定了校友品牌創建必須堅持長效性原則，任何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做法都不符合校友品牌創建的本質要求。堅持長效性原則，首先是要有精品意識。在創建校友品牌時，不能將校友品牌的創建等同於一般臨時性校友活動的開展，也不能不加選擇地遍地開花，而是要結合社會的主流價值需求和母校的文化特色、大學精神等因素確定品牌目標，集中人力物力，持續涵養提升，全力打造精品。校友品牌的層次折射大學教育的水平，精品能夠獲得更高的關注度，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傳播力。

其次，是要有類別意識。創建品牌要著眼長遠，分層分類進行。校友畢業的時

間不同，從事的職業不同，發展的程度不同，各自的價值觀和興趣愛好不同，決定了在創建校友品牌時不能夠採取單一的模式，而是要分門別類、區別對待。如分別以「運動」、「環保」、「慈善」、「健康」等概念確定品牌主題，既能符合更多不同需求校友的願望，也有利于品牌創建效果和影響力的提升，擴大學校及其校友的知名度。

（三）校友資源開發利用要著眼多元化。在校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目前多數大學都存在以下兩個問題，一是資源開發領域過窄，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鼓勵校友捐資捐物的物質層面；二是校友的參與率過低，把目光聚集上少數精英校友的身上。這不僅使資源利用的廣度和深度受到局限，而且絕大多數校友的積極性和潛能得不到發揮，影響校友資源開發和校友品牌創建的效果。在校資源開發過程中，校友參與率是校友對學校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指標，是學校凝聚力的反映^②；資源開發的多元程度是衡量校友資源是否豐富、開發力度是否深入的重要參考。因此，創建校友品牌，其內容不能僅限于物質捐贈，其對象也不能僅限于精英校友這樣的層面。

創建優質、響亮的校友品牌，不僅需要拓寬資源開發的面，即除了物質資源外，還可以利用科技資源、教育資源、信息資源創建品牌，這樣不僅品牌更加豐富，而且因為有更多擁有資源的校友參與其中，校友資源的利用率也會大幅提高。與此同時，在開發資源時，除精英校友外，還要考慮到普通校友的規模和需求。盡管普通校友的資源和能力可能不如精英校友，但積沙成塔、集腋成裘的規模效應和聚集效應，不僅可以發揮更多校友的積極性，強化校友品牌的顯示度，還有利于提升大學的凝聚力和形象傳播力。

（四）校友資源開發利用要倡導互利性。堅持互利性原則，就是在開發校友資源時，既要爭取校友的支持和服務，同時也要了解校友的需求，並利用學校的優勢為校友本身或其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提供幫助。這也是為校友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創造條件，為學校獲取更多的支持提供可能。校友資源開發在美國許多高校可以找到借鑒和啟示。美國大學的校友會代表所有校友的利益，其目的是為校友提供社會交往的機會，為校友提供職業回導和服務，讓校友通過資助和參與母校活動方式推動大

學發展，最終提升大學的聲譽和名望。^③由此看來，這種互助的做法，最終可實現互利，大學依然是利益的獲得者。

因此，大學在創建校友平台的時候，不能只是考慮如何獲得校友的支持，同樣還要考慮校友的需求，為校友提供服務。校友可以為母校付出，但付出的前提是能夠持續發展。如果大學能在其校友個人事業出現困頓時、校友企業發展遭遇瓶頸時適時給予關注和支持，並共同尋求解決方案，渡過難關後的校友對母校的報恩之心會更加強烈，雙方的合作基礎會更加牢固，大學的影響力和凝聚力也會進一步增強。

（五）校友資源開發利用要強調規範化。一個成熟的品牌必然會有一套科學規範的運作機制做保障。校友品牌的載體——各類校友組織——多由校外的校友組成，他們來自不同的行業，很多人是部門負責人或企業掌門人，有的甚至是某個行業的領軍人物，都有很強的組織管理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而校友組織的社團性、公益性和動態性決定了校友組織成員之間不可能建立起實質上的層級關係，大家都是因為學緣關係和校友情感才自願搭建平台聯絡校友、服務母校。因此，校友組織的正常

運行需要一套大家認可並能共同遵守的制度和規範為前提。透過品牌建設的規範化程度，可以看出校友品牌的品質和層次；制度規範運行的效果，決定品牌創建的效果，折射大學及其校友團結協作的的能力。

開發利用校友資源，除了堅持規範化的運作外，還要對品牌的創建效果進行評估。這也是傳播大學及其校友形象的必要環節。品牌的主體可以通過收集大學、品牌主體成員、其他校友、兄弟院校、以及公眾和媒體對品牌的評價信息，及時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改進和完善，以保證品牌建設和大學形象傳播的效果。

好的品牌贏得好的傳播效果，好的傳播效果必然促進品牌提升，增加品牌的含金量。校友資源開發與利用的過程就是大學形象傳播的過程，深入開發優質的校友資源是創建優秀校友品牌的基礎，是以校友品牌傳播大學形象的前提。好的校友品牌會讓媒體和公眾在大學與品牌之間產生關聯，可以強化大學的優勢和特色，提升大學的附加值。

參考文獻：

①于海琴：關於大學形象內涵的調查分析②。

高等教育研究，2003(2)。

②戴林富：以創新大學文化塑造大學形象③。高教探索，(2008)5。

③何暉，齊紹平：現代大學形象設計與塑造的現實需求與策略研究③。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5)。

④葉李娜：基於 C 戰略的大學形象塑造研究②。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⑤戚玉華：論大學品牌的塑造②。安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⑥卞冬磊，張稀穎：轉型期大眾傳媒報道與大學形象塑造關係研究③。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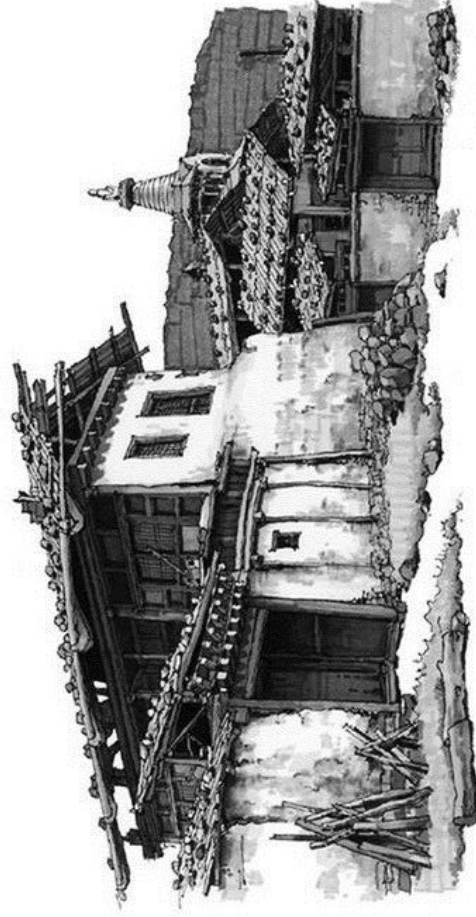
⑦金兼斌：大眾傳媒中的大學形象③。國際新聞界，2006(2)。

⑧賈美英，郭樑，錢錫康：對高校校友資源的再認識③。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4(6)。

⑨鄧姬：校友工作體制與大學籌資能力③。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2(2)。

⑩孫美靜，林傑：美國大學校友會的職能、類型與結構③。現代大學教育，2008(3)。

(作者：暨南大學副研究員)



從「巴敦」到「韋格爾」看 民國基督新教神學教育

◎呂源

基督新教傳入中國大陸以1807年馬禮遜來華為肇始，此後歐美各國差會為傳播基督信仰陸續東來，成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先導。為更好地傳播「福音」，西方傳教士來華之後往往首先培養當地傳道者，以破解因為語言不通和膚色不同造成的隔閡，被稱為「宣教事業冠冕」的基督新神學教育應運而生。新教神學教育不僅在中國近代基督教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它對中國近代教育史同樣意義巨大。

首先對這一問題進行關注的還是來自基督教會內部，前福州協和神學院教授黎天賜（Samuel H. Leger）在《中國基督教牧師的教育》[1]（*Education of Christian Ministers in China*）中認為近代中國的基督新教神學教育從開始便存在兩種模式，其一可稱為「學徒式」（apprenticeship type），尤其注重聖經和宣導實踐，一般是由傳教

士親自個別傳授，多見于19世紀的中國傳道人訓練中；其二為學院式（academic type），注意神學和以神學為中心的文科訓練，屬於正式的學校教育，成為20世紀傳道人才培養的主流。當今學者對一問題有所論及，然而其中對中低級神學教育的具體狀況少有涉及，對來自教會內部調查報告的利用還存有可探究空間。本文在吸取前輩學者成果基礎上，利用「巴敦調查團」和「韋格爾調查團」兩次全國調研報告，嘗試對抗日戰爭爆發前的民國神學教育狀況和特點作一探究，借以窺得當時中國教育狀況之一斑。

一、「巴敦報告」與「韋格爾報告」所反映的神學教育狀況

為更好了解當時神學教育的實際狀況，發現問題並求得因應方略，中國基督教會

在民國時期曾經組織了多次全國性調查和會議討論，1921年的巴頓調查團主席為美國芝加哥大學副校長巴敦（Ernest D. Burton）教授，所以調查團報告《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of 1921-1922*）也被習慣上稱為「巴敦報告」。在1934年，韋格爾調查團由耶魯大學神學院院長韋格爾博士擔任顧問，另外聘請浙滬浸禮會總幹事鮑哲夫、金陵神學院教授師當理（C. Stanley Smith）。報告除去部分內容為牯嶺會議討論結果的集結外，主要部分是由韋格爾撰寫，因此這份名為《培養教會工作人員的研究》的報告習慣上被稱為「韋格爾報告」，同時被譽為「世界上主要傳教區域第一份神學教育研究報告」。

這兩份報告均出自中外聯合調查團，在這兩個調查團中多有像巴敦和韋格爾這

樣在歐美素有威望又學識淵博的宗教界和教育界人士，同時吸納像司徒雷登（Cung Lighton Szean）、師當理和繆秋笙等身處中國神學教育一線並了解國情的學者，在調查過程中多採用「統計調查法」、「問句（卷）調查法」和「個人談話或小團體商榷法」，客觀而嚴謹地記錄分析了民國時期基督新教神學教育中師資、學生和課程設置等諸多方面的具體狀況，進而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可以說是當時中外教會人士對民國神學教育思考的結晶，也成為我們當代研究的重要參考。

依據「巴敦報告」，可以將全國男子神學校按照入學文化水平分為4類：聖經學校（學員大多未受過文化教育，共22所）、聯合神道學校聖經學校（學員僅有小學文化程度或未受過文化教育，共5所）、神道學校（招收專門學校畢業生或中學畢業生，共3所）、神道專門學校（學員須具有至少兩年專門學校工作經歷，共5所）。此外「巴敦報告」統計全國還有女子神學校38所，學生文化水平大多都在中學畢業以下，因而難以準確分類，有的學校只教授粗淺的知識，也沒有多少專業訓練，稱作「婦女補習學校」更為恰當。^[2]不論男子還在女子的神學校，其生源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數僅初識文墨，限制了1922年之

前的中國新教神學教育水平。

在此後的十余年中，雖然中國基督教會經歷了「非基運動」和多年的戰亂，但神學教育方面仍有明顯的發展。在1935年的「韋格爾報告」中，將當時全國的神學分為5類：協和神學院（招收高中畢業生，學制四年合格者授學士學位，如廣州協和神學院）、協和聖道書院（招收初中畢業生，學制3年，如廈門閩南聖道專門學校）、各宗派的神學院（招收初中或者初中以下程度畢業生，學制多2-3年，如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女子神學院（主要招收為初中或者初中以下程度女生，學制2-3年，如金陵女子神學院）、神學研究院（主要招收大學畢業生，學制一般為3年，如燕京大學宗教學院）^[3]。

從兩個報告不同的分類和具體細節中，可以看出基督新教神學教育一些新發展動態：

首先，國際間和各宗派間合辦神學教育機構的增加，建立了如金陵神學院、廣州協和神學院等多個神學機構。因此得到兩個調查團一致的贊賞和推崇——「在十三個神學中，除三個以外，都是由各宗派見之合作結果而產生的。這種聯合，在歐美先進教會看來，萬難達到，而現在竟成為事實，實非料想所及。」^[4]令中外教會

如此欣慰的結果並非偶然，從主觀上看，經「非基運動」之後，中國教會「本色化」的願望和程度都增強，在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和中華基督教教育會等組織建立後，積極協調在華各差會神學教育力量以促成合作。客觀上要創辦運營神學院，同時培養神學生耗資不菲，以廣州協和神學院為例，創建前後即預算花費達21萬美元^[5]，靠單一差會供給難于承擔，而經歷一戰和「大蕭條」的西方各差會財力不如從前，也樂于「本色化」後中國教會能夠最大程度的「自養」，因此劃撥中國教會資金逐年減少，財力更為孱弱的中國教會選擇合辦的方式分攤支出組成「協和神學院」也是必然的選擇。

其二，「缺乏受過高深教育程度的傳道人才」問題依舊存在。在「巴敦報告」中8個招收大學程度學生的神學校在校生總計只有86名，8個招收中學程度的神學校，在校生總計295名^[6]。按照三年學時平均計算，每年只有32名具有大學程度傳道人畢業，高級傳道人才缺乏可見一斑。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為例，在1925-1926年正式教員有24人，獲得博士學位者4人；1928-1929年正式教員有22人，獲得博士學位者有3人。教師隊伍中更不乏像司徒雷登、趙紫宸、陳垣和李榮芳這樣的名家

學者，其陣容堪稱豪華，但學校每年所培養學生人數卻一直不理想，從 1926 年到 1931 年只有畢業生 59 名，每年平均只有 4.9 人畢業，這其中 45 人獲得神學士學位（男 44 人，女 1 人），在 1927 到 1931 年期間更顯頹勢，該學院只有 7 名學生畢業，平均每年僅 1.4 人，其中獲得神學士學位者為 4 名男生，以至于出現「師多生少」的現象^[2]。

這種現象遭到「巴敦報告」直接而嚴厲的批評——「以此數面與四萬萬待教化之人民相較，或與此所估計值三十七萬五千須受基督生活之調養者相較，則其情形之緊急，益可想見矣。再以此而與對於基督教的高等教育所投入之精力相較，則其不符情形，亦殊足驚人。」^[3]此情況 1935 年也沒有好轉，「韋格爾報告」中提到：雖然在巴敦報告後 24 年後，中國新教信徒增加八萬六千人，所辦中學學生數增加 488%，所辦大學大學學生數增加 321%，但在 1934 年招收大學程度學生的神學校（燕京、金陵和滕縣）在校生只有 86 名，略有起色的是招收高中程度的增加到 380 人^[4]。造成此種現象由多方因素綜合所致，詳見本文神學生部分。

二、神學校中的教師與學生

神學教育機構中的教師扮演著傳道授業的重要角色，學校教師的數量和質量直接決定著其學校辦學水平和教學質量，也是神學教育的重要考察對象。在「巴敦報告」和「韋格爾報告」中都有具體考察和統計，現綜合為下表：

在 1921 年，全國高級神學校中共計 42 名外籍教師和 20 名中國籍教授，師生比例：5.9:1；全國低級男子神學院共計擁有 65 名外籍教師和 86 名中國籍教師^[5]。到 1934 年，全國高級神學校中共計 24 名外籍教師和 54 名中國籍教授，師生比例：4.2:1；全國低級男子神學院共計擁有 51 名外籍教師和 22 名中國籍教師^[6]。

可以看出：在中高級神學校中，教師數量穩中有升，特別是中國籍教師增加較為明顯，一方面說明中高級神學教學力量的增強，也說明華人神學力量的增強。但在例如「舊約」、「新約」和「宗教史」等形而上學科主幹專業課程主要是由歐美教師任課，華人教師更多擔任像中國曆史和地理等有關中國文化的課程的老師。此外雖然 1934 年的低級男子神學校的數量相對 1922 年數量減少近一半，由于教師數量並未大量流失，所以每校平均的教師數量反而有所增加，也是神學教育力量充實的體現。

趙紫宸高等神學教育需要有錢、有人、

有遠象（即大局觀），在神學校任課的這些教師雖然服務于中國教會和社會，但其薪金供給從一開始到抗戰前一直依賴所屬的外國差會，即使在「本色化」運動之後仍舊沒有改變這種格局。在 1934 年的 18 所低級男子神學校中，每一個已婚的專任外籍教師年薪約 4000 元，每一個已婚的兼任外籍教師年薪約 1000 元，如此推算男子低級神學校外籍教師薪金總數已達 170000 元，而中國教會在這些學校的捐助只有 3330 元，外國差會供給絕大部分。^[7]在 1934 年的 13 所中高級神學中，差會供給外國教師薪金達 179000 元，而中國教會在這些學校的全部捐助只有 468 元。中國神學教育「自養」程度之低由此可見。在此情況下，神學教育的擴張更依賴于外國差會，和中國教會的距離也越遠，產生本土教會管不了學校，學校也不關心本部教會壘求的現象，導致難于很快實現神學教育的「本色化」。

在近代西方傳教士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因為語言不同和習俗相異往往需要尋找一些當地信徒充當助手，在傳教過程中就對這些華人助手進行一定信仰知識訓練，這種跟隨一位或數位西教士邊學邊實踐的方式就是「學徒式」神學教育，也是中國最早的神學教育方式，中國最早一批本土傳道人多是由此誕生。

進入 20 世紀「學徒式」已經逐漸被「學院式」所取代。全國各地的聖經學校、神道學校、神學院培養出大量專業傳道人成為教會基幹力量。在各類神學校中就讀的神學生作為未來宣教傳道的生力軍，自然獲得特別的關注和支持。在「巴敦報告」和「韋格爾報告」中都有詳盡的描述和討論。在男子聖經學院中初中文化水准初中以上從 8 人上升到 23 人，女子聖經學院中初中文化水准初中以上從 33 人上升到 143 人，初中文化水平的學生有增加，這是教會內部提倡培養高深學曆傳道人才努力的表現，也說明聖經學院神學教育的進步，但就全國來看人數依舊稀少，特別是擁有大學文化水平中高級神學畢業生從 8 人變成 42 人，不升反降。「受過高深教育人才的缺乏」從民國十一年「隱憂」到民國二十三年越發嚴重，韋格爾報告中無奈的發出「不知更作什麼感想？」的慨歎[33]。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以從曆史傳統和現實經濟兩大方面探查：

中國傳統社會中素來奉「科舉及第一」為正道，但凡有經濟實力的家庭都支持其子弟攻讀孔孟經典，為求將來能夠登科做官，光耀門楣，所以在近代基督教剛剛傳入中國時士人階層多不屑一顧。很長一段

時期內這些神學校多數是在大學程度以下，在學生入學後除了一些必要的神學訓練外，並不能給予學生全面教育，學生畢業後按照西差會要求分配到各教區，因此形成「教會常甘心雇傭程度低淺之人才」的曆史傳統，這種傳統形成一種觀念後「已深入一般青年之心中」。^[34]傳教士只能吸引未受過教育也無經濟實力供給子女受教育的貧寒階層來教會學校，學校免費提供書本、飯食、衣著等福利，有的教會學校不但免學費，甚至還簽訂合約付款給家長。^[35]因此形成早期就讀神學校者多是知識水平不高的貧寒子弟的曆史傳統，家境優越的大學生幾乎對牧師職業持「鄙夷」的態度。

更重要的原因來自現實時局和社會思潮：1918 年事變後，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民衆國家主權意識增強，有才華的青年更有熱情投身於政治、軍事和「實業報國」之中。在傳統觀念中，牧師只是宣傳勸告之人，是見不尊於社會的職業，社會地位不高難以吸引更多青年人報考神學校成為傳道人。在「巴敦報告」和「韋格爾報告」都一致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牧師薪金過於微薄。調查發現：山東泰安一帶美以美會傳道人月薪只有 10 元，廣東農村傳道人月薪也只有 15—25 元^[36]，以至「平均

每牧師所得之報酬初起時不過一小工之工資相等，在後來超過于此者亦無幾。^[37]為教會所推崇的職業有三種：醫生、教師和牧師，而醫生和教師在職業地位和薪酬待遇方面明顯好過牧師，使得立志傳道做牧師的大學生少之又少。

「本色化」之後的中國各地教會沒有足夠財力供養受過高等教育的傳道人，所以更樂於雇傭受過中低等教育的傳道人，因為他們的薪金相應更低，導致越是自養程度高的教會，所屬傳道人中受過高等教育者越少的局面。宣教過程中作用更大的高等級傳道人的需求被抑制。中低教育水平的宣教者個人的努力當然不能被忽視，他們也可以向平民百姓宣傳基督教信仰，但卻難於吸引更多的中國文化知識分子和權貴，導致民國時期的信徒仍多出自貧寒階層，使得教會募集資金能力有限，限制中國教會經濟實力的增長，形成惡性循環。

作為供給方的中高級神學校同樣受資金掣肘。絕大多數的神學生都是由所屬教會派遣，供給其學費。而一個神學生的培養耗資不菲：民國十一年一名神科大學生的每年費用是 1021 元。在民國二十年高級程度、初中畢業程度、初中以下程度男生分別培養費是 632 元、680 元和 400 元^[38]。在每個神學生的費用中雖然大部分來自外

國差會，但仍有部分需要以學費名義由選派學生的教會來承擔。在需求不旺前提下，中外教會對高等神科學校資金支持不夠，學校人才供給有限。形成減少高級人才培養以利于「自養」的窘境。

此外神學校中神學生立志傳道的原因也值得關注。韋格爾調查團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向全國15所神學校中的53名學生詢問了相關問題。有78%的學生父母雙方或單方是基督信徒。在作答影響其立志傳道的人時答案比較分散，其中回答是「神召」的人數最多，有113人，其次是回答「傳道者」、「家長」和「牧師」的學生分別有70人、82人和59人。由此可以看出神學生立志作為傳道人受其成長環境影響很大。

在回答自己立志傳道動機時，回答是「神的激勵或召喚」的學生最多，有137人，回答是「樂於服務」的同樣有127人，其次多的回答是「愛主」，有128人，剩余回答依次是：「世界和人類的需要」76人，「神聖的職業」29人，「個人的希望」14人，「個人的愛好」7人，「繼承父業」5人。依次看出抗戰前中國神學生立志傳道的動機比較純正，其信仰虔誠度也較高。

三、神學校的課程設置

由于民國時期在華設立的神學校多是

由西方傳教士設立，因而這些學校的課程設置也多因襲歐美神學教育傳統。這樣的課程和教學在當時西方已經不是盡善盡美，移植後的是否與中國國情和傳教實際契合更值得探討。

當時一般的中高級神學校中設有以下課程：神學、舊約、新約、教會史、宗教教育等有關神學的課程，另外為了提高學生整體素養也會開設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曆史等方面的課程。例如在1941-1951間廣州協和神學院開始有：中國文學與寫作、教會曆史、教義神學、倫理學、基督教證據、比較宗教學、理論與實踐教學、講經學、教牧神學和音樂。^[22]這些課程都是一個合格宣教人必須掌握的內容。

但1922年的巴敦報告中就提出不少憂慮：首先，在中國的傳道人，大都會成為農村的傳道人，在課程設置方面應考慮到農村宣教的情況；其次，中國教會的事工大都需要承擔社會服務工作，作為傳道人也應得到這方面充分訓練；最後，因為中國神學生身邊文獻資料缺乏，外文閱讀能力也有限，無法像西方神學生那樣可便利利用數百年來對經義的解釋，所以對聖經更需要有潛心的研究。^[23]

經過十多年發展，各神學校對其課程都有改進，比如增設社會學，以便神學生

可以了解研究社會。「韋格爾報告」對「巴敦報告」在課程設置方面的觀點「掬誠贊同」，但「在以往十余年中，神學對於課程，力求更改，俾適合考察團所舉各要點，雖是進步不少，然而神學課程，仍有充分改弦更張的余地。」^[24]

「韋格爾報告」之後又提到「我們旅行各處，與許多牧師和教會工作人員磋商，我們發現一種普遍的需求。就是對於聖經，欲加更深切的研究。我們會同許多牧師：假如他們有機會再入神學，要習是什麼功課？他們的答復，都是願意多選解釋聖經的功課。」^[25]由此可以看出在兩個報告間隔的十多年，神學教育課程設置方面並不令人滿意，聖經課程尤其沒有多大進步。

因而「韋格爾報告」對不同層次的神學教育機構，又有針對性地給出不同的建議：

「聖道書院」是專收初中畢業生，通常教授三年課程的神學校，目的訓練學生能夠參加基督教傳道工作。這個級別的神學校教學應注意：1 教學的方法應該更接近中學教學，由于學生無法做獨立地研究，又不能博覽群書，所以需要完成指定功課和背誦，更需要教師的指導；2 因為學生不懂外文，教學過程應當完全使用中文，同時加強學生外文學習；3 大半的課程應

當注重聖經的研究和實際宣道訓練。[23]

「神學院」是專收高中畢業生，教授四年課程的神學校，目的培養男女學生擔任牧師工作，或者充當未來宗教教育的老師。這個級別的神學校應加強以下幾方面：1 做到以學生為中心，而不以教材為中心，使神學生對課程內容產生興趣，掌握基本方法；2 可多設對實際傳道有幫助的課程，例如心理學和社會學等科目，但不可偏向功利主義；3 同樣需要加強宣教實踐訓練，得到必要實習機會；4 每周課堂教學時間15個小時已經足夠，不宜超過18小時，以免影響神學生自修和實踐訓練。[24]

「神學院研究院」是專收大學畢業生，並教授一年至三年的課，教導大學畢業生加入傳道工作，培養高級傳道人才。神學研究院首先應當使其學生參與到教師的研究和實驗中去，培養學生高深的學識；其二在研究範圍不局限在純粹的曆史、注釋和哲學內容，而應當更多的關注有關中國文化與信仰關係、基督教及基督教運動對中國人民生活的關係等問題。[25]

以上建議集中于韋格爾報告下編的第五章，由韋格爾教授本人撰寫。不難看出這些建議都是依據當時中國神學教育的實際情況而給出，符合兼具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對當今的專業人才培養也具有啟發性。

可惜在該報告發表兩年後抗戰全面爆發，其中的真知灼見因為戰亂大都無法實現。

結論

借助「巴敦報告」和「韋格爾報告」這兩份全國性的基督教會調查文獻，我們可以看出抗戰前的中國基督神學教育總體呈上升發展趨勢，不管是神學生的整體文化水平還是學校師資力量都有明顯提升，然而由于當時努力「本色化」的中國教會經濟實力不足，全國各類神學校無力「自養」，越是高等級的神學校越依賴外國差會資金。此外各地教會同樣因經費掣肘難以供養受過高等教育的傳道人才，需求的不足也導致高等級神學校出現「師多生少」的尷尬局面。任用文化水平較低的傳道人固然有低薪金的好處，卻也難于施展對中國文化知識階層的感召力，使得民國時期的眾多基督教信徒多出自底層一般大眾，缺乏本土富有者信徒又限制教會財力，使其難以更多培養高級人才，形成不良發展循環。

參考文獻：

[1]Samuel H.Leger,Education of Christian Ministers in China[J],A Histetory and Critical Study(Shanghai,1925).

[2][6][8][10][14][17][20]中國基督教教育調查團：《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Z]，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

[3][4][9][11][12][13][16][18][21][22][23][24][25]韋格爾及視察團編：《培養教會工作人員的研究》[Z]，上海：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1935年。

[5][19]Co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the first ten years(1914-1924)[M].

[7]徐以弼：《教會大學與神學教育》[Z]，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

[15]梁家麟：《基督教辦學曆史的回顧與反省——以廣東省的地區研究為例》[J]，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15期，1993年7月。

（作者：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助教、碩士）



基于翻轉課堂的深度協作知識 建構課程教學改革研究

◎趙海霞 鄒紅英

摘要：該研究對在線環境中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研究的現狀與理論進行了綜述和分析，構建了網絡教學平台環境下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教學操作模型框架，並依托高校 Blackboard 平台開發了相應的在線課程，並以《高級英語口語與公共演講》課程為例，采用行動研究經歷三輪教學實踐與研究，結合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及小組共同體的成長反思日志進行持續改進，最終形成了「基于翻轉課堂的個體知識建構、基于認知衝突的協作知識建構、基于整合的協作知識建構、形成群體公共知識」主要階段的新型混合式學習模式，並積極探索該模式實施過程和效果。

關鍵詞：在線環境、翻轉課堂、協作知識建構、混合式學習模式、教學設計、實踐

隨著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不斷發展，培養高素質創新人才已成為教育界的研究熱點。高水平的口頭表達能力和公共演講能力成為人們在生存和競爭中一項重要的指標。在中國，英語公共演講課程既是大學英語課程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為培養非英語專業高層次人才提供教學平台的高階課程。該課程的學習目標不僅包括提高綜合運用語言能力、語言輸出能力、知識習得能力、英語演講在內容和深度方面的表達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而且重視促進提高大學生心理素質、批判性思維等系列促進深度學習的能力。然而，隨著中國大學英語課堂教學的課時縮減，該課程的課堂教學活動無論對學生還是教師都有較高要求，迫切需要研究和實施新型的教學方法。

一、研究的問題

隨著現代科技和網絡技術發展和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理念的升溫以及國際高等教育以開放課件、MOOCs 引領的開放教育資源的迅猛發展，目前興起的翻轉課堂、深度學習和協作知識建構學習理念均強調學習的目的不僅幫助學生如何獲取現有的知識和技能，而且幫助他們如何產生和運用新思想，並在個體知識建構和群體協作知識建構的雙向交互中獲得螺旋式上升。

在線環境中以促進深度學習的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融合了深度學習、翻轉課堂、協作知識建構的優勢互補而形成增益效應。三者內在目標均指向信息時代對人才素質要求所偏重的深度學習以及運用高階思維解決複雜問題的相關能力，強調深度認知加工、投入性學習、協作解決問題、高階學習等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方式，在重視學生獲取知識體系的框架上強調較高認知水平層次上的心智活動、有

意義的學習以及劣構情境下的遷移能力。

這一新型的混合式學習模式試圖打破傳統教育當中知識傳遞的過程發生在課內，而最需要同伴和教師協助的協作知識內化過程卻發生在課外的這一積習，讓學生自主掌控學習、增加學習中學習共同體的互動、提高學生心理優越性、促進深度學習等優點，能夠有效地彌補中國現行大學教學模式中所存在的弊端，而且其優勢和特點能夠解決大學課程的課時短缺帶來學生輸入層面受限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

早在1997年馬貞如提出在大學英語精讀課教學中應引導學生運用深度學習法進行閱讀與學習。鄒曉燕提出了大學生英語深度學習的相應策略，即整合化學習策略、自主協作化學習策略和實踐化學習策略。近兩年來，翻轉課堂教學形式已經被有效運用在大學英語教學的系列課程（如大學英語、大學英語聽說課、英語口語、英語精讀、英語寫作），實證研究它可以實現覆蓋輸入材料學習和語言輸出運用兩個環節，教學效果比較明顯，並能夠降低遠程學習者英語學習的焦慮感。（張寶輝，張金磊，2013；謝雪莎，2014）根據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和語言輸出理論，外語語言訓練過程的

學生需要任務驅動、同伴聽眾、交際情境、同伴反饋、雙向語言交互、協作會話和反思評價，很多學者研究這些策略對於英語口語輸出能力、表達能力、演講能力、心理素質（包括降低焦慮）的積極促進影響（Johnson，1999；梁豔，2014），並研究採用這些策略能夠培養學生責任意識和探究式學習能力，有利于建構新的知識體系，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李玲霞，2014），進而研究可以使學習從表層學習逐步深入到培養高階思維能力的深度學習，將知識、能力、素質培養有效結合起來和改善教學效果。（馬芸，2013；李玲霞，2014）

綜合文獻分析和國內外的優秀經驗，筆者認為基于翻轉課堂的深度協作知識建構應該具有以下涵義和特征：

（一）以促進深度學習的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運用翻轉課堂所提倡的課前學習、課堂討論、課後深化以及小組共同體協作問題解決以促進深度學習的教學組織形式，不僅有助于學生對知識的自主吸收和應用，而且可以實現學習目標層次任務在課上、課下、在線、面對面、個人、共同體、良構劣構領域、情境、遷移多重空間自由切換和連通，有助于促進學生解決劣構問題或複雜任務的心理特征的高階能力，如創新、決策、批判性思維、信息

素養、團隊協作、兼容、獲取隱性知識、自我管理和可持續發展等能力。這一過程真正體現了強調深度學習視野下的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的本質內涵。

（二）新模式強調一體化的課程教學設計和在線環境設計、開發、制作、管理和評估，尤其重視課程的認知目標層級設計促進學生知識、技能、能力等全方位融合以形成系統的網絡，強調在線環境和優質資源的支撐作用。在此基礎上，按照英語演講課程培養的知識、技能、態度、能力等綜合體系，尤其突出言語交際要素，如Lee提出的「演講者、訊息、溝通渠道、聽眾、反饋、干擾和情境」七個言語交際要素。

（三）重視基于面對面和基于網絡的混合環境下的翻轉課堂、協作知識建構和深度學習的融合機制，加強體現情境創設與變式遷移、認知衝突與整合、知識建構個人主體性和學習共同體協作性、問題表征與問題解決、意義建構與反思、多元評價與多維為評價等高階思維和複雜問題解決的相關能力。在此基礎上，強調相關能力和機制的協同運作，強調教師主導和學生主體的定位和功能變化以及多項能力的增補和提升。

（四）翻轉課堂、協作知識建構和深

度學習的教學過程、要素、環節和要求。韋斯利·貝克、Robert Talbert 等學者（2011）將翻轉課堂系統結構分成課前和課中兩個階段。傑姬·格斯特構建的環形的翻轉課堂四階段模型將課堂分為體驗參與、概念探索、意義建構和展示應用四個階段。根據協作知識建構的過程的研究，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知識轉化模型將知識建構的過程分為個人知識建構與社會知識的協作建構兩個維度，加拿大學者 Higgs 提出協作知識建構的三階段說，包括觀點的發散、觀點的聯結和觀點的收斂等，Higgs 等人認為協作知識建構過程包括四個階段，即：任務知識的具體化、任務知識的抽象化、形成基于衝突的意見和形成基于整合的意見等；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杜建霞等人則將這五種交互類型歸納為信息、方法及認知等三個過程，整合于「知識的獲得（表層水平的理解）、技能發展和深層學習（形成概念、解決問題、深入理解、創新性使用）」三個階段中。美國的 Eric Jensen 和 LeAnn Zickles 提出了「深度學習路線」，從教師教學的角度出發，以推動學習者的深度學習為目標，教師要引導學生對所獲得的新知識進行精細的、有效的加工，如覺知、分析到綜合、應用、同化，此外還要指導學生對自己的學習進行評價，幫助學生通

過及時而準確的學習反饋來修正和調整所學知識。

三、網絡環境下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新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的過程（課前課中課後）為切入點，初步構建了在線環境中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模式教學設計流程圖。其主要過程可分為三個主要連續階段及關鍵環節，其學習模式（圖一）是逐步上升的過程，沒有明確的邊界，每個階段分別包含相應關鍵環節，每個環節的設計、組織、實施、評價和管理體現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建構的特點和要素。

四、研究設計

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學習方式為外語公共演講教學改革提供了一種新的教學範式。本研究選取某大學本科生通識教育選修課《高級英語口語與公共演講》課程，依據構建好的學習流程、教學策略和活動手冊，依托高校廣泛運用的 Blackboard 網絡教學平台設計了在線環境，在線課程及資源。該課程在 2014-2015 年完成了校本的基于 Blackboard 網絡教學平台的網絡優質示範課程項目並結題，奠定

了利用 Blackboard 平台的技術支撐環境。該平台具有除了內容展示等多種功能外，還可以跟蹤學生學習軌迹、小組任務、系統、交互、移動學習、協作論壇和學習測驗、問卷調查等功能，可以滿足組織學生從事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的需要。2015 年該在線課程被學校評為 A++（最高級別）課程。筆者為本課程運用新模式教學改革教學設計和實施過程進行指導和技術支撐。

本研究在試驗階段主要采用行動研究法，對圖一所提出的教學流程進行驗證。依據課程特點、難點和教學瓶頸問題，選取課程難點章節「Impromptu Speech」作為試驗內容，周期為 2013 年秋季、2014 年秋季兩個學期，進行兩輪的混合式學習新模式試驗，形成兩輪的行動研究。每輪行動研究歷時 2 周，每周連續三節課（每節課 45 分鐘），采用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的教學流程。教學對象為二、三年級本科生，共 22 名本科生參與學習，其中第一輪共 34 人，女生 15 人；第二輪共 40 人，女生 22 人。教師同時編制了學習指導，並利用相關開放教育資源制作了補充的學習資源等材料，同時使用已經建好的 Blackboard 網絡教學平台作為教學平台。將所有學生分成 6 組，每組 5-6 人左右，

要求每位同學在連續三次的分組彙報中至少要作為本組的代表上台彙報一次，小組彙報代表的人數不限。

考慮到行動研究法在歸因方面存在的不足，本研究還通過問卷調查、訪談等方法，對結果進行三角互證，以求提升結論的可靠性。問卷調查主要了解學生對教師教學的評價，從教學態度、教學方法和教學效果三個維度共十個小項進行調查。訪談為書面訪談，了解學生對課程的感受。問卷和訪談均針對全體學生。問卷調查匿名作答。訪談則隨後測完成，實名作答。

五、結果與討論

在第一輪行動研究中，受訪的學生對該課程采取新教學方式提出的建議主要有創造更多的交流機會（包括在線交流）以及提供更新的學習資源。同時，經過觀察，發現學生在自主學習效果較好，而在協作知識建構過程出現如下問題：（一）學生喜歡與人協作，但缺乏溝通、交流的技巧；（二）學生評價能力不足；（三）組內規範不明確，整體學習進度慢，組內有個別學生存在搭便車現象。為此，教師做出的改進主要有：（一）課堂講授式視頻提前錄制並翻轉放在網上，增強了公共演講的視頻、音頻和演講稿等優質資源展示和研究主題

拓展資源，作為腳手架支撐學生的協作知識建構學習與研究；（二）針對性培訓小組成員協作技巧；（三）開發大學英語演講語言輸出評分量表，從英語知識習得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演講表達能力及採用視覺輔助手段等維度進行評分，鼓勵個人知識平等構建、輪流表達和上台演講，多元觀點、正反並現，有助於學生之間、小組之間評價能力的提升；（四）制定組內貢獻度量規，激發共同體的學習互相支持和貢獻。

在第二輪的行動研究中，通過教師觀察、學生問卷調查和訪談，存在的問題有：

（一）需要加強團隊學習共同體內的領導力；（二）隨著交流次數和層次的加深，網絡交流滯後，影響交互效率；（三）組間需要深度交互和交鋒的深度學習。教師的主要改進有：（一）開發了小組基於立項、中期檢查和結題的學習量規和評價表格，增強了組間展示、組間協作和對抗學習的力度和多元評價的效率和力度；（二）加強了學習診斷、學習過程的形成性評價，設置了最佳演講團隊和最佳協作團隊獎項和體現演講能力、協作問題解決能力、信息素養等深度學習和綜合高階能力的獎項等。（三）實行多元評價，要求學生參與每個演講視頻和演講稿的口頭評價、網絡評分與評論以及撰寫分析報告以幫助學生及時反思。

總體而言，本次教學改革能夠運用網絡支撐環境、網絡學習資源和網絡協作互動將傳統學習方式優勢和數字化學習優勢結合起來，通過基于翻轉課堂的個體知識建構、基于認知衝突的協作知識建構和基于整合的協作知識建構等關鍵環節將集體、小組個人、課上課下、學習目標深淺層次有機轉換和結合，使學生從被動的學習環境逐步轉變出來，進而進行深度信息加工，從而提升大學生課程知識及專業能力，促進培養相關高階能力。該模式使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更加靈活，提高了教與學的可視性，對提高教與學效果起到了積極作用，對學生產生了積極的綜合影響。

通過對學生在教改單元測驗、問卷調查中對單元教改評價，新型學習方式能促進學生頻繁調用高階能力以投入到知識建構的深度學習過程中，提高了綜述、評價、創新知識和解決問題能力，他們的學習成績也得到了較大的提高。通過課堂組內、組間演講的展示，學生的綜合英語口語與演講能力總體提升。學生認為新模式刺激了他們的學習興趣、科學靈感和內在動機的激發，普遍提高了對專業知識的深度內化和高層次的思維能力，培養了他們自主性、協作性和研究能力和實踐能力。從翻轉課堂的自主學習，到分享學習經驗和資

源、觀點協商、知識產出、小組彙報等一系列活動，使學生超越了靜態知識學習，形成了混合式學習新理念和新方法，逐漸形成了基于翻轉課堂的個體知識建構與群體協作知識建構、論壇協作在線答疑和互云小組協作知識的有效學習方法，以及網絡信息學習能力、信息發現、獲取和處理能力，提高了溝通、表達、兼容、評價的精神和能力；根據學生學習論壇和學習日志，表明學生提高了反思、規劃和元認知能力。從問卷調查的結果來看，對教學的滿意度較高，總體評分達到89.49。根據學生的訪談結果，受訪的100名同學中，85%認為新型教學方式提高了其學習動機。這種教學除了向傳統課堂教學那樣傳授專業知識與技能外，更為重要的應是對學習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傳授。俗話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綜上所述，研究結果說明了本課程的實施結果是非常成功的。然而，雖然大部分學習者能夠積極地參與協作知識建構活動，但仍有少部分學生表現得不十分活躍。如何調動每一位同學的投入度，將學生的學習轉變為主動的、投入學習，仍是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同時，如何完善組間協作知識建構機制也是需要更多理論研究和技術支持。

參考文獻：

- [1]趙海霞. 在線環境下學習者基于問題解決的協作知識建構[J]. 軟件導刊, 教育技術, 2015, (5): 100-105.
 - [2]王守仁, 王海嘯. 我國高校大學英語教學現狀調查及大學英語教學改革與發展方向[J]. 中國外語, 2011(5).
 - [3]張金磊, 王穎, 張寶輝. 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研究[J]. 遠程教育雜誌, 2012(4): 46-51.
 - [4]趙興龍. 翻轉課堂中知識內化過程及教學模式設計[J]. 現代遠程教育研究, 2014(2).
 - [5]馬武林, 胡加聖. 國際MOOC對我國大學英語課程的衝擊與重構[J]. 外語電化教學, 2014(3).
- 基金項目：廣東省教育教學成果獎（高等

教育）培育項目「大學英語跨文化交際課程群建設——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建構模式創新與實踐」（項目編號：247）和「MOOC浪潮下基于創新推廣理論的高校教學信息化變革發展戰略研究與實踐」（項目編號：239）、廣東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MOOC時代基于創新推廣理論的高校教學信息化推進策略的研究與實踐」（項目編號：GDJG20142087）、暨南大學第二批課程中心專項「在線翻轉課堂環境下深度協作知識構建的課程改革實踐」（項目編號：JG2015098）。

（作者：趙海霞，暨南大學網絡與教育技術中心副研究員；鄒紅英，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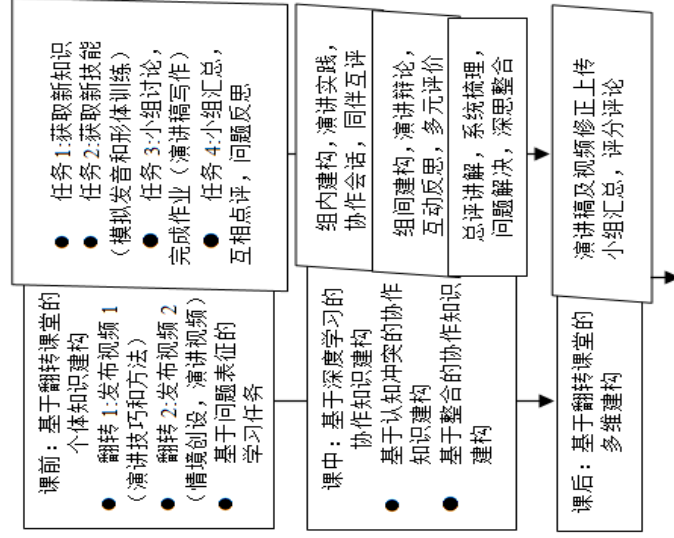


圖 1 基于翻轉課堂的協作知識
建構模式教學設計操作流程